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阿尔巴尼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By Ismail Kadare | 郑恩波 译



亡军的将领

GJENERALI IUSHTRISË SË VDEKUR

重现经典 MODERN CLASSICS



GJENERALI IUSHTRISË SË VDEKUR

《亡军的将领》是卡达莱的成名作，这是一部独特非凡的作品，书中写到一位意大利将军，在战后回到阿尔巴尼亚，收集当年战死在此地的部下遗骨，这桩痛苦的使命，几乎令他神经失常。他意识不到的是，自己也早已成为一具行尸走肉。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作者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他为认识战争带来了新的角度和新的经验。



卡达莱将肖洛霍夫和卡夫卡紧靠在一起，让萨特靠近布莱希特，没让海明威离开聂鲁达太远。

——阿兰·博斯凯

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色调。这是一种从地下目击的战争，即从墓穴里目击的战争。这部书透过死者的魂灵，使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迈入了共同书市。

——法国巴黎《费加罗报》

卡达莱是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历史、民俗学、政治学等各领域都留下印记的作家。他描绘了一种完整的文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

——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约翰·凯里

只要是经典，就不会被遗忘



ISBN 978-7-229-00062
9 787229 000622 >
定价：22.00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阿尔巴尼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By Ismail Kadare | 郑恩波 译



亡军的将领

GJENERALI IUSHTRISË SË VDEKUR

版贸核渝字(2008)第6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亡军的将领/[阿尔巴]卡达莱(Kadare,B.I)著;郑恩波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8.11
(重现经典)
书名原文:Gjenerali Iushtrisë së Vdekur
ISBN 978-7-229-00062-2

Ⅰ.亡… Ⅱ.①卡…②郑… Ⅲ.长篇小说 – 阿尔巴尼亚 – 现代
Ⅳ.I54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162303号

亡军的将领
WANGJUN DE JIANGLING
[阿尔巴]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郑恩波 译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李江华　孙丽莉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工作室
手绘插图:高　莽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925mm×1280mm　1/32　印张:8.5　字数:180千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编委会荐语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

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戏剧性不断地伴随着幽默，让我们发现了过去所不熟悉的阿尔巴尼亚新文学。

——法国“南方电台”，1970年3月11日

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色调。这是一种从地下目击的战争，即从墓穴里目击的战争。这部书透过死者的魂灵，使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迈入了共同书市。

——法国巴黎《费加罗报》，1970年4月12日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出版，将是一种新发现，发现了我们几乎不了解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这一文学首先使作家伊·卡达莱进入到高不可攀、求之不得的层次。

——法国巴黎《最后一分钟报》，1970年3月13日

小说《亡军的将领》创造的氛围，使读者不能不回想起迪诺·布扎蒂几部作品中的氛围，它让你回想起比这些更黑暗的东西。

——法国巴黎《一分钟报》，1970年4月4日

幽默，不外露的激情，轻松自由、朴素自然的叙述，语调的机敏，含蓄的技艺，曲折的教诲，异乎寻常的景观，喜气洋洋的新

人——所有这些因素使这部小说比任何别的小说都更精、更尖。这里有当今正在觉醒的世界的画像，它保其能量、力量和色彩。

——法国《罗兰共和报》，1970年5月17日

在卡达莱的作品中，或多或少还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雅克·雅乌布尔

卡达莱将肖洛霍夫和卡夫卡紧靠在一起，让萨特靠近布莱希特，没让海明威离开聂鲁达太远。

——阿兰·博斯凯

将来，伊·卡达莱一定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V. H. 德比杜



伊斯梅尔·卡达莱（1936～　）高莽绘

译序：阿尔巴尼亚出了个卡达莱

近年来，在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文学的天空，升起一颗格外耀眼的新星。他一连出版了近30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杂感、随笔和游记，而且几乎每部长篇都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广为发行。法国文学界赞美他可与海明威、卡夫卡等文学大家比肩，甚至还多次呼吁他应当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候选人。

这位文学新星就是击败数十名文坛巨匠，2005年6月荣获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伊斯梅尔·卡达莱。

也许有人以为：经济发展滞后，人口仅有300多万的阿尔巴尼亚，根本出不了具有世界文学水平的大作家，卡达莱获此殊荣，是一种偶然或者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但据我40余年来对阿尔巴尼亚文学特别是对卡达莱文学生涯的跟踪和研究，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不能手中无材料只凭主观想象，武断地乱下结论。

卡达莱之所以能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国家虽小，但她具有同希腊、古罗马一样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阿尔巴尼亚就涌现出不少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作家相媲美的人物。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的文学根基是相当厚实坚牢的；有了这样的根基，是可以建立起雄伟瑰丽的文学大厦的。第二，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也曾是经过时代风雨考验与磨砺并具有很高水平的先进文学，她拥有一批被欧洲许多有识之士公认的能和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诗人摆在

同一个天平上的杰出人物（如德里特洛·阿果里、彼特洛·马尔科、雅科夫·佐泽、泽瓦希尔·斯巴秀等），伊·卡达莱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

其实，40年前，卡达莱就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人物。他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也是一个得到党和政府特别关照，享有崇高声誉的骄子。

1936年，即意大利法西斯侵占阿尔巴尼亚（1939年4月7日）的前3年，卡达莱出生于南方著名的山城纪诺卡斯特（与阿尔巴尼亚前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是同乡）。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后进入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主攻阿尔巴尼亚文学。远在青少年时代，卡达莱就崭露出诗才，18岁就出版了诗集《少年的灵感》（1954），21岁还出版了诗集《幻想》（1957）。紧接着，又在25岁的时候，出版了引起诗坛广泛注意和好评的诗集《我的世纪》（1961）。

这三部诗集以新颖鲜活的想象力和个性突出的诗歌语汇，得到前辈诗人拉·西里奇、法·加塔的夸奖和重视。20世纪50年代后期，卡达莱被政府派送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在那里，语言天赋甚高的卡达莱，很好地掌握了俄语和法语，从丰富、斑斓的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使他一生受益无穷。1961年夏天，国际风云骤变，阿苏关系破裂，卡达莱被迫回到地拉那，先后在《光明报》、《十一月》文学月刊和《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任编辑。有一段时间还主编过法文版的《阿尔巴尼亚文学》。与此同时，还继续从事自中学时代就开始的诗歌创作活动。

1963年秋天，对卡达莱一生的文学事业都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那个秋天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季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以整版的版面发表了他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这首长篇抒情诗，以超凡独特的想象和联想，描述了慓悍骁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世世代代同枪结下的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长诗一开篇，就以奇崛的文笔把读者带进一个梦幻的世界："太阳在远方的

道路上降落的时光，／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傍晚，一个山民朝前走着。／背的长枪将千百公里长的影子甩在大地上。／枪的影子在奔跑，／斩断了山岭、平原和村庄；／暮色里枪筒的影子匆匆地向前移动，／我也行进在陡峭的山崖上。／缕缕情丝深深地缠在我的脑际，／对种种事情想得很多、很远、很长。／思索和枪筒的影子交叉在一起，／苍茫中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卡达莱是一个擅长创造雄奇、空濛意境的诗人。随着思考和枪的影子发出的声响，诗人把千百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为自由而浴血征战的场景，灾难深重的阿尔巴尼亚贫穷凋敝、满目疮痍的景象，豺狼虎豹抢占劫掠阿尔巴尼亚的狰狞面目，英雄儿女为保卫大好河山英勇抗敌、宁死不屈的勇士气概，全都清晰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人民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论遭到多少挫折和失败，对胜利始终都抱有最大的希望。诗中画龙点睛地唱道：“宁静是虚假的现象。／群山等待着领导者率领他们奔向前方。／阿尔巴尼亚在期盼着，／期盼共产党降生在大地上。”诗人没有再多写关于共产党的事，只是轻轻一点，作一个小小的铺垫，预示未来将有新的诗篇诞生。

《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以丰颖而奇特的形象和排山倒海的气势，深刻地阐释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千百年来伟大力量的源泉所在。它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的当天晚上，卡达莱就接到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的电话。领袖的热烈祝贺，给予卡达莱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和在诗坛上的地位。

3年后的秋天（1966），在阿尔巴尼亚举国欢庆劳动党成立25周年的前夕，卡达莱又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了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这首诗在内容和创作思路上，都和《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一脉相承。在这首激越磅礴的长诗里，诗人满怀炽热而诚挚的情感，描述了劳动党在革命风暴中诞生、壮大的英雄历程。首先，诗人把劳动党比作梧桐树，把人民比作土地，强调了党和人民群众不可分割的关系：“党啊，／哪里能找到你的影子？/在这古老的国土里，／您像

耸入云霄的梧桐树，／把根子分扎在暴风雨经过的道路上……”党与人民相连的根子是挖不尽斩不断的，对此卡达莱进一步唱道：“敌人要想拔掉你，／除非把这沉重而古老的土地全吞光。”

共产党的建立，是苦难的阿尔巴尼亚的最大喜讯，山山水水都为之欢呼，于是卡达莱又敞开心扉纵情高歌：“连绵的山啊，／高大的山，／闻讯摇动天地转。／风儿啊，／山把礼品献给你，／请将喜讯快快传……”

又过了3年，即1969年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胜利25周年前夕，卡达莱又发表了第三部著名的抒情长诗《六十年代》，纵情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者霍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山鹰在高高飞翔》、《六十年代》这组三部曲式的抒情长诗，从历史写到现今生活，思想深邃，技艺精湛（特别是前两首），均荣获过共和国一等奖。通常《人民之声报》是不发表诗歌和小说的，但卡达莱的3首长诗却能连续3次以整版的版面在报上隆重推出，这可是文坛上史无前例的盛事。从此卡达莱名声大振，在阿尔巴尼亚诗歌界独领风骚近10年。直到1974年，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诗巨著《母亲，阿尔巴尼亚》问世之后（在此之前，这位诗人还发表了《德沃利，德沃利》、《父辈》、《共产党人》等家喻户晓的诗篇），他的独领风骚的地位才被阿果里所取代。

卡达莱是一位极力追求艺术表现力的诗人，他给阿尔巴尼亚诗歌带来了不少新主题、新思想、新形象和新语汇，他许多诗作中都有着发人深思的哲理性。卡达莱的诗歌，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完美之作，同时，他又是受俄罗斯大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影响至深的诗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卡达莱学习了未来派和象征派的表现手法，运用了阿尔巴尼亚诗人少用的诗歌语汇，增强了表现力和新鲜感。比如“时间的牙齿咬住阿尔巴尼亚的腋下”、“歌儿像从枪口里吐出的红玫瑰一样”、“白色的钟摆敲响敌人的丧钟”（把尸体比做钟摆）、“一

片带血的羽毛伴随着11月的树叶落到地上”（用带血的羽毛象征烈士）、“房屋像暴风雨中的雄鹰直上云天”（用共产党的诞生地——一所小房子象征党）等。这些形象的捕捉和运用，显然受到了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这一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在后来的两部诗集《太阳之歌》(1968)、《时代》(1972）中。

犹如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小说家一样，卡达莱也是创作小说的强手。而且越到后来越明显：小说创作才能更加显示他的文学天赋和成就。

还是创作使自己名声大振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的时候，卡达莱便开始了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的创作（1963年初版，截止到1966年又修改过两次）。这是卡达莱长篇小说创作的处女作，也是他全部长篇中最成功的作品。它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产生了使阿尔巴尼亚人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影响。我们知道，意大利法西斯1939年4月侵占阿尔巴尼亚时，卡达莱年仅3岁，他既没有彼特洛·马尔科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经历，也没有像赛弗切特·穆萨拉依、法特米尔·加塔那样亲赴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目睹人民的丰功伟绩。这就是说，卡达莱不可能采取以往作家的写法来写民族解放战争。他要像画家、摄影家选取合适的角度那样，精心选取自己的角度。他抓住了一名意大利将军赴阿尔巴尼亚搜寻意大利阵亡官兵遗骨这条主要情节线，将他所熟悉的甚至自幼就听到的种种故事，巧妙地、得心应手地编织在上面。具体落笔时，又不直接地去描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是全力去展示各种人物对战争的思考和心态。这就是卡达莱描写民族解放战争的新角度。他的才华和灵气，也主要在这一点上展露出来。一个将军在一个神甫的陪同下，到异国的土地上寻找阵亡者的遗骨，这是一件多么乏味无趣的事情！但是，聪明的卡达莱却让我们看到，围绕着寻找遗骨这件事情，作者采取故事中套故事，链环上结链环的巧技，多层面、多方位、纵横交叉、上下贯通，全面地描绘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画面。难怪一位颇有成就的中国当代作家读

罢小说后感慨地说："《亡军的将领》写得何等轻松从容！作家为没经历过战争而写成战争的作者提供了样本……"

《亡军的将领》问世后，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截至1997年，它共被译成28种文字，印了71版，其中法国社会各界的一片喝彩声，将作为阿尔巴尼亚全民族分外光荣、体面的事件，载入阿尔巴尼亚的史册。请听：

> 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戏剧性不断地伴随着幽默，让我们发现了过去所不熟悉的阿尔巴尼亚文学。
>
> ——法国"南方电台"，1970年3月11日

> 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色调。这是一种从地下目击的战争，即从墓穴里目击的战争。这部书透过死者的魂灵使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进入了共同的图书市场。
>
> ——巴黎《费加罗报》，1970年4月12日

> 毫无疑问，这部书的出版，将是一种新发现，发现了我们几乎不了解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这一文学首先使作家伊·卡达莱进入到高不可攀、求之不得的层次。
>
> ——巴黎《最后一分钟报》，1970年3月13日

> 幽默，含蓄的激情，轻松自由、朴素自然的叙述，机敏的语调，不外露的技艺，曲折的教诲，异乎寻常的景观，喜气洋洋的新人——所有这些因素使这部小说比任何别的作品都更精致。这里有当今正在觉醒的世界的画像，它葆其能量、力量和色彩。
>
> ——法国《罗兰共和报》，1970年5月17日

几十年来，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一直是阿尔巴尼亚作家最爱表现的题材，卡达莱对此也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以多部长篇创作拉开他一生小说创作事业的序幕。紧接着《亡军的将领》，他又创作了《石头城纪事》（1971）和《一个首都的十一月》（1975）两部与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息息相关的长篇。《石头城纪事》也是一部匠心独运、奇妙别致的小说。它摆脱了常见的描写战争小说的窠臼，不去直接地描绘游击队员同法西斯强盗你死我活的争斗与较量，而是选取战争即将结束，曙光就在眼前为历史性时刻，入木三分地描绘社会各阶层一些最有代表性人物的心理状态、情绪和表现，着力展示各种社会力量对待新旧时代、新旧社会、新旧风气的不同立场和感情。卡达莱确实有一支多彩的妙笔，在很短的篇幅里，出神入化地勾勒出历史转折关头的芸芸众生。卡达莱巧妙地编织了各种人物的关系网，读者透过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目睹了新、旧世界交替时刻整个阿尔巴尼亚的社会风貌。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卡达莱对创作这部《石头城纪事》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要在这部小说中反映那些混乱、充满英雄气概、荒诞气氛和悲剧性的日子。那时候，整个山城带着沉重的负担从黑暗走向自由，摆脱了中世纪的陈规陋习，又陷入外国占领者的落后野蛮的桎梏之中，全部生活都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这种痛苦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光明就在前头……"卡达莱的这番话对我们理解《石头城纪事》这部小说颇有裨益。

《石头城纪事》也引起他国有识之士的重视，不少法国评论家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吉尔·拉布兹认为"它是我们时代的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对这部小说的艺术尝试，有的评论家评论道："这部小说打破了小说要有主要人物和围绕主要人物编织全部情节和故事的老观念。小说中没有主要人物，有的是集体群像。作者还吸收了现代主义电影的许多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评论家雅克·雅乌布尔特指出："在卡达莱的这部小说中，或多或少还有黑色幽默的味道。"而阿兰·博斯凯还进一步评论说："卡达莱将肖洛霍夫和卡夫卡紧靠在一起，让

萨特靠近布莱希特，没让海明威离聂鲁达太远。”V.H.德比杜甚至还预言：将来卡达莱一定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候选人。

《一个首都的十一月》在描写的内容方面与《石头城纪事》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仍然没有把新生力量、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游击队和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作为描写的重点，主要表现被革命砸碎了的旧世界和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腐朽势力以及他们的心理、精神生活。不过，这种描摹和渲染远不像《石头城纪事》那样宽泛。作者的目光并没集中在整个旧世界，而是在被埋葬了的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领域里捕捉要描写和塑造的形象。但卡达莱如果能对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士气作些描写和讴歌，小说就会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然而，他没有这样去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乔治·卡斯特辽特·斯坎德培（1405—1468）是阿尔巴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曾领导全国人民同野蛮的力量超过阿尔巴尼亚几十倍的奥斯曼土耳其侵略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用恩格斯的话说：是斯坎德培的利剑阻挡了奥斯曼土耳其对欧洲的进犯，保卫了欧洲的文明。斯坎德培的英雄业绩和对阿尔巴尼亚及欧洲所作出的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为历代的阿尔巴尼亚作家、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历史知识渊博并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联想力的卡达莱，也在这一领域里显示出杰出的艺术才华。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城堡》的创作中。

《城堡》的故事情节很富有传奇色彩：15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将阿尔巴尼亚的一座城堡团团围住，欲逼迫城里的人缴械投降。土耳其人发现，软硬兼施的手腕，“朋友”的中间拉拢都不能奏效，于是决定向城堡发起攻击。先用大炮狂轰一番，然后便向城堡猛烈冲击，但他们失败了。敌兵军事指挥部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又派骑兵攻城。与此同时，工兵也采取攻势，挖了一条暗沟，妄图到城堡内部瓦解对方，以实现夺城的梦想。可是，由于城堡里的阿尔巴尼亚人保持高度

的警惕，敌人的这一计划也落了空。凶恶的奥斯曼进犯者又采取断绝水源的罪恶行动，向阿尔巴尼亚人施压。坚强的阿尔巴尼亚人节约使用每一滴水，誓死不向敌人屈服。残暴的敌人开始用新式武器，然而，这一招也以失败而告终。气急败坏的奥斯曼侵略者发起了总攻。攻城最终也未得逞，敌军总司令以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侵略行径。狼狈不堪的敌兵丢盔弃甲，仓皇鼠窜。全书的情节安排得非常紧凑，主要矛盾集中在敌我双方的政治斗争中展开，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历史气氛。小说对奥斯曼侵略军的行动计划写得非常详细，层层深入地揭露了敌人野蛮、凶残和茹毛饮血的本性，极其深刻地剖析了杜尔索然·巴夏总司令及其党羽们阴暗、龌龊、险恶的心理。敌人的阵容被描写得兵强马壮，武器装备足以显示出天下无比的威力。但就是这样强大的军队，却在骁勇顽强的阿尔巴尼亚人面前遭到惨败。作者对这种反衬手法的成功运用，很是值得称道。卡达莱还把表面上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的奥斯曼军队的首领在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腐朽堕落揭露得淋漓尽致，显示出他驾驭重大历史题材时思想的稳健和艺术上的成熟。

我们对《城堡》作了较为细致的概述和评说，是为了向我国读者说明：卡达莱在描写军事内容方面，也完全懂得并能成功地使用常见的写法。前面提到三部与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相关的小说在写法上有些奇异，那只能说明卡达莱在艺术上有强烈的追求，而不能说明这时候的卡达莱就是一个反传统的先锋派作家。

卡达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的享有很高的威望和特权的作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很听劳动党中央和恩维尔·霍查的指示，并且与霍查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在有的作品中，他还把霍查作为中心人物加以描写和歌颂。这是文坛内外人人皆知的事实。由于他的身份和贡献非同一般，所以连续多年他都是人民议会代表，最后还当上了劳动党中央委员。卡达莱的政治嗅觉很灵敏，并擅长紧跟变化的政治形势创作符合上级要求的政治小说，这一

点在《冷静》(1980)、《伟大的冬天》(1978)及《冬末音乐会》(1988)几部长篇中展示得尤为充分。这也是他得到国家领导人格外的器重和赏识的主要原因。可是，他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时对采访的记者却说："如果你在很年幼时涉猎文学，你就不会懂得太多政治。我想这拯救了我。"言外之意他是不懂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从年幼时起就是与政治无缘的。卡达莱的这番话不符合他本人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一个大作家应有的真诚。

诚然，卡达莱的全部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在劳动党丧失政权的前10年，他的确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党中央的国际政策从事政治小说的创作。但有时因为跟得不准或过于赶浪头而使作品严重失误，因此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批评，这也是事实。例如，因《冷静》和诗篇《中午政治局聚会》等作品"与社会主义根本思想相悖"，而落到非常难堪的境地，甚至公安部门、国家档案馆都立了关于卡达莱的专案。卡达莱也被迫作过检查。只因他是一个具有特殊才能并且得到高层领导关照和保护的作家，所以当时对他的批评和指控只在内部进行，一般人士和读者对此全然不知。许多年过去了，前不久出版的《一部关于卡达莱的档案》，才将许多从前人们不了解的真情公布于天下。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也把巨大的冲击波带到了阿尔巴尼亚。1990年年底，阿尔巴尼亚政局开始动荡起来，不久，劳动党就丧失了政权，卡达莱也受到不小的冲击。有些极端分子甚至捣毁了他在故乡纪诺卡斯特城的老宅。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与法国文化界老早就过从甚密并早已有所准备的卡达莱，便偕夫人埃莱娜及女儿去了巴黎。

对于卡达莱的出走，阿尔巴尼亚人民群众中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去法国寻求政治避难，背叛了祖国和人民；有的则说他具有双重国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仍然很关心。据我观察，他虽然与家人侨居巴黎，但仍然经常回国参加某些重要的社会活动，接受媒体的采访，到大学里发表演讲。1999年科索沃被轰炸期间，他异乎寻常地四处奔波，多次去科索沃巡视难情，亲

自给美国总统写信，呼吁为拯救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命运而抗争。他还写了两部关于科索沃的纪实性作品，表现出对科索沃阿族兄弟的极大热忱。不过，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霍查本人，他却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极端主义做法。他甚至扬言霍查连做一个老战士的资格都没有。对于卡达莱这种全盘否定历史、反对一切的极端做法和言论，绝大多数具有正义感的阿尔巴尼亚人都很反感。因此，作为一个作家，卡达莱确实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文名，然而，如果用一个人，一个正直公道、有良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标准来衡量，应该说，现如今的卡达莱的名声与过去相比，委实是降低了不少，有些人甚至对他嗤之以鼻。

也许人们要问：卡达莱毕竟是一个作家，这些年来，在法国他主要干了些什么？事实上，作为一个作家，卡达莱把主要精力还是用在了长篇小说创作上。这期间他几乎每年都有一部长篇问世。这些作品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题材小说和以民间传说为基础而创作的魔幻小说；一类是描写阿尔巴尼亚当今社会生活的“暴露性”小说。这些小说有的是在原来已有的短篇或中篇的基础上加以膨胀和扩充发展成长篇；有的是平地起高楼，纯属新作。从写法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卡达莱，不仅完全抛弃并恶语咒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且也加进了不少魔幻成分，甚至黑色幽默的色彩。青少年时代他的作品中那种高昂热烈的激情，对人生和未来持有的美好崇高的理想，已全然看不到了。

第一类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以后的年份》(2003)、《粉碎的四月》及《是谁带来了朵露蒂娜》(2004)。前者描绘出奥斯曼土耳其撤离阿尔巴尼亚之后，祖国被列强宰割，城乡一片凋零，社会停滞不前的凄惨图画。《粉碎的四月》触及到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社会现实，但作者批判、鞭挞的宗法制度下的伦理道德、世俗观念，在今日的社会中依然存在。这种封建的落后势力，一直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当受到抵制并逐步加以取缔。《是谁带来了朵露蒂

娜》是根据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的主要框架而改编、创作的。不过，作者的意图是呼吁阿尔巴尼亚人积极行动起来，团结一致抵抗敌对势力的种种罪恶阴谋。这一类小说是写得好的，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

另一类小说是卡达莱这15年中创作的主要成果。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梦之宫殿》（1999）、《三月里寒冷的花》（2000）、《在一个女人的镜子前面》（2001）、《无广告的城市》（2001）、《留利·马兹莱克的生活、游戏和死亡》（2002）、《影子》（2003）及《月夜》（2004）等。

应当说，《梦之宫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部，作者将他自幼开始直到阿尔巴尼亚政局剧变之前所受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理想教育，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怀着忏悔、卑微的心理，谴责一切信仰，将笛卡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锅烩，加以无情的嘲讽和攻击。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卡达莱侨居法国后，面对西方政坛和文化界所发表的政治宣言，最能体现他现如今的政治信仰和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它一问世就得到西方世界的青睐，瓦兰迪·普仁戈就说：“他的作品曾经一直写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单上，即使他只写《梦之宫殿》这一本书，也配得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三月里寒冷的花》采用数码结构主义的写法，运用荒诞夸张的笔墨，描述了姑娘与蛇结婚，互相残杀流血的陋俗恶习重新抬头、盗窃抢劫行为遍地发生的黑暗现实，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当今的阿尔巴尼亚社会，是一种毫无希望，任何人都没有出路的社会。小说灰暗的色调，悲观的倾向将作者消沉的情绪和阴暗的心境展露无遗，连专门以出版卡达莱的作品为营生的“奥奴弗尔”出版社，在对本书的介绍中都说：“这是卡达莱平生第一次如此阴郁地、悲观地出现在阿尔巴尼亚的现实面前……”

《在一个女人的镜子前面》是由《带鹰的骑士》、《在一个女人的镜子前面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协会的历史》及《仙鹤飞走了》3部短长篇合成的微型长篇小说集。第一部写的是一个犯罪者从法西斯主义到共产

主义所走过的道路。第二部把阿尔巴尼亚作家协会描写成阿尔巴尼亚最黑暗最可怕的一个机关，从而谴责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部写了一个富有才华的阿尔巴尼亚诗人经历的种种折磨和苦难。人虽然还活着，然而在精神上已经死了。这3部小长篇表达了卡达莱对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思想的愤懑和苦闷无奈的心绪。通过这3部微型长篇，卡达莱也否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留利·马兹莱克的生活、游戏和死亡》所讲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小说详尽地描画了马兹莱克艰难苦恨的人生征程，继而讲述了他被迫逃亡，死在他乡的故事。

难道卡达莱否定的只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晚期的一切吗？不，他要否定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当然还要包括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无广告的城市》宣扬：还是在1959年，当他还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时，就感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窒息了他的才华，使他对文学的激情一天天在泯灭。于是便偷偷地写起这部向共产主义世界进行大胆的挑战的《无广告的城市》。卡达莱抛出这部小说的目的无非是要说明：远在40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了。

《影子》写于1984年至1986年，当时未能得到出版的许可。手稿秘密地保存在法国一家银行里，政情发生变化后才得以出版。

《月夜》讲的是一个名叫玛丽阿娜的姑娘受不了社会舆论和上层建筑关于道德标准的压力而被迫自杀，成为一个可悲的牺牲品的故事。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悲剧恰好发生在国家总理“自杀身亡”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这部小说的针对性和干预现实的色彩。

卡达莱的作品，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受欢迎的盛况是空前的。

迄今为止，卡达莱的作品用35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共出版了637次。其中《亡军的将领》用29种语言出版了71次；《城堡》用14种语言出版了40次；《石头城纪事》用17种语言出版了34次；《粉碎了的四


月》用 14 种语言出版了 31 次；《是谁带来了朵露蒂娜》用 13 种语言出版了 23 次。由于篇幅所限，出版 20 次以下的作品，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通过对上述一些作品概括性的描述和对重要作品出版情况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卡达莱侨居法国所创作的作品与在社会主义年代里他所留下的那些经典性作品相比较，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想当年，身为人民议会代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卡达莱积极向上，勇往直前，是建设和保卫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文学的先锋。那时候，他的作品充满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作品的艺术水平相当高，是许多青年作者学习写作的范例，也得到国外广大读者和文学界里的行家里手的广泛认同。当时，他是阿尔巴尼亚文艺工作者的一面旗帜，为国家和人民赢得了巨大的光荣。而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和阿尔巴尼亚国情的骤变，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信仰和理想追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大逆转，由一个进取心极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蜕变成一个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攻击者。这是何等令人痛心！还是在社会主义年代，卡达莱的文名就蜚声阿尔巴尼亚国内外。而侨居法国后，他的知名度似乎比从前又高了许多。不过，从上面列举的一些作品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情况来审视，各国读者更多的还是喜欢卡达莱在社会主义年代创作的那批精品佳作，而并不是近年来他炮制的一些乌七八糟的大杂烩。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现在，卡达莱荣获了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世界文坛要事。不过，我们还想知道，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看重的是卡达莱哪个时期的作品？莫非是他的全部作品？或是某一时期的作品？这倒是一个我们更感兴趣并且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伊斯梅尔·卡达莱及其部分作品对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1964 年，我们的老前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戈宝权主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诗集《山鹰之歌》中，就选了他的《祖国》、《共产主义》两首短

诗。1967年秋天，卡达莱随莱索尔·培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代表团访华，写下了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情谊的诗篇《天安门之歌》，由笔者译出后发表在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1992年，应作家出版社特别约稿，笔者翻译、出版了卡达莱第一部，也是迄今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与此同时，应中央电视台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之约，笔者还翻译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摄制的故事影片《亡军还乡》（上、下集）。影片在央视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好评。1994年，由飞白先生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诗库》中，选取了由笔者翻译的卡达莱的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节选）。在2005年第6期的大型文学月刊《飞天》上，发表了由笔者翻译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诗人五大家”一组诗歌，选登了卡达莱的《斯坎德培的肖像》、《老战士之歌》、《母亲》（颂诗）3首诗。笔者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卡达莱的作品在我国翻译、出版。

郑恩波



[illegible]、[illegible]们都回来了。
[illegible]，天气一直[illegible]。

第一[illegible]

第一章

雨夹雪洒落在异国的土地上，打湿了用混凝土铺就的飞机场跑道、建筑物和人群。它浇灌平原和山丘，在公路黑黑的柏油路面上，闪烁出白光。如果不是秋初，除了刚刚到达这里的将军之外，任何人都会觉得这场单调的雨是一种痛苦的巧合。为了将在最末一次战争[①]中阵亡、散葬在阿尔巴尼亚全国四面八方的军人的遗骨运回国内，这位将军从一个国家来到阿尔巴尼亚。

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春天就开了头。但是，最后的协议，只是在八月末才签字，恰好碰上雨季开始了。时逢秋天，这雨可是有个下头呢。这一点将军是晓得的。出发之前，他了解了有关阿尔巴尼亚的许多知识，其中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气候，也掌握了一点常识。将军知道，阿尔巴尼亚秋天阴霾多雨。然而，假如在他读过的书上真写着阿尔巴尼亚秋天阳光充足，气候干燥，面对这场雨他就不会觉得突然。事情恰恰相反，原因在于他总是觉得，只有在雨中他的使命才能完成。也许这是受书籍或电影的影响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乘机旅行和阴愁多雨的时日，都给他增加了思乡恋故的心绪。

从机窗向外望去。他长时间地俯瞰群山万壑威严可怕的景色。锋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利的山尖，仿佛随时都要划破机腹。处处都是陡峭的土地，将军自言自语地说。在这片土地上，似乎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在群峰众谷当中，他到这儿将召集起来的士兵，时而穿破云雾，时而又被云雾淹没，向雨中涌去。霎时间，他觉得完成这一使命是不可能的。可是，后来他又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怀着自己肩负这一使命的豪情，竭力同群山那种可怕的充满敌意的景观展开搏斗。在他的国家，成千上万的母亲，在等待着她们儿子遗骨的到来。他将把遗骨运回来还给她们，完成他那伟大而神圣的任务。他将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一个阵亡者都不应当忘记，他们的身躯绝不能留在异国。啊！这可是一项崇高的使命！旅途中，他几次重复出发之前一位伟大可敬的夫人对他讲的话："你将像一只高傲而孤独的鹰，在那可诅咒的悲剧性的山峦上空飞翔，你将把我们那些苦难的小伙子，从它们的咽喉里和爪子下面拯救出来。"

而现在，旅行即将结束，当把群山甩在后头，在峡谷里而后又在平原上空飞行的时候，将军自己觉得轻松自在极了。

飞机在湿漉漉的跑道上降落了，跑道两侧亮起了许多盏时而红的，时而绿的灯。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士兵出现了。接着又出现一个。在机场建筑物前面，几个穿风雨衣的人，向正在停下来的飞机走来。

将军第一个下飞机。他的后边是陪同他的神甫。湿润的秋风，强有力地扑打在脸上，于是他将衣领竖了起来。

一刻钟以后，他的汽车便飞快地向地拉那驰去。

将军把头朝神甫那边转过去，神甫正默默无声地朝车窗外面张望。他的脸是冷淡的，毫无表情。将军懂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他说，于是便点着了一支香烟。然后，又向外边望去。玻璃上满是雨水，因此在他看来，异国土地的外貌便打了卷儿，歪歪扭扭地变了形。

远处传来了火车头呜呜的鸣叫声，将军竭力想弄明白火车是从什么方向通过，从他这边还是从神甫那边。火车是从他这边通过。他的目光随着火车而去，直到它消失在雾气中。然后，他朝神甫那边转

过身去，可是，神甫的脸色冷漠，没有表情。将军再次感觉到，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他说。他甚至还想到再也没有什么可想的了。旅行途中，他把一切事情都考虑过了。现在，他累了，最好别再去打任何新的主意。足够了，最好还是照照小镜子，看看自己的军容是否整齐吧，这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呢。

他们抵达地拉那的时候，天色已晚，雾气笼罩在楼房、街灯和公园里光秃秃的树木的上空。将军活跃起来了。从车窗向外望去，看见许许多多的行人正在雨中急急忙忙地朝前赶路。这里伞可真多呀，他在想。他想对神甫说点什么，因为默默不语使他感到寂寞，不过，他并不晓得跟神甫说什么才好。从他坐的那侧，看到了一个教堂，再远一点，还看到了一个清真寺。在神甫那边，耸立着尚未竣工的楼房，四周围着施工用的脚手架。安装着红眼睛一般的灯盏的起重机，如同妖魔在雾气里活动。将军把教堂和清真寺指给神甫看，但是，神甫对此毫无兴趣。这说明让另外的事情使他产生兴趣是困难的，将军在思考。现在，即使他有点兴趣，也没有交谈的对象。阿尔巴尼亚陪同者，坐在神甫前面，机场上迎接他们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议员和部里的代表，是乘另一部车，跟在后边。

在达依迪宾馆①，将军自我感觉不错。他走进他的房间，刮了脸，换下了军装。然后下楼来到前厅，要了国际长途，同家里通了话。

将军、神甫和三个阿尔巴尼亚人，在一张桌旁坐好，谈论起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来。他们回避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话题。将军异常严肃、殷勤，神甫说话不多。将军摆出一种架势，让人明白：他是主角儿，尽管神甫说话较少。他讲述了人类所建立的与埋葬士兵有关的美好传统，提到希腊人和特洛伊人，说起他们在战斗的空闲时间里，举行极为隆重的葬祭仪式。将军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感到欢欣鼓舞，心想他将非常出色地完成这一重要而神圣的使命。成千上万的母亲在等待

① 达依迪宾馆是六十年代地拉那最大、设备最好的旅馆。

着她们的儿子，她们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确实如此，这种等待同她们期盼自己的儿子活着归来是不一样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死者也能被人期盼，受到迎接。他要把许许多多儿子的尸骨，送到母亲手里。当年，那些愚蠢的将领不会率领他们作战。将军对自己担负这一使命感到很自豪，要竭尽全力去完成。

"将军先生，有您的电话……"

将军神气十足地站了起来。

"先生们，请原谅!"他步履威严、大步流星地向宾馆门口的服务台走去。

他又迈着同样威严的步子走回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神甫、将军和三个阿尔巴尼亚人，坐在桌旁喝着白兰地酒和咖啡。谈话变得更加热烈，将军再一次摆出一副架势，让别人懂得，他是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角儿，这是因为，神甫虽然有上校军衔，但在这种场合，他只是一个魂灵的代表。他是主角儿，想谈什么，就把话题在哪个领域里展开。各类品种的白兰地、世界各国的首都、各式各样的香烟全谈到了。在宾馆的这间挂着沉重窗帘的大厅里，听着异国甚至比异国音乐还别有情趣的音乐，将军自我感觉真是妙极了。他总是迷恋文明，贪图舒适享乐，对到其他国家旅行，已成为一种嗜好。旅行使他想念起家里十分美好的安逸生活。在这种国际性的宾馆里，在遥远的航线上，在飘扬着各种国旗的港口，在外国的语言当中，每一点都有很吸引人的东西。

将军感到兴奋，特别的兴奋。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喜悦的波浪，为什么能卷到他的身边。这是一个在糟糕的天气里，完成了一次危险的旅行，而找到一个安身之地的旅行者的喜悦。那小小的黄黄的白兰地杯，将群山那淡绿色的撩拨人心的容颜，越来越快地从他的面前驱散了。现在，这酒杯在桌子上正一次又一次地骚扰着他。"简直就像一只骄傲而孤独的鹰一样……"突然，他觉得自己全身变得孔武有力。成千上万的士兵的遗体埋在地下，那么多年来一直

在等待他的到来。现在，他来了，要把他们从泥土中取出来，送给他们的父母和亲属。他用地图、人名单和准确无误的记录把自己装备起来，好似一个年轻的基督。其他的将领，曾率领望无尽头的队伍，走向失败，走向毁灭。而他来到此处，却是要拯救出他们当中尚还存留下来的一点点东西，使它们摆脱被忘却和溃亡的境地。他要在墓地辗转逗留，仔细巡视每座坟墓。他要在当年的战场上，到处转悠，以便寻找到所有的失踪者和遗失者。在与泥巴的搏斗中，他不承认会有失败，因为他是用精确的统计学的魔力武装起来的。

他代表一个文明的大国，因此他的事业应该是宏伟的。他的事业，有着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伟大之处，有着荷马史诗中的安葬意味。啊！你们这些手里擎着伞的阿尔巴尼亚人，将会怎样地目瞪口呆吧！

将军又回敬了一杯。从这天夜里以后，每一天，每个晚上，在他的遥远的祖国，所有期盼亲人尸骨归回的人，都将这样谈论他：他现在正在寻找呢。这会儿我们到电影院看电影，到饭店美餐，去散步，可他却在异国他乡四处奔波，任何一个小地方都不放过，寻找我们惨遭厄运的儿子们。噢，这工作太繁重了，不过，他知道怎么干。人家不会瞎派他去的。

愿上帝帮他的忙吧！

第二章

镐头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神甫划着十字，将军以军礼回敬，公用局的老工人，高高地抡起镐头，反复朝地上刨下去。

也就是说，寻找士兵遗骨的工程开始了。将军心神惶遽，两眼望着在他们脚下叽里咕噜滚动着的第一批湿漉漉的土块。这是他们挖掘的第一座坟，大家像冻僵了的冰人似的团团围在那里。他在自己的本子里写道：阿尔巴尼亚专家是一位黄头发、瘦脸盘的俊小伙子。公用局的两位工人吸着香烟，第三位工人叼着烟斗，而最年轻的那一位，倚着镐把，以一种若有所思的眼神观望着。他们需要学习挖掘遗骨应遵循的程序，所以都站着观看第一座墓的挖掘过程。

将军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工人脚下逐渐增高的一堆土块。黑黢黢、软和和的土块散发着雾气。

瞧，就是它，异国的土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土地跟任何土地都一样，那黑黑的泥巴与任何地方的泥巴也相似；土壤中那些小石头，那草根，还有那雾气，也都毫无二致。然而，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是异国的。

在他们身旁的公路上，不时地响起迅速飞驰的汽车的鸣叫声。一般说来，士兵的墓都修在公路旁。他们挖掘的墓也是这样。在离公路稍远一点的地方，牛群正在吃草，它们那零星的哞哞的叫声，在沟谷

里安然地回响。

将军稍微受到一点震动。一堆土块在逐渐加高，一刻钟以后，挖掘工的膝盖就给挡上了。当其中的一个挖掘工用锹清除堆积起来的粘泥巴的时候，他休息了几分钟。然后，又跳进坑里。

一群野鹅在天空高高地飞翔着。

一个孤单单的农夫，拉着缰绳牵着马，正从公路上走过。

“祝你们工作顺利!”农夫说道，看来他并不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活计。围在坟墓周围的那些人谁也没搭讪，于是农夫便向前走去了。

将军时而望望挖出的泥土，时而瞧瞧阿尔巴尼亚掘土工的脸色。他们脸上的表情安详而严肃。

他们在想什么呢?将军暗暗对自己说。这五个人要把整个军队从坟里挖出来，他们爱干这个活儿吗?

可他从掘土工的脸上，什么也弄不明白。其中的两个人各自点起一支烟，第三个人抽烟斗。另外一个最年轻，继续依偎镐把站着，看得出来，他的心思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这会儿，年长的那位工人跳进齐腰深的坑里，专家向他讲解一点什么。他们谈了一阵子，工人又重新挖了起来。

“说了些什么?”将军问道。

“我没听清楚。”神甫说。

所有的人都默默无声地站着，好像在参加什么人的葬礼似的。

“有幸的是雨季还未开始，这真是太好了!”神甫说。

将军举目向前望去。地平线湮没在云雾中。在遥远的地方，弄不清楚是山峰高高地耸入天际，还是团团云雾悬在空中。

挖土的那位工人把土挖得更深了。将军望着他那银灰色的头发;那头发随着镐头凿地的节奏摆动着。将军觉得他很像哥白尼，真是莫名其妙。

显而易见，他是一位蛮有经验的工人。将军心里琢磨着。他们决定让他当挖掘队负责人，这可不是盲目从事。将军满心希望工人挖得

再快些，坟墓尽早打开，尽快地找到那些阵亡者。别的工人刚刚开始挖，他就无法忍耐了。他多么想一掏出人名单，上面就满是红十字，而每个红十字就是一名找到的士兵啊！

现在，镐头凿地发出的响声已是来自很深的地方了，这声音好像是从大地的尽底处传出来的。将军突然觉得有一个警报传遍了他的全身。

假如阵亡的士兵不在这儿呢？将军在想心事。如果图纸不准确，为了寻找一个士兵，我们被迫要在两处、三处、十处去挖掘，那可如何是好？

“如果我们挖不出什么呢？”将军对神甫说道。

“那我们就重新再挖，付出双倍的代价。”

“这事不在乎钱，重要的是我们得挖到。”

“应当挖到。”神甫说，“我们不可能挖不到。”

将军心神不安地望了望他的表情。

“这里给人的印象是，从来就没发生过战斗。”将军说，“只有那些咖啡色的母牛在此放牧过。”

“这是后来经常给人留下的印象。”神甫说，“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这倒是真的，过去很长时间了，所以我才担心。”

“您为什么要担心？”神甫说，“这里的土质很稳定，里边埋了什么东西，可以保存许多许多年不坏。”

“对，是这样。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相信他们就埋在这附近，在我们脚下只有两米深的地方。”

“您不相信？那是因为战争期间您从未来过阿尔巴尼亚。”神甫说。

“可怕吗？”

“可怕。”

现在，年长的那位工人几乎全身都埋进了土坑里，其他人围着他距离更近了。阿尔巴尼亚专家全身弯到坑边，一边用手对他指着一点什么东西，一边不停地说话。

土里净是一些小石头，碰到铁锹，发出一种混浊不清的响声。将军回忆起在他出发之前那些老战士对他讲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为了表示对阵亡在阿尔巴尼亚的同伴的坟墓的关心，他们曾多次去过将军家里。

我的短剑撞击在小石头上，同它们摩擦，发出一种令人战栗的声音。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土块劈去，可是面对这种泥土，我的剑是无能为力的。费了好大劲儿它才劈下拳头大那么一块泥巴，我自言自语道：我若是在工程兵队伍里服役，随身携带一把铁锹，很快很快地挖土该有多好。因为我最亲密的伙伴就死在这附近，他的腿长拖拖地甩在一个水沟里，脑袋朝下呛着水。我把他的短剑也从他的腰上拔下来，开始用两只手同时挖土。我想给他挖一个深坑，因为这是他生前的愿望。他常跟我说："假如我死了，可要把我深深地埋好，因为我害怕，可别让狗和胡狼把我扒出来，就像在戴佩莱那[1]发生的可怕的事情那样。你还记得，在戴佩莱那，狗干了些什么吗?""我记得。"我吸着烟对他说。而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一边挖土，一边对自己说："你别担心，我要把坑挖得深深的，很深很深的。"挖完坑把他埋葬了之后，我又竭尽所能把上面弄得平平的，不留任何一点痕迹，连一块石头也没有。因为任何痕迹都会使他害怕，他怕人们凭着痕迹把他找到，将他从土下面再拽出来。夜色中我朝着与机枪相反的方向朝前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黑暗中我埋好的伙伴，心里想：别害怕，人们是没法找到你的。

"从迹象看，我们什么也找不到了。"将军说时，竭力掩饰心中的火气。

"难说。"神甫说，"希望还是有的。"

---

① 戴佩莱那是阿尔巴尼亚的古城。

“战争中埋葬死者的坑挖得都挺浅的。”

“也许是埋了第二次。”神甫说，“埋葬第二次这是常有的事，甚至还有埋葬第三次的。”

“也许是这样。不过，如果葬得深的话，我们就永远也结束不了这项工作了。”

“我们还可以再雇另外一些临时工。”神甫说，“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再要二十个工人。”

“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将军说。

“是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也许不知哪一天没准还可能要一百个呢。”

“难说呀。”

“不过，这五个我们是长期需要的。”

“对。协议上是这么写的。”

“可他们干了些什么呢?”将军说，“还是什么也找不到?”

“现在挖的深度已到了极限。”神甫说，“如果有，现在应该挖到了。”

“我觉得这个头儿开得不顺利。”

“也许是泥土移动了。”神甫说。

阿尔巴尼亚专家弯下腰来，更加靠近土坑，别的人全都凑到他跟前来了。

“找到了。”年长的老工人说道。因为他低头在坑底下说话，所以声音听起来显得又远又不清楚。

“挖到了。”神甫说。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公用局的工人一起动了起来，依偎镐把站着，若有所思的那位最年轻的工人，跟同志要了一支香烟，点火抽起来。

年长的老工人开始用铁锹往外捡骨头。人们的脸上毫无害怕的表情。骨头与湿土粘在一起，看上去好像是一块块干木头混在了泥土

里，刚刚掘开的泥土，在四周散发着清香气。

“消毒剂！”专家喊道，“把消毒剂拿来。”

两个工人朝停在路边的卡车跑去。那卡车就在小轿车后面。

专家在遗骨中间找到了一件小东西。

“瞧瞧这个挂在脖颈上的身份牌。”专家说道，手握一把钳子，把身份牌指给将军看，“请你不要动它。”

将军把脸靠近，去看这件小东西，好不容易认出了圣母玛利亚的头部。

“这是我们军人的身份牌。”将军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知道我们的脖子上为什么挂这么个身份牌吗？”一天他对我说，“有朝一日我们死了，好让人们找到我们的尸体。”他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你以为人们真的会寻找我们的遗骨？好吧，就算他们会寻找，你以为这事就能安慰我？没有比战后寻找遗骨这种事更虚伪的了。我可不想为自己得到这种好处。别让他们到我将要倒下去的地方胡折腾了。说不定哪天我就把这个身份牌给扔了。有一天他真的把身份牌扔掉了，成了身上无身份牌的人。”

经过消毒处理之后，专家将几块骨头逐一地量了一下。然后把铅笔夹在又细又长的手指中间，在本子里计算了一会儿。

“身长是一米七三。”专家说道。

“很准确。”将军查了一下人名单，然后说道。

“把骨头包装好。”专家对工人们说。

将军向一个工人望了一眼，走过去坐到道旁的一块石头上。他掏出烟盒，疲惫地点着一支烟。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看我？”将军自言自语道。

几分钟以后，地上面有五处同时被挖起来了。

无章节的一章

“我们简直是乱了套了。”将军说，“我们走进了死胡同。”
“我们再来看一次图纸吧。”
“什么也弄不明白。坟墓的号码搞乱了。”
“从这情况来看，坟墓速写图画得很快，是撤退时候画的。”
“有可能。”
“我们从右边试挖一次吧。平地上这条路通向什么地方。”
“通向附近农业社的地里。”
“那我们就从这边试一次。”
“白费力气。”
“该死的烂泥。”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从右边试一次。”
“这条平路不会把我们引导到任何地方。”
“这不是探寻尸骨，而是制造恐怖。”
“这烂泥有多讨厌！”
“我是落得无路可走了。”
他们那惴惴不安的声音，连同脚步声一起消失在平坦的原野里。

第三章

三周以后，他们回来了。那是一天傍晚。他们的草绿色小轿车，在“达依迪”旅馆前面高高的松树下边停了下来。将军第一个下了车，脸上露出疲倦而惊愕的表情。甚至他的脸都有点变瘦了，或许至少是在旅馆广告的红灯映照下，现出了瘦弱的面容。刹那间，他那僵硬的目光落到了轿车上。这些人起码得把烂泥巴擦掉才是呵，他气愤地想道。可是，他们是刚刚才到达这儿的，司机是没有过错的。这一点他是明明知道的，只是不想认这个理就是了。

他迅速地登上楼梯，取了很多封来信。要了国际长途电话，想要跟家里谈谈心。然后，慢腾腾地走进他的房间。

神甫也来到他的房间里。

一小时过后，他们来到一大厅，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二人都洗了澡，换了衣服。

将军要了一份弗尔奈特酒，神甫要了一份可可。这是一个星期六，从楼下的饮酒间里传来了音乐声。一对对年轻的情侣，不时地出现在大厅的尽头。他们穿过大厅，进进出出，在饮酒间里往来不断。即使狭窄的过道里，也有人不断地来来往往。大厅里挂着深颜色的窗帘，安放着很大的沙发，显得庄严而又有气派。

“第一期任务总算结束了。”将军说。

“是的，结束了。”

“你怎么想，能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在一年内完成这一工作吗?”

“让我怎么说呢?”神甫回答道，“这取决于我们将遇到的困难和天气情况。但不管怎么样，我想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会完成的。”

“我也相信会这样。”将军说，“开头我们从城郊地区挖掘。最大的困难，将在乡下碰上，特别是在遥远的山区，困难会更加严重。”

“情况您是最清楚了。”神甫说。

“到了山上，我们会遇到很糟糕的事情。”

“我相信。”

“当初他们在山上也是很困难的。”

“没错。”

“明天我再研究一下图纸，制订好第二期工程计划。”

“只求别碰上坏天气!”

“有什么办法?秋天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

神甫两个长长的手指捏着杯子，安然地喝着可可。

长相挺漂亮呢。将军一面偷偷地端详着神甫生硬呆板的侧脸，一面打着主意。后来，突然对自己说起来：他同上校的寡妇老婆干了些什么?他们俩应该有点什么勾当。她挺漂亮；尤其是在浴场时，她显得美极了。将军提起神甫的名字时，她的脸色刷地一下子红了，而且还垂下了目光。他们中间是怎么回事?将军目不转睛地望着神甫的面孔，再次对自己发问道。

“Z上校没有找到，我们是找不到他了。”将军漫不经心地说道。

“也许我们还能找得到。”神甫说着眼睛向低处瞅了瞅，“相信我们会找到他的。”

“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失踪的现场别人不熟悉。”

“是困难。”神甫以一种干哑无力的音调说道，“不过，我们才刚刚开始，往后我们还有好多时间呢。”

这家伙跟上校的寡妇老婆干了些什么?将军在想。我好奇怪，多

么想了解到，这位神圣的父亲跟一个女人能走多远啊！

“肯定无疑，我们应当找到上校的遗骨。”将军说，“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未归回故土的校级军官。其他的校级军官的遗骨早都及时地取走了。他的家庭特别关心此事，尤其是他妻子，更是把它放在心上。”

“是的。”神甫说，“她太关心了。”

“他家里为上校准备好了一口漂亮的大理石棺材没有？”

“准备了。”神甫说，“我们动身来阿尔巴尼亚之前，他们给我看了。”

“真的是一口大石棺，又带墓碑，还栽上了红白两色的玫瑰花。”将军说，“只是里面空空的没东西。”

神甫没说话。

他们静默无声地呆了好长时间。将军在喝白酒，观察、品味着身边异国他乡的生活。猛然间，他觉得自己异常的孤独，孤独得只与士兵的坟墓在一起。见鬼去吧，他不想再去回忆“弟兄们的坟墓”。无论如何他也不想再去回忆。与神甫一起在它们中间转悠了三个星期，这已经足够了。现在，他想甩掉他们，让自己轻松自由一下。他再也不愿去想他们了。这是星期六。他应当歇一歇，解除疲劳。然而，他单独一人，同这个愁眉苦脸、少语寡言、如同黑乌鸦一般的神甫在一起，还能干什么呢？譬如说吧，在这样的夜晚，跳跳舞，会很开心的。可他不能那么干。他是一个外国的将军，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肩负着国家政府的一项使命。不仅如此，这一使命又是如此的阴森可怕！他寂寞之极，也许是累了吧。所以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想象自己跳起舞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正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中间，他的士兵就是与他们作战阵亡、粉身碎骨的。是的，他实在是太累了。到处都是难以行走的路，湿漉漉的坟墓。时而这里坟墓一片连一片；时而那里的坟墓又是那么孤孤单单。遍地是令人讨厌的烂泥，还有那些颓垣断壁的堡垒（如同士兵一样，堡垒也都只剩下空

架子了）。还有，需要把自己士兵的坟墓与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士兵的坟墓从混乱不堪中辨认出来，交涉双方的协议，给公用局的代表开工日收据，到银行办理换汇公证。这一切事情怎么都掺和到一起来了！区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士兵坟墓尤其困难。在证人中间常常还有矛盾；老人们把许多事件和战斗搞得混乱不清。任何事情都弄得不准确，只有烂泥巴知道事情的真相。

将军又要了一杯。

"军队太多了。"他话说得很慢，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他向周围扫了一眼。像平常一样，大厅里很安静，只有在一旁的角落里，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说着什么，而且还不时地发出笑声。这些人只把后背给人家看。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看得出来，他们是一对订了婚的恋人。与其说是在谈话，倒不如说是在互相瞄视对方。小伙子的头长得很端正，高高的宽大的额头，腮下方相当宽。这是个典型的阿尔卑斯山人，将军在想。

服务员坐在高高的服务台后面，他那圆圆的脑袋在两盘橘子和苹果中间，显得很安详。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手里提着一个包裹走进来，坐到桌子旁边，紧紧靠着一个收音机。

"来一杯既不浓又不淡的咖啡。"来者对服务员说。

服务员为他送来了咖啡，而他这个又瘦又矮的男子，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开始写起来。他的两腮长得挺窄，两个颧骨几乎都看不出来。吸烟时，脸蛋上现出两个小酒窝，这样，他那两腮的轮廓，就显得非常清楚。"瞧瞧，阿尔巴尼亚人就是这个样子！"将军说，"好像他在继续谈论那谈了一半还未谈完的话题。这是些很平常的人，简直无法想象，战争中他们竟会变得像野兽一样。"

"噢，战争中他们可是不得了啊！"

"你想想看，他们的人口才多一点儿！"

"问题不在于少。"神甫说。

大厅里又进来一个额头高高的人。

“交给我们完成的这一工作是个什么鬼差使?”将军说，“在所有的地方，不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咖啡馆里，我一看见人们的面孔，马上就情不自禁地琢磨起来：这些人的脑颅是怎么长的？有几天，我看见人的肩膀上面长的不是头，而是脑颅。真见鬼，这是怎么回事，嗯?”

“请原谅，您喝得有点多了。”神甫以充满人情味的音调说道，抬起他那灰眼睛打量将军。顷刻间，将军觉得神甫眼睛的颜色就像大厅一端的电视机的荧光屏一样。好像一个从来不使用的电视机，他在思忖。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就像老是接收同一种、完全弄不明白的节目的屏幕一样。

他向活动在手指中间的白白的酒杯瞅了一会儿。

“照你说，我该怎么办?”将军以一种急赤白脸的腔调说，“您劝我怎么干？难道我需要拿个照相机，拍一些照片，回国以后好给老婆看？或者带一本日记，记些奇闻怪事？啊？您说说看，怎么办?”

“这种事我是啥也说不出来，我只是想说，您好像有点喝多了。”

“可我很奇怪，您一点也不喝。我甚至觉得奇怪极了。”

“我从来不喝这种酒精一般凶的白酒。”神甫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奇怪，现在您为什么不开始喝？每天晚上都应当像我这样喝，以便把白天看见的事情忘掉。”

“我为什么应该把白天看见的东西忘掉?”神甫说。

“因为我们有一个具备这么些可怜的人的祖国。”将军用手指点了点书包说，“您不为他们感到遗憾?”

“请您不要嘲讽我。”神甫说，“我也是一个爱国的人啊。”

将军微微地一笑。

“您知道不?”将军说，“这三天来我发现，我们的交谈挺像现代戏剧里一些令人发腻生厌的对话。”

神甫也微微地笑了。

“这个你是没办法的。人们的交谈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话

剧或喜剧相似。”

“您喜欢今日戏剧吗?”

“马马虎虎。”

将军的眼睛盯了他一会儿，然后便移开了视线。

“我的可怜的士兵。”将军冷不防说了这么一句，好像大梦初醒似的。“我真为他们心疼。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抚养被别人扔掉的孩子的父母。有的时候很需要这些孩子。我为他们能做点什么?如何才能为他们报仇?”

“我也是为他们感到心疼。”神甫说，“我心疼，而且还有满腹之恨。”

“对这些人名单和协议，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死后，我们四处东跑西颠，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搜集起来。他们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这是命运的安排!”

将军点了点头。

真的又像演戏似的，将军自言自语道。

这个神甫好像是钢铸铁打的，将军心里在想。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好奇，真想知道他与Z上校的漂亮妻子在一起时，还保留多少钢铁味道。他心里在嘀咕，目不转睛地望着神甫的脸。他竭力在想象中描摹这位神甫如何同像上校妻子这样的一个女人打交道，当在她双膝旁边坐下时，怎样脱掉那身黑黑的神甫服。真的，是她对神甫感兴趣，还是为了逗闷取乐才这么干?如果他们中间真的有什么事情……归根结底，我何苦要了解这个呢?

将军倾耳静听大厅里那架个头不小的收音机在广播些什么。他觉得阿尔巴尼亚语语调沉重，太难听了。当阿尔巴尼亚农民为了帮他们的忙，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他在坟墓旁听他们讲话的次数太多了。所有那些阵亡的人，活着的时候，肯定都听过这种要命的语言。他在思索着。这会儿听起来是在广播新闻，因为广播员总是不断地重复熟

悉的词儿：特拉维夫①、波恩、老挝。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将军在思考，又去回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军人，他们曾经到过阿尔巴尼亚。他还回想起各种生了锈的铁牌子、十字架、标记、写得歪歪扭扭的名字。大多数人有坟墓，但什么牌子也没有，甚至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坟墓。他们被直接扔进泥巴中，埋进共用的土坑里了。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连烂泥巴的边也没沾，只在名单上有个名字。

一个军人的遗骨，是在南方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里的博物馆里找到的。博物馆是几个热情很高的市民建起来的。在小城的古城堡上，在一个很深的小屋子里，人们在另外一些东西当中，找到了一个人的遗骨。一连好几个星期，业余考古工作者每天都待在城市咖啡馆里，对这些遗骨作各种各样的判断。甚至当军人遗骨搜寻小组到达小城的时候，业余考古工作者中有两个人，正在写一篇既大胆又混乱的文章，想在某一刊物上发表。一个偶然的机会，专家从博物馆那儿经过，根据嵌饰在脖颈上的身份牌，立刻认出了骨架（在业余考古工作者的文章中，对这一身份牌有两种判断：这一身份牌可能是装饰品，要不就是罗马时代的钱币）。可是，专家从博物馆这么一过，却给大家作了最后的结论。此事非常奇怪：军人怎么可能进入城堡中无人出入的地下迷宫里呢？而且为什么要进去？

"那个军人能是谁呢？"将军问道。

"哪个军人？"

"城堡里那一个。"

"噢，对了，我们找到了他的名字。"神甫说。

"是找到了他的名字。"将军说，"不过我想知道，他能否是那些个别向我们提出请求的人家的什么成员。"

"个别向我们提出请求的军人多着哩。"神甫说，"怎么可能把所

---

①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港市。

有军人的名字都记住呢?”

“这倒是真的。再说他们当中还有很多相同的名字。人名单上的名字相当多，我什么也记不住。”

“这个军人曾经像每个战士一样。”神甫说。

“要这些人的详细名字和官衔还有什么必要?”将军说，“说到底，在一堆骨头里能有些什么名字呢?”

神甫点点头，好像是要说：“那你有什么办法！就是这样。”

“他们的名字应该都是相同的，就像他们脖颈上挂的身份牌那样。”将军继续说。

神甫未作回答。从饮酒间里传出音乐声，将军不停地吐着烟圈。

“他们把我们的人打死得太多、太吓人了。”将军仿佛在说梦话。

“这是真的。”

“我们也杀了人。”

神甫沉默不语。

“我们也杀了人。”将军重复说道，“他们的坟墓遍地都是。假如我们军人的坟一个个孤零零的话，那将是非常可耻、非常悲哀的。”

神甫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让人弄不明白，他是“同意”还是“反对”将军的话。

“小小的安慰。”将军说。

神甫又摇了摇头，好像是说：真是没法子呀。

“你叫我不明白。”将军说，“这事对我们来说，是否是一种安慰呢?”

神甫张开双手，说道：

“我是个信教的人，我是不赞成杀人流血的。”

“噢——”将军说。

那对订了婚的恋人站起来，走出大厅。

“我们曾经互相凶狠地杀戮过。”将军接着说，“这些家伙打起仗来可厉害呢。

“这解释为——”神甫继续说，“这不是有觉悟的勇敢问题。这是他们的心理问题。”

“我不明白——”将军说。

“这很简单嘛。”神甫接着说，“在战争中，有些人的行动是受理念支配的，不管这种理念是强或是弱。而另外有些人则是出自本能。”

“是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一种粗野而落后的人民。当他们还是婴儿时，就把枪搁在了他们的摇篮里。就这样，枪就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看得出来。”将军说，“就连拿在手里的伞，也好像枪似的。”

“还是很小的时候，枪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神甫接着说下去，“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基本因素，枪直接影响到阿尔巴尼亚人心理的形成。”

“真有意思。”

“一种东西，只要人全心全意地爱上它，崇赏它，当然是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他也就会使用它。那么，人为什么把枪用得比任何东西都用得好呢？”

“因为要杀人。”将军说道。

“是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总是喜欢杀人或自己残杀。当没有什么人可以交战的时候，他们便自己人杀自己人。您听到过他们流血报仇的习俗了吗？”

“听到过。”

“陈旧古老的本能唆使他们去作战。这是由他们的天性决定的，他们需要明目张胆地杀人。在和平的日子里，他们像冬天里的蛇那样麻木、贪睡，似醒非醒。只有在战争中才完全显示出他们的生命力。”

将军点点头。

“战争是这个国家正常的事情。因此他们打起仗来很凶，很令人害怕，造成不应有的破坏。”

“那就是说，这一人民有着消灭别人和自我毁灭的嗜好，它是注定要消亡的。”将军说。

“当然是这样了。”

将军喝完了酒。这一会儿他说话咬文嚼字慢腾腾的。

“您恨阿尔巴尼亚人吗?”突然他这样发问道。

神甫苦涩地微微一笑。

“不恨。为什么?”

将军把脸贴近他的耳边。神甫闻到烈酒的味道时，轻轻地作了一个很不耐烦的手势。

“还问为什么?”将军小声说，“我们俩都仇恨他们，不过眼下我们不能说，因为任务就是这样……”

第四章

将军和神甫互道晚安。将军关好自己的房间，挨着台灯，在小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尽管已经很晚了，可他还是不能入睡。提包就放在桌子上。他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过去，将提包打开，取出军人名单翻阅起来。有许多页订在一起，四页的五页的，有的还是十页的。他一边一页一页地翻着，一边上百次地读着用大字母写在名单前面的名字："光荣团"、"第二师"、"第二军"、"钢铁师"、"阿尔卑斯营"、"第三特别小队"、"近卫军第四团"、"第三阿尔卑斯营"、"胜利师"、"陆军第七师"、"蓝色营"（侦缉队）……将军在最后这个名字上停顿了一会儿。名单的开头是 Z 上校，下面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分配在连和班里的士兵的名字。"蓝色营"，好美的名字呀，将军思付着。

他把基础名单搁在一边，又掏出另外的名单。这些名单上有很多注解，旁边还划了小红十字。对寻找遗骨，这些名单很有实用价值。军人不按连队而按阵亡的地方划分。在每个名字旁边，还注明了符合地图术语的地名，以及军人的身长和牙齿情况。迄今已经找到的，在名字旁边都划上了小小的红十字，不过，这种红十字在名单上还少得很呢。

应该在基础单子上划上红十字，还应该把第一期工程的计算平

衡一下，将军在思考。可是，时间已经晚了。

他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于是又重新念了起来。在实用单子上，地名变成了圈套，所有那些峡谷、山口、小丘、河流、城市的名字，他都觉得那么特别，那么可怕。他有一种印象，仿佛是这些地方把那些军人在它们中间分开了。有的多些，有的少些。而现在，他来到这里，是要把他们重新带回去。

他的目光落在一个名单上。这是一个“失踪者名单”，领头的又是Z上校的名字。Z上校，一米八二，第一和第十颗牙是金牙。将军念道，然后把整个名单全看了一遍。一米七四，缺两颗边齿。一米七五，上门齿拔掉了。一米九〇，第一颗牙上镶有金属架。一米七一，牙齿一颗不缺。二米一〇，这个人肯定是这个名单上个子最高的。将军在想。在所有的名单上，个子最高的是多少？个子最矮的是知道的：按制度规定是一米五一。总的来说，第四近卫团的人最高。而阿尔卑斯人是最矮的。我干吗要如此荒唐！

将军闭了台灯，躺下了，他睡不着。末了，我若是不喝那杯鬼咖啡就好了！他对自己说。

他望着白白的天花板，奔驰在大街上的汽车的灯光，不时地从上面一滑而过。一束束灯光落在天花板上，在半关着的百叶窗后面，将军觉得自己好像是站在旋转的透视机前面了；陌生的人透视完就走，把地方让给别人。

名单就在桌子上，半合半开，将军想着心事，感到不寒而栗。如果把妻子带在身边该有多美。他们在黑暗中躺着，悄悄地聊天，他会把每件事情都讲给她听。不过，她会害怕的，就像他出发到阿尔巴尼亚之前的最后那些日子里那样。

那是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日子，具有一点新颖的、不熟悉的内容；这一内容第一次进入到他的生活中。阴雨天气刚开始，他就从浴场回到了家里。这时候，第一个人来了。女佣通知将军，说有个人在厅里等他。当时将军正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看书。

陌生人站在窗户旁边。外边天色正在变黑，庭院里的树木，看上去如同高大的垛得很好的草垛一样。门吱扭地响了一声，陌生人往后退了一下，说了声“晚上好”。

“请原谅，打搅您了。”他说话的语调挺深沉，而且很难听清楚，“听说很快您就要到阿尔巴尼亚去，将我们军人的遗骨运回祖国。”

“是的。”将军说，“两周以后动身。”

“我对您有个请求。”陌生人继续说道，从兜里掏出一张弄得很脏的阿尔巴尼亚地图。“我当过兵，在阿尔巴尼亚一连打了两年仗。”

“在哪个部队?”将军向他问道。

“在钢铁师，第五营，机枪排。”

“说下去。”将军说。

陌生人弯腰看地图，用指头指到一个地方。

“瞧，就在这儿。正是寒冬时节，在一次大战役中，我们营被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打败了。趁着夜色我们好不容易逃了出来，朝不同方向散开了。我带着一个受伤的伙伴，天亮的时候，他死去了。于是我把他拖到一个空空荡荡的村口，尽一切可能，把他在村子的一个小教堂后面埋好，然后我就走了。事情就是这样。任何人也不知道他的坟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才来到您这里。假如您有机会顺路到那一带地方去，请您费点心，把他从地下挖出来，跟其他人的遗骨一起运回来吧。”

“他的名字无疑应该在‘失踪者名单’上。”将军说，“名单是非常确切的。不过，再怎么往好处想，您也难以实现良愿，因为找到‘失踪者’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这只有靠机遇帮我们的忙了。”

“我还绘制了一张草图，这是尽我的能力搞的。”陌生人对将军说，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纸上用复写笔画了一个有点像教堂的东西。在这个东西后边画了两个箭头；箭头下边用红笔标出“坟墓”的字样。“在那附近有一条小河。”陌生人接着说下去，“稍远一点，在右边，有两棵柏树。瞧瞧，就在这儿。”在教堂旁边，他还写了（另外几个）字。

“那好吧。”将军说，“谢谢。”

“我应该谢谢您。”陌生人说，“他是跟我最要好的伙伴。”这位陌生人还想说点别的什么，也许是再加上些细节，也许是还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然而，将军那严厉而又官气十足的面容，却让他只把话说了一半就不再做声了。

然后陌生人走了。将军还不明白此人是干什么工作的，就连他的名字叫什么，也不晓得。这只是开了一个头。后来每天下午，他一回到家里，铃声就响起来，厅里又有另外一些陌生人等上了。这是一些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妇女、年老的父母、老战士。他们全都拘谨地坐在厅里的长椅上，脸上带着相同的表情，等着将军接待他们。后来，又有人开始从别的城市和地区来到这里。最后来的人待在厅里就更拘谨了。跟将军讲起话来很困难，因为所有那些他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人死在阿尔巴尼亚的事情，都是很不准确、很不可靠的。

将军把这一切全都记在了本子里，同时还不断地重复说：“请你们不要担心。作战部提供的名单是非常确切可靠的。根据名单我们要把所有的人都找到。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把你们说明的情况记下来，这些也许对我们会有些帮助。”

他们走了，说了感谢的话。第二天，又来了另外一批人。他们披着湿淋淋的防雨布，不安地踩在厚厚的地毯上；地毯上留下了皮鞋印。这是一些胆小怕事的人，恐怕名单上忘写了他们的那些阵亡者。还有些人拿出战时从军事指挥部那里收到的电报给将军看。电报上注明了军队“为祖国而亡”的日期和地点。还有另外一些人，特别是年迈的父母，不相信凭名单可以把他们的儿子找到。因此请求完将军尽一切努力干好这件事之后，便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每人都有一部历史，将军被迫一部一部地听下去。从重新嫁给别人，但又偷偷地背着丈夫关心原配郎君的妇女，到穿着套头毛衣和风雨衣，从来不认识他们的军人父兄的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他都逐一地听过了。

最后一个星期，来访者增加了很多。当时，他刚从军营回来，就碰上厅里聚满了人。这个厅颇像聚集了许多患者的医院走廊，只不过这里比医院更安静些罢了。人们静悄悄地坐着，一连几小时，一个劲地望着地毯上的图案。只有当一个刚刚来到的人走进来，像别人一样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时，人们才把头转一下。

有几个农民是从远地方来的。他们每人都戴了一块如同包袱皮似的围巾。这会儿，他们都把它搁在腿上了。将军的车在屋外停下来。然而，在大门口，第一件映入他的眼帘的东西，却是那些靠放在铁栅栏旁边的自行车和不时地在人行道旁边停下来的小轿车。然后，他直接走进厅里。农民们粗毛制的衣服被雨水打湿了，散发着一种很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与不知哪个娇美阔气的妇人用的香脂散发出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就更难闻了。人们全都毕恭毕敬地站起来，依然还像原来那样默默无声。任何人也不讲一句话，因为大家知道不需要讲话。

“爸爸！”当他脱了衣服，走进餐厅时，孩子问道，“这都是些什么人？”

将军为之一笑，努力要说句笑话，可是，大家却迟迟没有反响。

“爸爸，他们要去打仗吗？”男孩子问道。

“不，他们从前打过仗。”

“那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因为他们有当兵的人，要给那些人带信和包裹。”

然后，他吃了饭，来到厅里。人们挨个跟他谈话，他们的话有多相似啊！他们的人当中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相似，就像他觉得每一天都如同梦中见到的头一天一样。为丈夫或儿子而来到此处的女人，控制不了激动情绪。将军变得一次比一次更加烦躁，更加爱发脾气。

“不要哭了！”一天他对一个妇女训斥道，“这不是擦眼抹泪的地方，够了！您儿子是在战场上死的，是祖国派他到那儿去的。他死得壮烈，像个英雄。”

"那是瞎勇敢！瞎英雄！"女人说。

一天，有一个个子高高的男人，刚一进来，就站在门口大声喊：

"您的使命是一种虚伪的勾当。"

将军气得脸都黄了。

"被收买的叛徒才这么说话。走开，滚出去！"

在星期三、四的时候，在那些等着谈话和接待的人中间，有一位很老的妇女，她是在一个小姑娘的陪同下来的。老太太非常疲惫，因此从一开始将军就对她很关照。

"那里有我的儿子。"老太太讲话的声音有气无力，"我只有一个儿子。"她掏出一个小手绢包，用颤颤巍巍的双手将它解开，取出一张因时间太久而发黄了的电报。她把电报递给将军；将军看了关于他儿子之死的公文，这种公文已经格式化，他在军事指挥部见得多了。他的目光落在最后那句话上：他为祖国战死在斯大林格勒。

"女主人，"他慢慢地对她解释道，"我将要到阿尔巴尼亚去，不是去俄国。"

老太婆睁着那双视力很差的眼睛望了他一会儿。但是，看得出来，她并不懂将军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求你一点事。"她说，"请你了解清楚：他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他断气的时候，是谁在他身边，谁给他水喝，他留下了什么遗言。"

将军尽力又给她解释一遍，可是，老太婆什么也不懂，只重复开头讲的话。其他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默默地不讲一句话。

"老妈妈，您走吧！"最后，一位男子以一种甜蜜的声音对她说，"将军先生将按照您说的那样去做。"老太婆道了谢，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拉着小姑娘，走了。（另外有一次，在某人的电报上竟写出了"非洲"的字样。）

第二天，一个满面愁云的人，一直等到所有的来访者都走了，也没离开。

“我曾经是个将军。”他几乎生气地说，“我在阿尔巴尼亚打过仗。”

两位将军怀着一种蔑视对方的情绪相互望了望。原因是：一个望着先前吃了败仗的将军；另一位面前站着的是和平时期的将军。

“您有什么要求?”和平时期的将军向败将问道。

“实际我什么要求都没有。”败将说，“实际上，我不从您这里期待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说真的，我不相信。说到底，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不过您既然已经开始干这件事，那就干到底好了。见鬼。”

“您可以说得更清楚些。”将军说。

“我没有别的什么好说。我只是想事先提醒您：您可要当心！您要高傲些，可不能在他们面前低头。他们会向您挑衅，也许还要讥讽您。您应当懂得如何回敬他们才是，您应该有所警惕。他们要竭力侮辱我们军人的遗骨。这些人我可是太了解了，他们常常嘲笑我们。战时就嘲笑过我们，您想想看，现在又会怎么干?”

“我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将军说。

那位败将遗憾地瞟了他几眼，似乎想要对他讲：你真可怜。然后连声好都没问就走了。

另外的三天，是最后的日子，厅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将军生活得太累了，他想尽早动身。在那几天里，他妻子的脾气也变得很坏，动不动就发火。

“你拒绝这个任务就好了。”一天晚上，将军和妻子躺在床上没睡，妻子对他说，“我觉得死亡好像来到了我们家。”

他尽心尽力地劝说妻子。那天夜里，他比平时睡得差。他有一种感觉，仿佛第二天就要奔赴战场打仗了。

就在动身去机场的那天早晨，将军会见了最后一位来访者。他应该早点去机场。走到庭园里开汽车库门时，看见在大门外有两个人正蜷曲着身子，依着铁栅栏，裹着粗毛披巾睡觉呢。是一个老头领着他的孙子，从最遥远的边疆来到这儿的。他们走了好多日子，最后搭上

了半夜里的末班火车才赶到。时间那么晚了，他们不敢敲门，于是便在人行道上躺下睡了，等待清晨的到来。

将军把这些话又最后重复一遍：名单是确切无误的，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他的。老农民点头致谢。因为大门嘎啦啦地发出响声，他们好像受了惊似的突然醒来，所以粗毛披巾尚留在栅栏旁。

这就是事情的一切。他从浴场回来以后的两个星期，就是这样结束的。

第五章

他们又上了路。鹅毛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在几个条件恶劣、村庄稀少的地方，他们已经逗留几个星期了。小轿车开在前面，拉着工具和公用局工人的卡车，尾随在后头。身穿用粗毛料制作的瘦瘦的黑色衣服的农民，不时地从路上经过。他们徒步骑马或乘卡车，到不同的地方去。将军苦苦地思索，在这些战斗中，反对者们曾采用了什么样的战术；抑或说是采用了人民制定的战术。

在一个小镇中心附近的木板房里，有人在卖报纸。人们聚在小窗户前面，有的站着读报，有的一边翻着报纸，一边朝别处走去。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一种很爱看报的人民。”将军说。

神甫在他的座位上动了动身子。

“这说明，因为他们是一个被敌对势力包围的国家，所以大家都看报。”

“一个如此小的穷国，处在封锁之中……真奇怪！”

“他们很难顶得住这种封锁！”

“这种人民可真见鬼！”将军说，“不过，从情况来看，压力是压不垮他们的，也许好事反倒能打倒他们。”

神甫笑了。

“您为什么笑？”

“因为您现在讲话，不像是个将军。倒是像个哲学家。”

将军望着雾中阴郁而惨淡的风景。光秃秃的山丘，一片片大大小小的石头，遮掩了大地。他觉得一种巨大的失败感侵入了他的心。一连两周，他看到的总是这样一些岩石嶙峋的山丘。他感到，在这些光秃秃的山丘里，隐藏着一种悲剧性的东西。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国家。”将军说，“连人们的衣着都带有悲剧性。您瞧瞧那些土里土气的黑坎肩、女裙子！”

“看见了。”

“不代表悲剧吗？”

“您再听听他们那些歌曲吧！不幸啊，那可真是更惨了！这与这个国家的命运有关系。一连多少个世纪，他们与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人民和民族相比，命运最惨。这使他们变得很凶。”

“他们就没有欢快一点的歌曲？”

“少，非常少。”

小轿车沿着一条山间公路往下开。天气很冷。卡车不时地往高处爬，发出闷声闷气的声音。在一个山坡上，正在建设一座大工厂。因为整个地方都光秃秃地展露在眼前，所以在雾气腾腾的背景下，工地显得非常雄伟。

“这里建的是一座铜制品加工厂。”神甫说。

在十字路口处，远远近近的山头上，又露出一些堡垒。堡垒的形状有四角的、圆的，还有六角的。每个堡垒上都安置了射击用的窄窗户；这些窗户直接冲着前面的道路。汽车每次拐弯，都离不开射击区，在那儿要转上几秒钟。将军的目光投向窄小的洞口，一滴滴水从那里流出来。

这片堡垒算过去了。小轿车离开射击区时，将军对自己说。可是，在另一个拐弯的地方，又露出一个堡垒，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似的。于是车又在射击区里开了几秒钟。将军望着时而流在汽车玻璃上的水滴，直打瞌睡，觉得玻璃碎成了上千块，因此便睁开了眼

睛。可是，堡垒静悄悄、冷清清，没人经管。假如你用心细瞧，从远处看去，那堡垒就像埃及的雕塑品一样，一会儿，显出冷冰冰、酸溜溜、趾高气扬的神态，一会儿又带上了令人迷惑的表情。这要由射击窗口的架势来判定。如果窗口是垂直的，堡垒的神情就显得如同一个坏人般凶恶可怕；如果窗口是平展的，堡垒则具有麻木不仁、目空一切的味道。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们从山里来到平原上，到了公路旁的一个村子里。雨已经停了，像平时一样，小轿车周围聚集了许多孩子。他们在老远的地方就互相喊叫，从四面八方的小道朝公路跑来。卡车停在轿车后面几米远的地方，公用局的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车里跳到地上，活动起胳膊和腿脚来。

农民们停下来看外国人。事情很明白，农民们是晓得这些人为什么来到这里的。特别是妇女们脸上的表情，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如今，将军从当地人的眼神里，已经很好地了解了这种冷淡的表情。将军心里想：是我们让他们想起了被侵占的往事。在每个地方，仗打得越残酷，他们脸上敌对的情绪就越明显。

村旁边，在一片烧焦了的土地上，有许多坟墓，墓地周围砌了一道许多处已经坏了的低墙。将军想：葬在这里的都是我们的军人。他把长围巾围得紧紧的。从稍远一点地方看去，神甫简直就像一幅墨西哥版画上的那个大黑十字架一样。事情很明显，当初他们是怎样被包围的，这已很清楚了。将军心里琢磨着。他们一定是要竭尽全力踏过河上那座桥，全体士兵就是在那儿阵亡的。跑到这儿的那个军官是什么人？根据表格弄不明白是谁担任指挥官。

阿尔巴尼亚专家制订了一个普通方案。远处还有另外几座坟墓，它们离村子非常近，坟前还各有一个红五星，将军立刻就把它们认出来了。这是“烈士公墓”，当地人称它们为游击队员公墓。在这里埋葬的阿尔巴尼亚人中间，还葬了他那个国家的七名士兵。在那些带有红五星的小金属牌上，字写得很糟，士兵名字的字母错误很多。所有

的人的死亡日期和民族都一样。在一块石板上刻了这样一段话：1943年3月17日，在与“蓝色营”奋力交战中，这些外国士兵同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并肩战斗，英勇牺牲。

“又是蓝色营。”将军一边在坟墓中间走着，一边说，“我这是第二次跟踪到Z上校的足迹了。根据名单提供的情况，在这个村里应该找到本营的两个士兵。”

“我们应当打听一下有关上校的情况。”神甫说，“尽管1943年3月他还活着，但还是要打听打听。”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当打听一下。”

这时候，不知不觉中几个农民来到坟地旁边，填写了开销单据。然后，又来了几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妇女。小孩子凑得比别人都更近些，摇晃着满头黄发的小脑袋，交头接耳彼此说着什么。大家全都静悄悄地看着坟地里挖掘遗骨的小队的活动。

一位上了年岁、腰上背着木桶的妇女来到跟前。

“他们要把那几位外国士兵的遗骨取走吗?”这位妇女小声问道。

“要取走。”人们嘁嘁喳喳地回答。

老太太没把木桶从背上撂到地下，站在那儿，像其他人一样地看着。然后，她朝前迈了几步，走到公用局的工人旁边。

“请你们告诉将军，不要把他们同其他人的遗骨闹混了，我说孩子们。”老太太说，“我们理所应当地哭过他们，跟哭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将军和神甫望了望老太太，可她转身走了。背上的木桶摇动了好长一会儿，直到她在通往村里的一条小道上消失为止。

农民们一声不响地站在坟地旁，似乎就没有他们在场。他们目不转睛地观看挖墓寻找遗骨的人如何上上下下的忙碌着。天气冷得很，为了御寒，他们竖起了衣领，好像寻找什么东西没找到似的。

“明天将在两个坟地挖。”将军说，“今天我们要找到‘蓝色营’的两名士兵和一名坠毁的飞行员。”

这位飞行员的事儿，大家都晓得。坠毁的飞机的残骸，现在还依然留在村那边的平地上。飞行员是飞机附近的农民亲自埋葬的。除了一块大石头以外，没留下别的任何痕迹。显然，这块石头指明了被埋葬者头部的位置。飞机变成了一堆生锈的废铁。一个农民说，全部尚还有用的零件，都被他们一点一点地卸光了。从战争期间取代油灯用来照明的一块块橡胶和轮胎，到他们所有农活需要的沉重的金属零件，全给卸掉拿走了。

公用局的两名工人立刻开始挖起来，小队却又回村里去了。

雨早已停了，但是村子的道路上，却留下了许多铁车印和拖拉机履带印，不少地方还积满了雨水。远远近近的地方，矗立着一些只剩下了一半的草垛；这些草垛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在一些柏树中间，露出古老的教堂大钟。从教堂后边的一个地方，传来了一台拖拉机嘟嘟嘟的响声。

他们在车上吃的午饭，然后到农业社俱乐部喝了咖啡。俱乐部里烟雾缭绕，桌子上几乎摆满了东西。一台小收音机开到了最大响度，农民们抬高嗓门大声谈话。看得出来，他们是平原地区人。头发被太阳晒得脱了色，皮肤显得又亮又红润。就连说话的腔调也与众不同；这腔调最温柔，最富有音乐性。

将军喝着咖啡，看着墙上用红颜色写的标语口号。“修正主义”、“全会”以及在一段短短的语录下边恩维尔·霍查的名字等，一看就明白其中的意思。

专家最后一个来到俱乐部，他是跟一个身穿灯芯绒上衣的年轻小伙子一块儿进来的。他们走到一张桌前，将军同神甫已经在那儿坐好了。专家把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

“农业社主任，将军……”

小伙子那灰灰的多少有点惊诧的眼睛盯在外国人身上，然后又望了一下专家。

“事情是这样的，”专家说，“本周内我们要在你们村旁的两个军

人公墓里挖找遗骨。我们自己有工人，但是，为了使工程加快，最好还是再增加几个人，你们如果有可能帮帮我们的忙，那可太好了。”

“要劳动力吗?”社主任说。

“是的。”

小伙子有点踌躇。

“当前我们有点忙。”社主任说，“我们需要耕地，另外，烟叶和棉花我们管理得也不好。这样的话……”

“这只是几天的活儿。”专家说，“再说，我还要提醒您注意，社员们将正常无误地得到报酬（专家点头指了一下将军和神甫）。每挖一座墓，他们付三十个新列克[1]；挖开一座墓，再找到遗骨，则付五十个新列克。”

“我们给的报酬不低。”将军插嘴说。

“问题不在于多少报酬。”社主任说，“在于政府的这一工作这样干是否名正言顺。我是想说……”

“这个你不用担心。”专家说，“我有一份部长会议签署的合同书。你瞧!”

社主任看了合同书，思考了片刻。

“不管怎么样，你们还要和区执行委员会谈谈。”

“那当然喽。”专家说，“明天进城时就谈。”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十个人，干上三四天，多了不成。”

“那太好了。”专家说。

将军对社主任表示完谢意，大家便站起来要走了。

关于“蓝色营”的两名士兵阵亡和在那里埋葬这件事，任何人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上了年岁的农民对Z上校，还记得住，想得起来。他率领他的营从这一带地方路过两次，两次放火烧了村子。青年人只记得乡亲们如何扔掉了劳动果实和财物，攀登到崖头顶上，眼睁睁地

---

① 列克是阿尔巴尼亚的货币单位。

望着被大火烧毁的家园。

至于两名士兵，所有的人都毫无所知。显然是在村子里的人都走光了的时候，营里自己的伙伴把他们埋葬的。

“我们要把他们找到。”将军说，“图纸上葬地注明得很详细。我之所以坚持要向农民打听情况，那是因为他们的话会大大减轻我们工作的压力。”

以地形测绘图上的说明为基础，将军和阿尔巴尼亚专家，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努力确定墓地的准确地点，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了，墓地是在农业社的牛圈底下。将军、阿尔巴尼亚专家、挖墓找骨者和农业社的人，一起来到牛圈旁。把公牛从牛圈的一角拉到一边，公用局的工人们便开始挖了起来。小公牛瞪着安详而美丽的眼睛，望着外国人。牛圈里散发着干草的清香气。

天还没黑，飞行员和两名士兵的遗骨就被挖到了。飞行员的遗骨找到得比较容易，可是，为了另两位士兵，他们挖了许多坑。他们离开时，牛圈里还没给平整，依然坑坑洼洼的，仿佛重重地挨了一次轰炸。

公用局的工人们开始填坑。他们干得不慌不忙。那天夜里，他们要到农民家里睡觉；而将军、神甫和阿尔巴尼亚专家，却决定到距离干活儿地点三十公里的一座小城里过夜。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得赶回来。

他们出发时天已经黑了。汽车在公路上走得很慢，霎时间，照亮了路边的杨树、偶尔从原野里归回的牛车，以及被高高的芦苇环抱着的庭院。

“把车停一下。”神甫突然开口讲话，这时候他们再次从军人公墓旁边经过。

司机刹了车。

“发生了什么事?”专家问道。

神甫伸手把坟地围墙上的一点东西指给将军看。

神甫打开车门下了车，将军紧跟着他。同时用力关上车门。阿尔巴尼亚专家也下去了。

“这是什么意思？”将军一边挥手指着坟地的矮墙，一边大声说。墙上用木炭写了一行又大又斜的字。这是一句话，意思是：敌人就是这样失败的。

专家耸了耸肩膀。

“不知是谁在今天下午写的。”专家说道。“早晨这句话还没有。”

“这个我们是晓得的。”将军说道，“但我们只想知道，你们政府怀着什么目的唆使人干出这种可耻的挑衅勾当。”

“我看这没有任何一点可耻。”专家心平气和地说道。

神甫掏出笔记本，记了一点什么，显然，他是在抄写墙上这句话。

“这怎么能不是可耻的勾当？”将军说道，“在战争阵亡者的坟地围墙上，竟然写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要把它当作一个问题。这是一种严重的挑衅，一种丑恶的姿态。”

专家敏捷地回过头：

“二十年前你们把法西斯标语挂在我们被绞死的同志们的胸口上，而今您又为这么一句肯定是某个小学生写的普普通通的话大发雷霆。”

“我们不讲二十年前的事。”将军把话打断。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我们不讲二十年前的事。”

“您经常讲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什么不喜欢我们讲二十年前的事呢？”

“这种谈话是没有尽头的。”将军说。“这里的风太大。”

他们三人迈着急促的步子朝汽车走去，手开汽车门的声音接二连三地响得很急、很大，如同降了一阵冰雹。司机启动了马达。可是没走五分钟，在村口的木桥另一端，有一辆马车掉了一个轱辘，把路

给堵住了。两个农民正围着车，前前后后地忙活着。

“请你们原谅。”其中的一个农民对下了车的阿尔巴尼亚专家说道。

“没关系。”

这时候，几个农民正为安车轱辘卖劲儿。一个农民向专家问道：

“你们是哪儿的?”

专家回答了他的问话。

“我们听说了你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农民说，“今天全村的妇女都话不离口地议论你们这项工作。大家一看见汽车，话匣子就打开了。”

“推一下，鬼轮子。”另一位农民一边推车轮子，一边喊。

“大家说他们要掘开墓掘挖出外国军人，要把他们运回自己的国家去。”农民口气和缓地接着说下去，“不过，听说他们还要把被打死的国民阵线分子[①]和那些军人一起挖出来，把他们运到太阳的背面去，送到外国。这是真的吗?”

专家笑了。

“我们是这么听说的。”农民说，“这些家伙，死了也让他们跟敌人在一起吧，就像活着的时候那样。他们活着时是盟友，死后的今天还是盟友。人们都这么说。”专家又笑了。

“不是真的。”专家说，“谁也没想过把被打死的国民阵线分子带走。”

“推一下这个鬼轮子。”另一个农民再次喊道，轮子没安住。

远处传来了狗叫声。一个人手提红灯从平坦的田野里朝这儿走来。红灯的光亮好似受惊似的左右摇晃，跳荡不停。

“晚上好。”

“晚上好。”

---

① 国民阵线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与法西斯狼狈为奸的反动组织，其成员称为国民阵线分子。

“你们的车轱辘掉了?”提着红灯的人把灯举起来说，同时他还惊奇地扫了小轿车和外国人一眼。

“正像你看见的那样。”一个农民说。

一阵寂静。

“你们从牛圈那边来吗?”另一个人问道。

“从牛圈那边来。”

这个人稍站片刻，然后说了声“晚安”就走开了。他手中的红灯闪射出斑驳的光影，花花点点地照在路旁静悄悄的草垛上。

继续传来狗的叫声。

“你常干这种差使吗?”农民向专家问道。

专家点头作了肯定的回答。

“干了一些时候了。”专家稍过了一会儿说。

这位平原上的农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这工作太繁重了。”

汽车司机用口哨哼起一支时下流行的歌曲。

“推一推这个鬼轮子!”

车轱辘终于安好了。

“晚上好。”几个扛着锄头从平坦的田野里回来的农民向他们问好。

“晚上好。”

马车轻松地上了路，汽车沿着平展展的公路迅速地朝前开去。

十月的夜幕降落到平坦的原野上。这会儿才白费力气钻出来的月亮，在一层层软软的犹如海绵一般的云雾中间，流泻出银白色的光。吸饱了月光，变得新鲜而水灵的云朵，不可能抱住它，开始慢悠悠、静悄悄、皆为一个格调地在地平线的各个角落和整个辽阔无垠的平原上，向光线洒下一滴滴、一串串的水珠。现在，天空像油过了一样。平原、地平线和公路，也都变得如同用奶水洗过了一般柔和、明亮。

此时此刻碰上这样的秋夜，才发现天空变得很奇妙，全都沉浸到月亮冷漠的、混浊的、亢奋的光线之中了。我们躺卧在大地上，每个人肯定都会这样想：这天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的妈呀！

道路坑坑洼洼，在顺着道路向前奔跑的汽车灯的映照下，那一个个泥坑，显得又大又黑。

一小时过后，远处现出了城市的灯光。

第六章

小轿车在“阿尔巴尼亚旅行社”前面停了下来。在水冲洗过的街道上，在安装了霓虹灯的橱窗前面，偶尔会出现一个过路者。夜风刮着人的脸颊，他们急速地走进旅馆的前厅里。空闲的房间多得很，因为旅游季节已经结束了。

“您喜欢住靠河那一边的房间？”管理员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道。

“是的。”神甫说，“谢谢您。”

旅馆的一位小伙子帮助提箱子。

“河很美。”当他们到了楼上面的房间时，神甫说道。

“您来过这座城市？”

“来过。”神甫说。

“您来过几次了？”

“1938、1939年我来过好几次。最后一次是1942年年中。不过那时候的形势，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将军走近窗前，将窗帘拉开。远处的平原上，依然闪烁着那样一种白茫茫的颤人心弦的月光。他拉好窗帘，点着一支烟。

“我们下楼去餐厅？”神甫说。

“好吧。”

在走廊里，他们碰上了专家；他肩上搭条毛巾从自己的房间里走

出来。

“您也去，我们去就餐吧?”神甫对他说。

“我这就下去。”专家回答说。

“两周前我们在山上见过的那位中将，正在下面餐厅里吃晚饭。”神甫说。

“当真?”

“看样子他们正在这座城市里挖掘。”专家说。

两周以前，当汽车行驶在一大片山间平原旁边的公路上的时候，坐在后排座位上，时而打瞌睡、时而好像目瞪口呆的将军，突然看见了一桩奇怪的事情。

在山间平原上，几名工人身穿着公家发的咔叽布工作服，正在四五个地点掘土。在稍远一点的公路上，停着一辆小轿车，再稍后一点，还有一辆带棚卡车。轿车和卡车跟他们的轿车和卡车完全一样。草绿色的汽车旁边，站着一个身披斗篷的军人。背着公路，站在那儿的还有一个身着黑装的人。

这番景象是什么意思？将军呆若木鸡似的思忖着。我不是在做梦？他觉得好像在山间平原上看到了他自己、神甫和公用局的工人。他伸手擦掉玻璃上的雾气，眨巴眨巴眼睛。噢——这景象可是真的。

“您瞧瞧那儿。”他小声地对神甫说。神甫回头一看，打了一个吃惊的手势。

“请您停一下。”将军对司机说。

司机把车停下来。将军拉开自己旁边的车窗，把手指向右边。

“您朝那儿看看。”将军对专家说。

专家回过头来。

“他们在干什么?”将军问道。

“在寻找军人。”

“这怎么可能？没有通知我们，他们怎么可能挖呢?”

“他们在挖他们的军人。”专家说。

"是这样?"

"一年前，我国政府同他们国家签订了协议，可是，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他们耽误了很多时间，只是到了今年夏天才开始挖掘工作。"

"我懂了。那位是将军?"

"是个中将。另一位是市长。"

将军微微一笑。

"现在缺一位霍加[1]将军。"将军说。

"这不奇怪。"专家笑着说，"有朝一日土耳其人还可能来呢。"

他们聊着。这时候，站在公路旁边的两个外国人转回身，好奇地望了望他们。

"我们下去。"将军说完就打开了车门，"这些人是我们的同行，我们相互认识认识没有什么不好。"

"那为什么?"神甫说。

"我们可以交流交流经验。"将军笑容可掬地说道。

当他们走到那几个人跟前的时候，将军发现中将缺了右臂，用左手拿着一个挺顸的黑烟斗。那位穿便服的市长长得挺结实，是个秃头。

他们互相寒暄了一下，用蹩脚的英语交谈了一会儿。这时候，双方的卡车司机也相互换了点什么东西。他们把擒纵轮打开又关上，反复折腾了好几次。看样子最终拾掇利落了。

十分钟以后，互相说了声"再见!"就向前开去了。

话说回来，这会儿，是他们自那天以来第一次见到这几个人。

"瞧，他们在那儿。"当将军、神甫来到餐厅里的时候，将军说道。他和专家点头致意。吃完饭，马上叫服务员算了账。

晚饭他们几乎是一声不响吃完的。专家和神甫随便谈上一言半语，而将军却表情忧郁地坐在那儿，好像自尊心受了刺激。饭一吃

---

① 霍加是伊斯兰教国家里享有特权的人们的尊称。

完，专家就上楼回自己房间了。

晚饭后，将军和神甫两个人，在旅馆安静的前厅里会见了中将和市长。他们一起坐着吸烟。

“每天晚上我们都住在这儿。”市长说道。“我们在本市已经待了整整一周了，就这么打发每个晚上。我们到哪儿去？听人家说，夏天这里很美，有好几个舞场，而在这个季节，连外国旅游者都没有，从河谷里日夜不停地吹来冷风。”

“我们本来可以早一点到这个城市。”中将说道，“可是，足球锦标赛没结束。锦标赛没结束，他们是不允许我们到体育场挖找遗骨的。”

“您想想吧，这是怎样一种奇怪的障碍！”穿便服的市长说。

“他们是对的。”中将说，“尽管可以从体育场边上开始挖坑，而不到足球场里动工，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在我们挖找遗骨的时候，观众为射球而欢呼，对我们来讲，总不会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掘开的坟墓摆在眼前，我相信，对观众来讲，也不会是件开心的事。”将军说。

“我的想法和你们相反。”穿便衣的市长说，“这件事会让他们非常高兴。”

“让他们高兴的事倒是有过。”中将说，“虽然如此，还是不要干没有把握的事，不可太自信。”

将军打量了一下中将唯一的这只左手。他用这只左手擎着烟斗，把军大衣的空袖子塞进左兜里。

将军在琢磨：他右臂的截肢部位肯定在胳膊肘以上。

“我弄不明白，怎么可能把体育场建在坟场的上边！”神甫说，“国际道义是制止这种事的。您应当提出抗议。”

“我们已经抗议过了。”中将说，“可是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士兵的遗体不是他们埋葬的，而是我们军队自己埋的。这事糟糕透了。是晚上埋的，这事任何人都不知道。”

“我不相信这种新花样。”穿便服的市长说。

“开头我也不相信，可是，不可太自信哪。”中将说。

将军又死盯盯地向他的那个断臂看了一眼。

“我们还没遇到这样的事。”将军说。

“你们是在哪儿挖?”市长问。

将军把地名告诉了他们。

“我们应该一连挖上几天。”神甫说，“我们要在两个坟地上挖，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我觉得你们掌握的名单很准确。”

“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的名单。”

“可是，我们的名单却是在口头传说的基础上编纂出来的。”

“我们几乎是白挖瞎找。”市长说。

“那样，你们会遇到很大困难。”

“很困难。”中将说，“我们肯定只能找到几百名军人，不能让更多的军人对上号。”

“没有准确的名单，想让遗骨和军人对上号，那是困难的。”

“你们肯定掌握每个军人的身长和关于牙齿的说明。”

“是的。”神甫回答道。

“除此之外，我觉得你们的军人每人脖颈上还都有一个身份牌。”

“是这样。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因为身份牌是一件损坏不了的东西。”

“而我们的名单上，统统没有注明每个阵亡军人的身长，这可给我们添了不少乱。”

“虽然如此，腰上系的皮带的金属环，还是帮了我们的忙。”市长说。

两个小伙子走进旅馆前厅，坐到大玻璃门旁边的沙发上；那门是通向旅馆花园的，那里应当靠着河才是。

“对骨头你们使用什么样的消毒剂?”市长询问道。

“万能剂62。”

“那是很好的消毒剂。”

“最好的消毒剂是泥土。”

“这是真的。不过，有时泥土也不能起到消毒的作用。”

“你们挖出过未腐烂的遗体吗?”

“那还用说!”

“我们也挖到过。”

“不腐烂的遗体可是太危险了。”

“中毒的危险是常有的。有时细菌能活上许多许多年，怎么也杀不死。骨头挖出来，一露出地面，细菌猛然间就会泛滥起来。”

“你们遇到过棘手的事没有?”

“截止到现在还没有。”

“我们也没遇到过。”

“但无论如何还应当注意。”

“据我观察，工人们很有经验。”

“我也觉得是这样。”

“想喝杯咖啡吗?”中将说。

“我不想喝。谢谢您。”神甫说，“我要睡觉去。”

“我也要走了。”穿便服的市长说，“我要写封信。”

他们向两位将军互祝晚安，就登着铺有红地毯的楼梯，朝楼上走去。前厅里很安静，只有两个小伙子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谈心，时而传出他们谈话的片言只语。

将军向大玻璃门望了望；门后边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累了。”将军说，“谁晓得我们还要累成什么样子。”

“地理环境太坏，简直是坏极了。在接受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一工作时，我研究了几个在山地里进行现代化战争的战略问题。可是，现在我却无能为力，止步不前。遇到了这样一种地理环境。”

另一位将军对此事没表现出任何兴趣，将军感到有点奇怪。

“真有意思。”中将说，“在我们挖墓找骨的体育场，我见到一个漂亮姑娘。每当她的未婚夫练球时，她就到体育场来等他。下雨时，她披一件蓝雨衣，站在看台柱子下边的一个角落里，悄悄地观看锻炼的人玩球。空荡荡的体育场内，那些水泥台阶，被雨水照得亮光光的；新挖开的一些土坑，使整个球场变得丑陋极了。唯一的漂亮物就是这位身着蓝雨衣的姑娘，而她，显得忧心忡忡，面容难看。我站在那儿，她待多久，我就望她多久。而这时候，公用局的工人们，却在继续挖下去。这是本市唯一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当她看到了工人们把遗骨掘出来的时候，就不害怕？”将军问道。

“一点也不怕。”中将说，“她把头转向另一边，眼睛一直盯着球场里跟在足球后面奔跑的未婚夫。”

“奇怪的姑娘！”

他们没谈很长时间，吸着坐在沉重的沙发里装好的烟。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掘墓人。”将军几乎微笑着说道，“这些阵亡的军人，不管藏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找到的。他们无法从我们手里逃脱。”

中将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不动，说道：

“有好多个夜晚，我老是做同样的一个梦。”

“我也做过很多噩梦。”

“我觉得自己这会儿正在挖墓找骨的体育场上。”中将接着说下去，“唯独让我觉得体育场是最大的，看台的台阶上坐满了人，身穿蓝雨衣的姑娘，就坐在人们中间。我们每挖开一个墓，人们就欢呼起来，整个体育场全都一跃而起，大声地喊着军人的名字。我使劲去听，以便让听到的名字和军人对上号。然而，一大群人的声音混杂得很，好似打雷一般，什么也分不清楚。您想想看，事情有多糟糕，几乎每天夜里我都好像见到这般情景。”

“这种事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您处心积虑地想让遗骨和军人对

上号。”将军说。

“对，对，这是真的。这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

将军想起了他曾经做过的一个与此多少有点相似的梦。在梦中他变成了一个老者，人家让他在“兄弟公墓”当看守。正是在这座公墓里，重新安葬了他在阿尔巴尼亚搜集起来的军人的遗骨。公墓大得很，无边无际。成千上万的人，手持莫名其妙的电报，往来不断地徘徊在坟间的小路上，寻找着他们的亲人。然而，看得出来，他们并没找到他们所要寻找的亲人的坟墓，于是便摇头捶胸吓唬人。这样干的人像原来那么多，有成千上万个。他怕得要死，但恰巧就在这个时候，神甫当当地敲起钟来，所有的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也从梦中醒来了。

将军想把这个梦说出来，后来又变了主意，没说出口。

“眼前我们有很艰巨的任务。”将军说。

“是的。”中将说，“我们干的这项工作，有点像战争的再现。”

“也许比战争还艰苦。”

彼此稍微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向你们挑衅了没有?”将军问道。

“除了有那么一次，没再发生过挑衅的事。”

“怎么挑衅的?”

“小孩子用石头打我们。”

“用石头!”

“是的。”

“那你们忍受了这种侮辱?”

“谁说我们忍受了?”

“我好奇怪。”将军说，“这是一种野蛮行为!”

“那件事搞乱套了。”中将说，“我们错挖了几个阿尔巴尼亚人的坟墓；那些墓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军人的。”

“是这样?”

“这事可真见鬼，我根本不愿意去想它。我们每人再喝上一杯咖啡吧。”

“那我们一直到明天早晨也甭想睡着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要再去做噩梦了。说到底，每件重复来重复去的事情，都是讨厌的。”

将军点了点头。

“是这么回事。”

他们要了咖啡。

第七章

“这事发生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烧咖啡的老师傅用一种结结巴巴的英语讲道。他在纽约当过几年服务员，讲起英语来，美国的音调特别重。将军要他讲一讲这座古老的岩石嶙峋的山城居民当中随便哪个女人卖淫的故事。大家都说，烧咖啡的老师傅最了解这方面的事，只不过就是讲话不太利落，英语说得太差劲。

讲话结结巴巴不利落，这个无关紧要；英语说得不连贯，七零八碎，这个也没关系嘛！将军对自己说道。在这种事情上，难道一切不都是被毁坏得不成样子了吗？

卖淫者的名字，他们是清晨在城郊军人公墓看到的。截止到这时候为止，她是找到的死者当中唯一的女人。当听到人们说，那个女人有一部史话的时候，将军便很想听听她的故事。如果在坟头上没有一块写着常见的“为祖国而牺牲”的字样的大理石石碑的话，也许他就会冷淡地旁若无人地从她的坟边走过去。

将军老远就看到了那块白白的大理石碑。在变黑、腐烂了的十字架和坟顶上那个长了锈的钢盔中间，将军看到了这块石碑。

“大理石碑。”将军说，“这是一位校级军官吧？也许就是Z上校？”

他们凑到墓前，念了凿在石碑上的文字。石碑上凿有一个女人的

名字、姓和籍贯。将军没对任何人讲，她是他的同乡。

“这事发生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烧咖啡的老师傅说，“我是最早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之一。不是我对这种事情感兴趣，而是我在咖啡店里烧咖啡这一工作本身，使我有可能第一个了解到城里发生的每件事情。那一天也是这么回事。这个话传开的时候，咖啡店里人已经满满的了。不晓得那话是谁带来的。有些人说，是一个正向希腊前线进发的士兵带来的；那个士兵在市旅馆睡了一夜，喝醉酒，醉成一堆烂泥。另外一些人说，这话是拉迈·斯皮里带来的，这家伙整天只在这种事情上头动心思。不过，这个太无关紧要了。这消息使我们很惊奇，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根本没去想，这消息真的是喝醉酒的士兵带来的，还是流氓拉迈·斯皮里传到这儿的。

“这是真的。那时候，我们不是轻易就对事情感到奇怪的，因为那是战争岁月，我们听到过从前从未耳闻过的各种各样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回头一想，从第一回看见那些经过市里用石块铺的街道，发出可怕的轰隆隆的似乎要让城市坍塌的响声的大炮和长筒高射炮那天起，任何事情都不能叫我们感到奇怪了。至于后来见到的在我们头顶上发生的飞机空战以及种种其他的事情，那就更不用说了。

“有段时间传播过这样的消息，说有一个农民手持一根曾向他预示过不少凶事的棒子，在一个山口碰上了阿里巴巴。宰死公鸡剔出的肩胛骨不预示别的什么事情，只是预示战争和流血。肩胛骨变红了，人们一个个脸上布满阴云，等待着巨大噩耗的到来。

“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城里不再说别的，只谈论那个摔死在城市出口处的英国飞行员。我亲眼看见了飞行员的一只手。那只手是他身上残存下来的唯一的一点东西。我是在人家将这只手连同一件烧毁了的衬衣拿到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上示众的时候看见的。那只手好像一块黄木板，中手指上还带了一个尚未摘掉的戒指。他的飞机是在轰炸完城市以后，正要飞走的时候，被高射炮击中的。他掷下的一枚炸弹落在了市里伊斯兰教教堂的屋顶上。因此人们都说，是真主的诅咒把

飞行员给抓住了。

“就这样，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听到的可多了，对突如其来的事情，也习以为常了。不过，情况虽然如此，开办妓院的消息，还是把大家都给震动了。我们能够接受一切，但接受这个消息可不成。这消息实在太突然，以至于开始时多数人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这座城市非常古老，它目睹了各种时代的风云和世俗人情，但像这样的事情，却从来也没见过。这座城市有史以来就是那样的堂堂正正，受人尊敬，而今在它的晚年，怎么能忍受这种耻辱？怎么能呢？这一疑问弄得人们全然不知所向。一些陌生的、新奇的、可怕的东西，正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游荡，似乎异国的占领、驻军、轰炸和饥饿，统统还不够似的。我们弄不明白，犹如轰炸、驻军、饥饿是战争的一部分一样，这也成了战争的一部分。

“传出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有一个老人代表团去了市政府。当天夜里，还有一伙人为了给地拉那法西斯皇帝的副手写一封信，聚到咖啡店里来了。他们就在那张桌子旁边，翻来覆去地写了废掉，废掉了再写，待了好几个小时。别的人围着他们站着，喝咖啡，吸香烟，为了办完他们的事情，进进出出，往来不断。然后又回来询问信写得如何。不过，这封信写得可是不容易。很多人家都很担心，打发孩子察看男人们是否醉在了咖啡店里。我还记得，孩子们站在大玻璃窗外边，是如何睡眼惺忪地、惊讶地向里边张望，然后又是怎么样带着夜里的湿气，顺着来路返回家去的。

“我的咖啡店关门从来也没像那天夜里关得那么晚。信终于写完了，有人念了一下。我记不得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只记得其中讲到，出于许许多多数起来都能成串的原因，我们市正直的公民请求皇帝的副手：为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与进步，要他取消开办妓院的决定。我们这座城市古老极了，甚至人们都记不得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它有着非常美好的传统。

“第二天信就寄出去了。

“还真有人不想写这封信。总的来说，这些人反对向占领者写任何信，反对向皇帝提这样那样的请求。可是，我们并没有听他们的话。我们相信会有点结果的。那时候战争刚刚开始，许多事情我们都不理解，或者说是歪曲地理解，正像当时每件事都是扭曲的一样。

“我们的请求没引起重视。过了几天，来了一封电报：妓院即将开张，因为它具有战略性。年老的电报员，第一个看到了电文，一开始根本不懂‘战略性’这一词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是当时一种经常使用的密码，具有奇特的含义。甚至有人说，那词的意思是开辟了一个新战线，把军事术语搞乱套了。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每天晚上听广播的人，都很明白‘战略性’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再说一切都很清楚了：妓院确实是要开张了，而不是什么第二战线。

“过了几天，又传来了详细的情报。占领军将开办妓院，妓女将由他们从国外运来。

“在我们这座城市里，那些天，除了开办妓院这个话题之外，人们不再谈论别的事。也许在家里，还谈论另外一些他们关心的事，但在咖啡店里，大家白天黑夜议论的话题却只是这一个。大家都想知道这件生疏的事情将会怎样，那些妓女又会如何。少数到国外谋生过的人，满足了他人的好奇心。他们围着喝咖啡的桌子落座，讲述与这个话题有关的种种事情。不言而喻，他们讲的那些事，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拼命显示自己是最博学多见的，专讲那些最奇妙、最怪诞的事情。他们讲述日本和葡萄牙妓院，似乎他们对那些地方了如指掌，熟悉世界上所有的娼妓，连她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叫得出来。

“听讲的人伤心地摇头，因为他们为男孩子担心，特别是那些长大成人的男孩子的父亲，担心得就更厉害了。在家里，更加担惊受怕的肯定是女人们。很难说她们为谁牵肠挂肚，为儿子还是为丈夫，有谁晓得？年纪最大的人称这件事是时代不祥的征兆，心里预感到将有祸事发生，惴惴不安地等着上帝给予更加严厉的惩罚。肯定有人会高

兴的，因为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喜形于色，再说，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想到那种地方去的人，有的是与妻子关系不好的丈夫，不过偶尔也有个别色情狂，尤其是还有一些单身的小伙子。他们整天读爱情小说，一旦夜幕降临，一个个便无所适从了。有的人竭力安慰自己和他人，说什么今后外国人不会糟蹋我们的姑娘，因为他们将有自己的国家小妞。然而，这一安慰却是太微不足道了。

“妓院尚未开张，不幸的事儿开始了。有两个人被逮捕，因为他们说兴办此项事业是为了在阿尔巴尼亚散布外国的生活方式，使阿尔巴尼亚道德堕落。而且此事还将纳入消灭阿尔巴尼亚民族意识，使之更加法西斯化的庞大计划中。此事的发生，害得人们讲话都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当提起即将开张的妓院时，只有老头儿、老太太无所顾忌地骂上一通。

“她们终于来了。是一辆绿色军车把她们拉来的。这事我一回想起来，就觉得像在眼前一样。天色刚刚一黑下来，咖啡店里就坐满了人。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人们为什么离开桌子活动起来，走到大玻璃窗跟前瞭望外面的市政府广场。后来，有几个人涌到外面去了，于是其他的人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桌子都变得空荡荡的，我这儿第一次发生了有那么多人不付款就走开的事情。忍不住我也出去了。人们还从对面的咖啡店和猎人俱乐部里走出来，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汽车停在我们市唯一的一座纪念碑前面；在市政府门口，她们刚刚下汽车，正在好奇地朝四周东张西望。一共是七个人，遥远的路程累得她们一个个精疲力竭。人们惊奇地瞪着眼睛凝视她们，仿佛她们是些珍奇罕见的野兽。然而，她们环视周围的眼神却很平静，其中有几个人麻木不仁地微笑着，彼此谈论着一点什么事情。也许她们觉得奇怪，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来到了这座岩石嶙峋的奇妙的山城；因为黄昏时，我们这座城市显得颇有一点幻想的色彩。它有城堡的圆圆的屋顶和静默无声的塔楼。它们昂首挺胸耸入天际；顶尖上蒙着的一层白铁皮，

在西下的夕阳映照下闪闪发光。

“这时候，广场上挤满了人，尤其是小孩子，显得更是格外多。这些小孩子跟她们还不时地讲上一句从士兵那里学会的外国话。大人把小孩子赶走了，默默地环视着，一句话也不讲，连我们自己也难以明白，此时此刻我们的心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那天夜里，只有一件事我们是明明白白的。我们晓得了，所有那些有关东京或檀香山妓院的故事，同我们眼前面临着的现实相比，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眼前这种现实与那些故事完全不同，它比那些故事更深刻，更悲惨，更不幸。

“她们这个小队，由几个外国人和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在孩子们的尾随下，好似一群驯服的牲口，朝市旅馆走去了。我们市的这些怪里怪气的女客人，那天晚上就是在那儿睡觉过夜的。

“第二天，人家把她们安置到市中心配有花园的两层楼的住宅里。在住宅的门口挂好了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为一般公民和军人服务的时间表。这个小黑板，我们大家是晚些时候才看到的，因为在最初的日子里，通向她们那里的路，是无人走的，仿佛那里发生了瘟疫。谁也不往那儿去。后来，即使我们开始往那儿走，也觉得它是全城一条最丑陋、最扭曲、最孤立的路。我们觉得它和我们有点格格不入，对生活来说，这是一条可耻的、污秽的路，如同一个堕落的娼妇一样。后来一位警察开始偷偷地监视绕道而行的过路者，于是几天以后，慢慢地，人们又开始往那儿走了。开头是小孩子们，后来又有别的人，因为人们有急事要办，没有时间到小巷子里绕弯。只有一些老头儿、老太太一辈到底，始终未到那儿去过。

“那的确是一些痛苦、使大家焦虑不安的日子。我们市从来也没有过坏女人和伤风败俗的家庭丑事。因为妒忌或背叛而发生的事情，那是非常罕见的。而现在，骤然间一个漆黑的大污点竟落在了我们城市当中。每当传开什么消息时，人们引起的震惊情绪，同如今妓院真的开张而产生的惊恐态势比起来，根本不算一回事。现在，男人们很

早就回家，咖啡店很快就空无一人了。每当丈夫或儿子晚归回家，女人们就怀疑起来，一个个变得像疯子一样。在我们城市当中，她们简直像个大肿瘤。人们的脾气变得挺烦躁，很容易发火，许多丈夫或年轻的小伙子的眼睛里，时时流露出一种浑浊不清的神情。

“不言而喻，一开始任何人也没到那里去。她们一定很奇怪，彼此还会说，阿尔巴尼亚人民有多怪，对女人竟能够毫不感兴趣，不闻不问。也许她们自己心里明白，在这个国家里，她们是外国人。对我们大家来说，她们是敌对的占领军的一部分。

“第一个逛妓院的人是流氓拉迈·斯皮里。那天下午，他一钻进妓院，消息立刻就传开了。所以等他一出来的时候，人家的窗口便挤满了人；他们瞪大了眼睛盯着他，仿佛耶稣复活了。拉迈·斯皮里神气十足地走在街上，根本不把大家看在眼里。他甚至在离开妓院的时候，还向她们当中那个坐在窗户旁边的女人挥了挥手。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老太太从家里出来，将一桶水朝他泼去。可是，并没浇着他。这时，所有的卖淫者，都走到凉台上张望，向紧紧地挤在对面人家窗口处的人儿露出笑颜。老太太转过脸去，咒骂她们，挥手蔑视、嘲笑她们（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有这样的风俗：伸出手，张开五指，手心向上，摇晃不停，以此表示对某人某事讽刺、蔑视的态度）。可是，她们显然不懂得这个意思，一个个居然还笑了起来。

“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后来人们对这事也习以为常了。甚至他们当中有的人还在某个黑黝黝的晚上，偷偷地溜进妓院里。这个妓院太叫我们不得安宁了。过了些时候，怎么说才好呢，她们也闯进了我们的生活中。

“常常有这样的事：晚上她们走到凉台上，吸烟，好像不知所向似的瞭望周围的群山，她们肯定思念起她们那个遥远的祖国。在朦胧的夜色里，她们能这样地坐上很久很久。而寺院尖塔上报告祈祷时间的人，却拉着沉闷的腔调，唱着祈祷歌。

“过了一些时候，再也觉察不到对她们的深仇大恨了。还有的人

感到遗憾，说什么她们是像其他军人一样组织起来的，是靠军队的资金活命的。常常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她们的过错而招来灾难。譬如说吧，曾逮捕过一名中学生，因为他使用了‘破鞋军国主义’这一术语。像这样的事情，那是司空见惯的。

“看得出来，对她们的存在，人们开始慢慢地习惯了。现在，偶尔在某家商店或者星期天在教堂里，除了老太太以外，再遇见她们的时候，人们再也不觉得生活是那么黑暗了。这些老太婆白天黑夜地祈祷。要一颗‘火焰炸弹’从这个万恶的妓院的上空落下来。

“那时国家遭受侵略，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痛苦的事儿。这一痛苦也像其他痛苦一样，我们可是受够了。

“假如她们这些幸福之人不在这儿该多好！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是意大利—希腊战场，夜里听得见大炮轰隆隆的响声。我们市是一个歇脚的地方，无论对开往前线的新部队，还是对从前线撤回来的部队，都是如此。

“妓院门口常常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明天不接待一般公民。这样，大家就都明白了，第二天前线将有行动，尽管牌子挂在那儿毫无意义。因为除了拉迈·斯皮里以外，任何人白天都不到那儿去。特别是有军人在的时候更是这样。拉迈·斯皮里不管什么时候都去，心血一来潮就往那儿跑。

“那些日子我们到那儿去，是为了看看从前方第一线撤回来的军人。这些军人在妓院门口排着长队，一个个邋邋遢遢，蓬头垢面，胡子满腮。即使下雨，他们也排着不动，不破坏站好的队列。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把他们从战壕里拔掉，要比从这个长长的、曲里拐弯的、败相毕露的队列里赶走容易得多。看上去，这个队列是永远也不会完结无人的。他们站在雨地里，说一些下流无耻的笑话，抓虱子挠痒痒，嘴吐脏字，为即将在里面待的几秒钟争嘴吵架。谁晓得她们会吃多少苦头，不过，她们应当老老实实地听从摆布才成，因为说到底她们还是女兵。

“从下午开始，队列变得小多了，等到最后一个军人一走，大门一关，一切的一切便沉浸在寂静之中。经过这么多天的劳累与煎熬，第二天，她们大都被折腾得筋疲力尽，脸色发黄，眼神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呆滞无光。看来这些撤退下来的军人，好像将全部的悲苦、雨水、烂泥和战壕里失败的晦气，全都一股脑儿地加祸在这些可怜的姑娘身上，而他们自己却跑到一边轻松自在、寻欢作乐去了，好像他们从肩上卸掉了沉重的包袱。可是，她们却依然留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亲临前线，重新接待另外的军人。她们就是如此地喝着苦水毒浆，一直喝到最后撤军为止。

“也许事情会长此以往地继续下去，不发生任何特殊的事件，因为归根结底生活还是要按它自己的一套行事的。也许她们会在我们市里度过战时的全部日子。在霍加们长声长调下面消磨掉寂寞的时光，迎送军人们长长的队伍。谁晓得命运会把她们抛到什么地方去。也许情况就会这样。可是，有一天，拉米兹·库尔特的儿子把未婚妻给甩了。

“我们这座城市很小，这样的事件是要引起轰动的。假如你想到了很难找到一个城市或乡村会比我们这儿解除婚约更少这一点，问题的严重性，就更可想而知了。拉米兹·库尔特的儿子跟未婚妻分手这件事，可是出了大丑。一连几夜，拉米兹·库尔特的所有亲属，都聚会到他家里；他们要说和这件事，并以威胁的手段强迫小伙子重新回到未婚妻的身边。可是，这个小伙子顽固地坚持爱他所爱的人，不爱他不喜爱的人。比一切更糟糕的是，他什么原因也不透露。他的亲人想了解这一爱情变冷的原因，使了很大气力，可是，统统白费了。他整天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心事重重地呆着，脸上逐渐变得苍白，消瘦起来，仿佛有人对他施展了魔法妖术。

“与此同时，姑娘家里却要求对方作出解释。她的亲属像小伙子的亲属一样多。他们聚会到一起，说和这件事。两次打发人到拉米兹·库尔特家里，想了解小伙子同未婚妻分手的原因。然而，分手的

原因并未弄清，人们便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临走的时候，他们发出警告：他们不会允许践踏荣誉。这意味着话说完以后会响枪的。枪真的打响了，不过，情况与我们想的不一样。

“就在两家进行最后谈判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感觉到，他们之间那种由于小伙子和姑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订下婚事而产生的深深的友情，正在向着敌对的关系（一种长期的、黯淡的、险恶的敌对关系）演变。这桩婚事破裂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了。原因是何等的简单，何等的丢人：拉米兹·库尔特的儿子逛妓院了。他总是冲着一个女人去。

“后来，我们绞尽脑汁，竭力想弄明白，他与这个外国娘们儿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也许他真的爱她？还是有可能她爱上了他？上帝晓得他们中间是怎么回事。真情无论如何也没搞清楚。

“传出这话的那一天，拉米兹·库尔特满面阴云，脸色变得像蜡一般黄。他帽子也没戴，拄着拐杖从上坡街走下来，直向妓院奔去。两眼发呆，好像冻成了冰球。那一时刻，他的精神状态肯定不正常。你们想想看，当她们看见那个脸色发黄的老头儿，瞅着他用拐杖推开妓院的铁大门，走进院里边的时候，会多么惊奇吧。她们站在凉台上，当老头儿登楼梯时，一个妓女笑了起来，也许是笑了吧，因为别人都把笑容挂在嘴唇上，不笑出声来。凉台上出现一阵死一般的安静。老头儿用拐杖指着那个与他儿子有交往的妓女（人们说老头儿是凭头发把她认出来的）。顺从的姑娘朝她自己的房间走去，心里想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老头儿跟在她后面。然后，正当姑娘作好准备，要脱衣服的时候，一抬头看见了他那张表情不正常，好像是一张假面的脸。她惊恐万状地叫了起来。如果她不大声喊叫，老头儿也许不会用手枪朝她射击。这叫声似乎把老头从僵硬的状态中唤醒了。他开了三枪，然后扔下枪，在姑娘们的尖叫声中，仿佛像一个醉汉似的走开了。

“三天以后，拉米兹·库尔特被处以绞刑，他儿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时逢十月，凉风从山口刮来，白天黑夜一直不停。尽管如此，

对死者还是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又有花圈，又有音乐，而且还鸣枪多响[1]。法西斯们费了好大劲儿，从街上和咖啡店里招集了一群人，强迫他们把这个死者陪送到墓地。我们朝前走着，不说话，凉风刮着我们的脸。他们把她放进一口漂亮的红棺材中，装在一辆军车上。铜管乐队奏着一支送葬曲，她的同伴们哭喊着朝前走。

“我们市从来也没有陪葬过一个外国女人、特别是像她这样的女人的棺材。我们好像是痴呆人，心里空荡荡的。我望着天上高高的云彩，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思考着她的命运。也许是某种厄运唆使她这个死去的姑娘同这些头戴钢盔的军人一起跋涉了这么遥远的路程，走遍了后方的每个角落，一直来到我们这座城市。在这里，厄运叫她去死，结束倒霉的人生。也许她也曾想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得好一些。因为每个人不管多么贫穷可怜，都还是要为自己的生活动动脑筋的。

“他们把她安葬在军人公墓。人们把这个公墓称做‘兄弟公墓’。在坟上边安放了一块大理石碑，早晨你们已经见到了。石板上面凿有‘为祖国而牺牲’几个很平常的字，如同每个军人头上凿的那几个字一样。

“几天以后，来了一道命令，于是妓院关闭了。想起来，事情就像在眼前似的。那天早晨天气很冷，姑娘们手里提着箱子来到市政府广场，等着军车把她们拉走。行人为了看她们，在人行道上停下来。她们一个挨着一个站着，为了防寒把衣领竖得高高的。一个个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可怜无能，垂头丧气。

“她们上了汽车，汽车开动起来的时候，偶尔会有人向她们半心半意地挥挥手。她们也向致意者挥挥手，但并不像一般妇女常常挥手那样；这是一种不同的挥手，带有一种灰心丧气、疲惫不堪的意味。当她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向她们望了望。对她们的离去，我们心里并无轻松的感觉，因为原来我们总是想，等她们一走，我们就庆贺一

---

① 为死者举行葬礼时鸣枪是意大利人的一种习俗。

番，举办个夜餐会。然而，如今情况却不是那么回事。难道因为她们走了，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好一些？到处都在打仗，我们正在和法西斯较量，在占领者的统治下，不能指望会过上好日子。

“也许会把她们扔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一定是靠近前线的某个小城。开往前方第一线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会在那里过上一夜。军人们的那种筋疲力尽、满身烂泥的长队，肯定又会重新吞噬姑娘们的生命；这些军人把全部的痛苦和战争的湿气，统统都倾洒在她们的身上了。”

第八章

将军站在帐篷的进口处，望着灰蒙蒙的地平线。顺着陡峻的山间平原，云雾一会儿升起，一会儿又落下来。在这儿遮盖住一片土地，在那儿又把一块地方袒露出来。有时它落得非常低，甚至都触到帐篷尖上了。将军竖起军大衣领子，觉察到了身旁的帐篷发出的呼啦啦的响声；那帐篷好像被风吹得直打颤。

几步以外的地方，停着小轿车。稍远一点，在公用局工人住的帐篷后边，停着卡车。墓地没有确定的边际，墓地边上的雨后小溪，犹如蛇一般，弯弯曲曲地流淌着。每条溪流竭尽全力，蚕食了那么多的泥土，甚至还要将它们运送到底处的河谷里。

镐头在硬梆梆的土地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人们不时地在一个地方聚成一团。将军晓得，这意味着又找到了一个军人。他知道，这会儿他们正在给挖到的遗骨消毒；专家弯腰量着骨架的长度，神甫在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旁边打了红十字。如果遗骨的长度与名单上注明的身长不相吻合，他就打上一个问号。

将军细心地琢磨着那边一小伙人中间正在进行的这一工作的细枝末节，从神甫脸上僵硬的表情，到阿尔巴尼亚专家手挥铁尺的动作，他都琢磨过了。这么说，他们是在量第二次喽。当那些人围成一团，迟迟还不散开的时候，将军心里这么思忖着。这就是说，名单上

还得重新划个问号。

后来，有个工人跑到他们的帐篷里，取回一个漂亮的尼龙袋子。这种袋子是天蓝色的，上面有两道白线，系着一条黑带子，是“奥林匹斯山”公司根据特殊要求而制的产品。专家用长长的手指握住钳子，将一个挂在脖颈上的身份牌扔进一个金属盒里。

> 一天，他们检查我们，看我们是不是都有身份牌。有个人说，他把自己的身份牌给扔了。你的身份牌哪儿去了？当他解开军装，袒露出胸膛时，上尉问他。他回答说，不知道，我给丢了。你给丢了？可人家告诉我，是你自己给扔掉了。倒霉的家伙。你将像一条狗一样死去，谁也不会认出你是谁。对所有这一切，我们是要负责的。走开！上尉在狱中号叫着。两天以后，他们又给了他一枚新的身份牌。

每当人们散了伙，那就说明遗骨已装进尼龙袋子里，上面贴好了标签，并且写上了军人的名字和名单上的号码。然后，还是那位工人，手提袋子回到帐篷里；而另一边，又重新响起镐头刨在湿漉漉的泥土上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

这会儿挖到的这一个是谁呢？将军望着在墓地中间人们又聚成一团，不时地在心里念叨着。每一次，他都想起在他刚刚从浴场回到家里的那些阴雨连绵的日子里，在那儿，在他那遥远的家中的客厅里，他所见到的那些默默无声、愁云满布的各种面孔。所有那些人，都到他那儿讲述过亲人的事情。有的说得多些，有的说得少些；有的带去了数不清的照片，一包一包的信件，还有些人，除了作战部的简短的电报以外，身上什么也没带。

将军把军大衣裹得紧紧的，向东北方向瞥了一眼。那里有一座纪念碑，将军暗暗地对自己说。就是在那儿，在公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一个废弃了的旧磨坊的水沟发出潺潺的流水声的地方，有一座纪念

碑。假如天气晴朗，纪念碑就会显得如同在眼前一样。可是，现在雾气把它给遮住了。

当雾气开始飘动的时候，他觉得，每时每刻雾气都会让纪念碑露出容颜来。纪念碑很高很细，亭亭玉立，它是用洁白的石块砌成的。在它旁边，是一座旧房子的残垣断壁，废墟的残存东西，还有一堆堆发黑的石头。在稍远一点的村口，是一个被放火烧过、空荡无人的磨坊，水沟的流水发出叮咚的声响。这是唯一没能烧尽、未被毁灭的东西。纪念碑柱子前面，用特大的斜体字母，凿上了这样一段话："臭名远扬的蓝色营曾从这里经过。他们烧杀这个村子，屠戮妇女和儿童，把男人吊死在电线杆上。为了纪念牺牲者，人们竖起了这座纪念碑。"如今村子已迁到下边去了。正像人们所说的，只有那些旧的，下半部涂了沥青，有时候还架设了一个斜立的辅助木桩的电线杆子，还矗立在原来的地方。随着地势的起伏，变幻着各自的高度，有的高些，有的低些，将电线悬在空中。正是在这样一些电线杆子上，当年Z上校亲手吊死了许多人。

雾气好似软绵绵的白布一样，把电线杆子也给蒙了起来，于是那里什么也看不清了。看上去，好像在纪念碑、旧磨坊、半倒塌了的拱形桥上面，以及水沟的那一边，都罩上了一块白布单，眼前就像出现了一项伟大的已经竣工的工程一样。

"您要着凉的。"神甫一边走进帐篷，一边说，"空气里的湿度太大，风刮得蛮厉害。"

将军钻进帐篷，正是吃中午饭的时候。

"喂，情况进展怎么样?"

"还好。"神甫说，"如果明天小河那边的村子里的社员来干活的话，我相信四天以后，我们会从这一带拔出脚来的。"

"我相信他们会来的，不过，老头儿和妇女除外，他们认为挖掘坟墓是一种罪过。"

"大概妇女和老头儿也会来，也许这项工作会给他们一种隐秘的

喜悦呢。”

“我不相信。”将军说，“有谁还会觉得挖掘坟墓是一种喜庆事?”

“对他们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迟到的报复。”

将军耸了耸肩膀。

“除此之外，这还是一件挺有油水的工作。”神甫接着讲下去，“我们付给他们很好的报酬，农民就会有兴趣给我们干活儿。这样的活儿干上几天，挣得的钱就能买上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对半导体收音机感兴趣极了。”

“这一点我注意到了。”将军说，“他们总是把声音开到最大限度。当初我们若是也随身携带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准不会是一件坏事。”

“我们把这事儿给忘了。”

“这个帐篷可真叫我们讨厌。”将军说道。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一带地方竖帐篷。”

“我的印象里，在高山上，靠着一条具有战略意义、而今已经废掉不再通行的公路，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是吗?”

“军人们是保卫公路，还是守护一座桥，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么说，他们应当有很多人。”神甫说道。

“是的，是有很多人。我想这些人放到明年夏天再去找吧。这种天气有谁会往山里去!”①

将军将保温瓶拿出来，大家悄悄地用了午餐，吃的都是干食品。将军依偎在轻便的折叠床上，神甫打开一本书读起来。

这个家伙跟上校的寡妇老婆能干些什么呢?将军一边望着神甫的侧脸和他那柔软的无一丝白发的黑头发，一边暗暗地对自己嘀咕道。

---

①阿尔巴尼亚大部分地区，属于地中海式气候，夏天炎热干燥，秋冬潮湿多雨。夏天无雨季节适合在野外劳动（例如筑路、开发梯田、兴建厂房等）。

她是怎样的一个美人！将军心里在想。他把双手枕在后脖颈下边，望着被风吹得轻轻颤抖的帐篷，雨水又重新落下来。

天空是蔚蓝色的，蔚蓝色的。将军望着头顶上深蓝色的起脊的帐篷，思索着。在这片天空下，它真是美极了，甚至他都觉得应该相信，在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它更漂亮。

他觉得这件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而不是在这年八月里的一个美妙的下午。那一会儿，太阳恰似一个疲惫的大眼睛，泛着红光。傍晚的首批轻盈缥缈的水珠，在地平线的边涯，闪动着身影。散步的人们聚集在海边上。他们成群结伙地站在宽大的旅馆的台子上，观赏着西下的太阳、海面上的船舶和海鸥。他们每天如此地站在那儿瞭望日落。每当太阳落入大海，旅馆的大块大块的广告牌和整个海边上翩翩舞动的垂直的广告牌，点燃起红亮的光焰的时候，他们便纵身而起，与孩子们一块儿在海滨散起步来，或者坐到水边的石座上。

那天下午，台子上有很多人，阳光下饮料瓶子闪闪发光，显得又红又亮。人们为什么要谈话？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谈话。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谈话。随着白天的完结，这种谈话也结束了。这种谈话除了把那些长长的贴着五花八门的商标的果汁瓶子扔在桌子上以外，其他任何东西也没留下。

当人们在那里的时候，他觉察到，人们在旁边，隔着一张桌子凝神地望着他。他慢慢地转过头去，第一次先与她的眼睛相会在一起，然后又撞上了一位老妇人和其他人的眼睛。他们谈了他一些什么？然后他们转回头，再次咄咄逼人地向他凝望起来，而年轻的女人却向他致以淡淡的一丝微笑。然后一位男子霍地站起来，心里颇受震颤地走到他跟前。

“将军先生。”

这就是他与Z上校一家最初的相识。就是专门为了这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上校年迈的母亲和两个直系亲属都来到了浴场上。

“我们听说了，他们正是把这项美好而神圣的任务交给您去完

成。”老妇人说，“我们能和您认识感到很荣幸。”

“我们是为了这件事才到这儿来的。”

“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在寻找他。”老妇人说，“我们三次派人去找他。可是，三次都两手空空地回来了。第四个人骗了我们，拿了钱，人就不见了，也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我们听说现在您要去，我们的希望又复活了。嗨，我们满怀希望，我的儿子，我们对您满怀希望呢。”

“太太，我要努力去作这件事，竭尽全力。”

“他是那么年轻，品德又是那样高尚。”老妇人说道，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大家都说，在军事问题方面，他将成为一个天才，作战部长到我们家慰问时，也说过同样的话。还说我儿子的死对大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非常巨大的损失。可他是我的儿子，最大的痛苦还是落在我的头上呵，请原谅。蓓蒂。当然啦，亲爱的，这对你也是一个损失。你的表现是那样的无愧于他，是那样的忠诚。你记得吗？他是什么时候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度那两周假期的？只有两周，我们匆匆忙忙地为你们举行了婚礼，因为时不待人啊。他肩负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甚至在那个该死的地方，他的缺席都不能超过两周。蓓蒂，你记得吗？”

“记得，妈妈，我记得。”

“你还记得你是怎样站在楼梯前哭泣的吗？那会儿他正在穿军装。我竭力让你和我自己平静下来。后来突然作战部又来了电话。你记得吗？飞机半小时以后就要起飞。他跑过楼梯，吻了你和我，然后就走了。嗜，请你原谅。”老妇人说，“请你原谅我这么絮叨，我太多愁善感了，总是这个样子。”说着她擦了擦眼泪。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的友情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上校的一家进入到他们的社交活动中。上校的家人跟他们一起打羽毛球，洗澡，划船游玩，晚上到海边上跳舞。将军的夫人对这一新的友谊不感兴趣，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她不喜欢他常常与蓓蒂一起在滚热的沙子

上散步。这当然是因为她妒忌蓓蒂秀美的身段、金黄的头发，以及她的一切而使然。

“真有意思，你和她谈什么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天妻子向将军问道。

“谈了上校的事儿。”将军回答道，“只是谈了谈他。”

“为了让老太太整天说他的事儿，这个我也是能理解的。”他妻子说，“不过，那还是为了让她说……”

“你这样谈话是不体面的。”将军对妻子说，“他们有件难办的事情，求我帮点忙。我应该表现得有人情味才对。”

“我晓得上校的寡妇老婆的难题在哪里。”将军的妻子说，“浴场上所有的人都听说了，她对她丈夫的遗骨是多么忠贞不渝，令人尊敬。她整天不分场合到处讲这种事，对跟她一起只生活了两个星期，二十年前就死了的丈夫表现出来的完全多余的激情，只能有一个解释。”

“什么解释?”将军说。

“她是在跟她的脑子不好的婆婆的记性捣鬼。可怜的老太婆，满以为媳妇没忘记她儿子，而且对这事肯定还觉得挺不错呢。”

“说下去呀，还怎么?”将军问道，装出一副似乎没听懂的样子。

“你还要问怎么? 这个老太婆是个伯爵夫人，有大宗财富，可是却无继承人。她很快就要死了，她要留下遗书的。”

“不要跟我讲这种事儿。”将军说，“我不想掺和这样的交易。我要干的是，把上校的遗骨运回来。这是我的任务。”

“该诅咒的任务。”妻子说。

后来，蓓蒂突然失踪了一两天。重新回来时，将军发现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冷漠、倦怠的神情。

“您到哪儿去了?”他在旅馆前面碰见她时问道。

她身着浴衣，面戴一副假面具式样的黑色太阳镜。虽然她被太阳晒黑了，可是当她念叨神甫的名字时，他还是察觉到她的脸色变红了。

她开始讲述，她婆婆为了自己的儿子，如何从自己的角度打算，想不惜任何代价劳驾神甫；她如何根据地址找到他，婆婆又是如何安

下心来。还有……

然而，将军并没有听。他打量着她那裸露的好像麻木了的身体，第一次对自己发问：神甫能跟她干什么事呢？

后来，一连多日阳光都很充足。上校的老母亲，一个劲儿地夸奖她那个曾是作战部的宠儿的儿子的美德，就那么一些事儿，老是翻来覆去地讲。她还炫耀她们家悠久的家史。而蓓蒂却三番两次地离开浴场，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每次回来，似乎总是显得有些劳累，冷淡，于是将军便在心里划起同样的问号来。

每天下午，他们一伙还是到旅馆的大台子上逗留，品尝各种各样的新鲜饮料。那位他们熟悉的最新的电影演员，多次跟他说：

"将军先生，我觉得您是这整个浴场上最奇怪的人，心里藏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秘密。我一想到当这些非常美好的日子结束以后，您就要去阿尔巴尼亚收拾死人这件事时，就怕得不寒而栗。我觉得您好像我们在学校里读书时读过的一个德国诗人的颂诗中的一位英雄，但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您正像那部颂诗中的英雄，从坟墓里一跃而起，骑马奔驰在月光下。有的时候，我还觉得您将在夜里敲我房间的窗户呢。噢，多么可怕呀！"

将军在笑，思想溜了号，不知溜到哪儿去了。其他人惊叹着落日的景观，上校的老母亲没完没了地唠叨：

"他是多么喜爱这个世界上每件美好的事情哟！"说着掏出手帕擦起眼睛来。

蓓蒂还像原来那样漂亮，那么不可思议。天空还是那么蔚蓝，只是在地平线上，不时地卷起一团团乌黑的雨云；那云彩向东方、向阿尔巴尼亚飘去……

将军站起来，帐篷里空无一人。再也觉察不到雨点响，看样子，工人又开始干起来了。他走到帐篷门口，看到外面依然弥漫着那种湿漉漉的晨雾。那晨雾笼罩了大地上的帐篷。他向东北方向望了望，纪念碑和在空中拉着电线的旧电线杆子，应当还在那里才是。

第九章

神甫点着煤油灯，放到一张小桌子上。他们的影子开始晃动起来，在起脊的帐篷的顶端，碎成了两部分。

“真冷。”将军说，“这种万恶的湿气湿进我的骨缝里了。”

神甫动手去开一盒罐头。

“我们要一直忍耐到明天。”神甫说道。

“我可忍耐不了，明早天一亮，我们就拔腿离开这儿。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野人似的，不仅这样，我们还脏得不行，全成了泥人了。”

“最好别感冒。”

“这件工作本应当夏天开始干。”将军说，“可是，夏天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协议签订以后，还需要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我们刚刚准备好，雨就下起来了。”

“时间确实不合适，不过，提早干显然没有可能。这是国家政府的事嘛。”

“这个鬼差使。”将军说。

他把墓地详细的地形图在桌子上打开，并在上面记了一点什么。

“另外那两个人哪儿去了？”

“哪两个人？”

“中将跟市长呵。”

“谁晓得。”神甫说。

“也许还在挖那个被我们扔掉的体育场。”

“他们的困难很大，事事都不得要领。”神甫说。

“可我们却是每件事都有章法，我们是世界上最现代式的坟墓挖掘者。”

神甫没回答他的话。

“只是我们太脏了。”将军说。

帐篷外面，在黑黝黝的夜色里，响起了一支歌。一开始唱得很慢，是嗓音又低又预的人先唱起来的。后来，声音变得越唱越强。歌声已经传到跟前，在秋日里的那些晚上，它真就像雨或风那样撞击在帐篷上。看上去，帐篷变得又沉又重。它颤栗起来了。

“是公用局的工人们唱的。”将军说道。他抬起头，眼睛离开了地形图。

他们倾耳静听了片刻。

“几个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习俗就是这样。”神甫说，“三四个男子聚到一块儿，就开始唱歌，这是古老的民俗。”

“也许因为今晚是星期六之夜吧。”

“大概是吧。不光是因为这个。今天他们领到了工资，肯定是从过路者那里买了一瓶白酒。”

“我也注意到了，有时这些人是要喝上一杯的。”将军说，“看得出来，干这种活儿他们也觉得厌烦。离家那么远!”

“他们一喝酒，就开始习以为常地讲古。”神甫说，“他们当中最老的那一个，常给大家讲战斗故事。”

“他当过游击队员?”

“根据现有的表现来看，他是当过。”

“那么说，这项工作倒是能让他重温战争岁月的生活。”

“那当然喽。”神甫说，“在这种时候，唱歌是他的一种精神需要。对一个老战士来说，有什么能比从坟墓中挖出他先前的仇敌更叫

他发疯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战争的继续。”

歌声拖着长音，慢悠悠地响了很久，伴唱声从四面八方一起伴随着它，好像披上了一件又软绵又暖和的斗篷，保护它免受夜晚的黑暗与潮湿的损害。后来，伴唱声慢慢地消失了，其中只有一个人的音调高了起来。

“是他唱的。”将军说，“您听到没有？”

“听到了。”

“声音很好。这首歌儿讲的是什么内容？”

“这是一首古老的军人歌曲。”神甫说。

“很庄重。”

“是的。”

“您能听清楚歌词吗？”

“当然能，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战死在非洲的阿尔巴尼亚军人的故事。在阿尔巴尼亚被土耳其统治的时代，阿尔巴尼亚人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服兵役。”

“啊，对，您对我讲过了。”

“如果您希望听的话，我可以把歌词翻译出来给您听。”

“请吧。”

神甫听了一会儿。

“准确地翻译很难，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啊，我的伙伴，我死在疆场，死在加倍斯桥另一边的高地上。”

“那就是说，这首歌是歌唱沙漠的。”将军梦呓似的说道。在他的脑海里，沙漠仿佛像一张铺展开的无边无际、金辉耀眼的大地毯一样，他吃力地像二十五年前穿着上尉军装行军那样走在这块地毯上。

“请代我向我的母亲问好。”神甫继续往下翻译，“借此机会请您对她讲，把那头黑牛卖掉吧。”

帐篷外面，歌声拖得很长，似乎要停下来不唱了。后来又重新欢快地唱起来，在浓重的伴唱下，帐篷陡峭的篷面一直在摇撼着。

“假如母亲向您打听我的情况。”

“嘿，”将军说，“该把什么话对母亲讲？”

神甫又重新听了片刻。

“这是大概意思。”神甫接着往下翻译，“假如母亲向您打听我的情况，请您告诉她，您的儿子娶了三个新娘。就是说，有三颗子弹打在了他的身上。许多娘家的客人和认识的人参加了婚礼，这群乌鸦开始吞噬新郎。”

“太可怕了！”将军说。

“我没跟您讲过吗？”

帐篷外边，歌声向四处荡漾，好像皮筋似的一直抻到尽头，最后被抻断了。

“现在他们又唱起来了。”神甫讲，“只要他们一开头唱起来，就不晓得唱到哪里才算个完。”

果真如此，从另一个帐篷里又传出了歌声。开始，只能听见那位老工人发颤的振奋人心的高音。然后，另外一个人又重新再唱一次。最后，那些伴唱的人，甩掉斗篷使劲儿地唱起来。圆韵、压倒一切的歌声，在夜空中嘹亮地回荡。

他们静悄悄地听了一会儿。

“这又是什么歌儿？”将军问道，“歌中讲了些什么？”

“这是一首关于最后一次战争的歌曲。”[1]神甫说。

“他们总是歌唱战争吗？”

“不。从唱词中可以晓得，说的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我军的包围中死去了。这首歌是唱他的。”

“也许就是跳到坦克车上面的那个人吧？我们在两三个地方都看到了他的半身塑像，唱的就是他吧？”[2]

---

① 此处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② 指民族解放战争中为保卫地拉那红色高地舍身炸坦克的人民英雄沃岳·库希。

“我不相信唱的就是他。若是那么回事，歌中就会挑明的。”

“他像老虎一样跳到坦克车上，使劲打开铁盖子，这个人的半身塑像你想起来了吗？”

“想不起来了。”神甫说，“我们看到的塑像太多了。”

“我可是记住了。”将军说，“人家告诉我，他使劲掀坦克盖时，被另一个坦克手击毙了。”

“我脑子里稀里糊涂的，有些事儿记不清了。”

另一个帐篷里，有人唱起了一首新歌。

“在这些声音拖得悠长悠长的歌曲里，有点啃不动嚼不烂的东西。”将军说。

“说得正对，啃不动嚼不烂。那是年长的过了时的几代人的声音。”

“听到这种声音我不寒而栗，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声音叫我害怕。”

“他们的全部史诗都是这个样子。”神甫说。

“鬼晓得人民想在他们的歌曲里说什么。”将军说，“你可以挖掘、钻进他们的土地里，这还是容易的。可是，要探寻、钻进他们的灵魂里，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神甫不说话，他们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帐篷外面，歌声还像原来那样继续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将军觉得，这歌声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包围了。

“他们要唱到什么时候？”将军问道。

“不晓得。”神甫讲道，“也许要唱到早晨吧。”

“好好听着。”将军说，“在他们的歌声中，如果他们有什么对我们加以肯定赞扬的话，可要把它记下来。”

“那是当然的。”神甫说着看看表，“时候不早了。”

“我睡不着。”将军说，“让我们喝酒吧，也许我们会歌兴大发，想唱一唱呢。”他笑着补充说。

“我不能喝了。”

将军凄然地摇了摇头。

“这是学喝烈性酒的最佳时机。冬天。在山上住帐篷。孤独。”

帐篷外边，歌声时而变大，时而又变小。将军从大袋子里掏出一瓶酒。

“有什么好干呢。”将军继续讲下去，“我一个人喝吧。”他那高大的身影在篷面上晃动。他斟满了一杯酒。

神甫倒下去要睡觉了。

将军喝了两杯，然后站起来，点着咖啡锅，将咖啡粉倒了进去。他早已学会独自一人的时候自己烧咖啡。他觉得咖啡是苦的。

他双手插在胸前，一事不想默默地站了片刻。然后，走出帐篷，在进口处停下了。天空继续下着牛毛细雨，夜色又黑又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以至于他都觉得自己好像不知置于何方。在另外一个帐篷里，唱歌的人有几分钟停止不唱了。将军心里想，也许他们要歇一会儿。他又想，也许还会重新唱起来。

果然不错，不大工夫，歌声又响起来，就像夜色中耸起一座塔楼。老工人的嗓门压过别的人，越唱越高，高到最后竟停了片刻。在别人的声音中，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消失了，恰似一个火星儿重新落到炉中的火炭上一样。

远处闪起一道亮光，霎时间将军看到那里有一个白帐篷，白帐篷旁边有一辆大卡车。那卡车倾斜地停在陡峭的地面上，乍眼一看，似乎要滚到陡坡下面去。后来，夜幕把一切全都笼罩起来了。

他在听人们唱歌，用心猜测歌曲是什么意思。这是一首音域宽广、感情忧伤的歌儿。

将军在思考：也许这位老工人在思念他那些阵亡的伙伴。当时的一位参观者，在他的厅里告诉他，他们常常在歌声里怀念自己牺牲的同志。谁晓得这位老工人的脑子里装了些什么，将军在想。他上来下去不停地挖墓寻骨，这引起了他对战争的回忆。他对我一定是很仇恨的，这一点我已经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了。我们俩是不共戴天的敌

人，不过从我这方面来讲，我并不把他看在眼里，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一个劳动力，一个一星期内挖六天坟墓，第七天唱歌的雇工罢了。如果我有机会为我自己搜寻的军人唱一支这种性质的歌儿，不晓得事情会有多么可怕！

他们一直唱了很久，歌儿犹如链环一般，一个接着一个。他站在帐篷进口处听着，只有当他感觉到刺骨的寒气使他全身发冷的时候，才回到了帐篷里。

第十章

夜晚，在仅仅剩下的那几个小时里，将军作了一个惴惴不安的梦。

清晨，工人们的声音把他给吵醒了。工人们正在把架设帐篷的木桩子从冻结的泥土里拔出来，将被雨水淋透了的帐篷扔到卡车里，放在一堆锹镐旁边的大木箱子上。汽车司机开动了马达，以便使发动机热起来。

神甫是第一个起来的，正在用咖啡锅烧咖啡。咖啡锅发出一阵悦耳的响声。小小的蓝火苗，不时地照亮神甫的脸庞。黎明时淡淡的光束，射进了帐篷门。

将军思念起自己的家。

“早晨好！”将军说。

“早晨好！”神甫回答道，“睡得怎么样？”

“不好。天气很冷，特别是后半夜冷得更厉害。”

“今晚我也觉得特别冷。您想喝咖啡吗？”

“想喝，谢谢您。”

神甫把咖啡倒在小杯里。将军站起来，穿好衣服。

一刻钟以后，他们都到外边去了，工人们正在收拾他们的帐篷。雨停了，泥土湿得很透，黏黏糊糊的。宽大的墓地里，那些被掘开的

坟墓，都积满了半坑雨水。

“看样子，雨是不会再下了。”他们上了小轿车，神甫说道。

在东方，在高高的云彩后边，影影绰绰的太阳由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一会儿显得明亮，一会儿又变得黯淡无光。

将军困倦地打起瞌睡来。

当司机突然刹车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

将军擦了擦车窗玻璃上的雾气，看见一个身穿紧瘦的黑色衣服的乡下孩子正满怀敬意地向轿车振臂挥手。卡车在两步以外的地方也刹了车，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响。

轿车司机把头探到窗外。

“孩子，没有座位了。”他对孩子说。①

可是，小男孩匆匆忙忙地说了点什么，站在公路旁边用手直比划。

“这是个什么人?”神甫说。

将军打开窗户，想看得更仔细一些。公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农，黑黑的毡毛斗篷搭在胳膊上。这时候，小孩同司机搭话聊起来。他好奇地打量着两辆汽车。在他前边，顺着公路放着一口棺材。再往前，一头小毛驴泰然自若地站在路边上，全身浇得湿淋淋的，粘了许多烂泥。

“这是怎么回事?”将军问道。

“不知道。马上就会晓得的。”神甫说。

阿尔巴尼亚专家下了卡车，跟两个农民攀谈起来。老头儿一本正经、严肃庄重地站了起来。专家走到小轿车的窗前。

“喂，怎么个意思?”将军问道。

“一个军人。”专家说。

“是我们的?”

---

① 阿尔巴尼亚人民风古朴。行路者在路上可以随便地向汽车挥手示意，车上如果有空位置，立刻就可以上车入座。

“对。”专家说道，伸手指了一下棺材，“在这个农民家里干过活儿，后来有人把他给杀死了。

将军打开小轿车的车门，下了车。神甫也跟着他下去了。

“我不大明白。”神甫说道，第一个走到农民跟前。

“这个军人曾在这个农民的磨坊里干过事儿。”专家说，“后来嘛，被杀死了。”

“噢!”神甫说，“那他一定是个开小差的，或者是在投降以后碰上了某种机遇。”

专家询问农民，农民对他回答道：

“开小差的。”专家把话又对将军说了一遍。

将军没听他们的谈话，迈着蹒跚的步伐，脸色阴沉沉地走到一帮人跟前。每当身着粗糙衣服和家制山民鞋的阿尔巴尼亚农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总是竭力摆出这样一种高高在上的架势。

“是怎么一回事啊?”将军问道。现在，山上帐篷里那种寒冷的寂寞难熬的日子，早已被他搁置一边。他穿上了军装，又重新流露出趾高气扬的情绪。

农民的脸庞消瘦，眼睛灰灰。他慢条斯理地掏出烟口袋，装满烟斗，用火石打火将烟点着了。将军注意到，他的手指像火石一样干燥、发红，但是双手却依然还是那么大，那么有力气。小男孩在将军面前惊奇得两眼闪闪发亮。

“我们在这儿已经等了三个钟头。”农民说，“天没亮我们就从村里出来了。昨天有人告诉我，汽车要从公路上过，于是我决定和孙子一起等它过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拦截了很多汽车。可是，所有的司机都对我们说，他们的车不是拉死人的。甚至有一两个人还跟我寻开心，开起玩笑来。”

“当初是你把他安葬的?”将军问道。

“是的。”老头说道，“还有谁能安葬他?他在我们那儿生活过。”

“那就是说，他在您那儿生活过。”将军说，“可是，如果可能的

话，我倒想知道，您是怎样并且以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他待在一起的。这个伟大的正规军队的军人，在您那里干过什么活儿；我还想问问，他喜欢什么，而且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和你们在一起。您是个乡下人，对吗？”

专家把将军的这番话极为平实、详细地翻译给农民听了。

农民从嘴里撂下烟斗，两眼直盯盯地凝视着将军。

“他是我的仆人。”农民说，“这点全村的人都知道。”

将军紧皱眉头，羞得满脸通红。只有现在他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斜眼扫了一下磨坊，似乎在说，讲呀，为什么不讲呀，我说乡下人！他点着一支烟，划了两三根火柴。

“他是一个开小差的逃兵。”神甫对他解释说，“跟那些在阿尔巴尼亚人手下当雇工的人一样。”

听到“开小差的逃兵”这个词，将军脸都变了形，生气极了。

“他叫什么名字？”专家向农民问道。

“不知道。”农民回答道，“我们就跟他叫‘当兵的’，一直到最后总是这样称呼他。”

“什么时候您挖出了他的遗骨？”专家问道。

“前天。”农民回答道，“听说有人正在搜寻遗骨，我决定把这个‘当兵的’的骨头挖出来上交。让这个穷人到自己国家安息吧。我对自己说。”

“在他身上是否找到了一个圆圆的身份牌？”

“战斗勋章？”[1]磨坊主吃惊地问道，“我说孩子，他可不是一个戴什么战斗勋章的人。他常念叨干活儿的事儿，对于打仗，他什么也不说。”

“大叔，不是战斗勋章。”专家微笑着打断他的话，“是身份牌，

---

① MEDALJON 意为挂在军人脖颈上的身份牌。MEDALJE 意为战斗勋章。两个词发音很接近，故农民把身份牌误听为战斗勋章。

圆圆的、像硬币那样的身份牌，上面凿有圣母玛利亚的头像。”

农民耸耸肩膀。

“没有，没找到身份牌。骨头我是一块一块精心捡出来的。除了骨头，什么也没见到过。”

“您干得很好。”神甫说，“您完成了一个信奉耶稣教的人应当承担的义务。”

“还有别的什么人来干这件事吗?”农民说，“想不到这事儿会轮到我来干。”

“我们谢谢您了。”神甫说，“我们以这位军人的母亲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

老农走到神甫跟前。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挺勤快、挺不错的人。他不时地伸手指着用新鲜的橡树木头粗粗做成的棺材，开始向神甫加以解释。

“昨天我把棺材做好了。今天天没亮，我就领小孙子上了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磨坊挪动到这儿的公路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烂泥，毛驴跌倒过两次，瞧瞧，成什么样子了，好不容易把它搁起来，劲儿费大了。”

神甫对他的话听得很用心。

“这个当兵的是您杀死的喽?”神甫突然语气和缓地问道，目不转睛地盯住他。

农民大为吃惊地做了个手势，撂下烟斗。然后笑了笑，说道：

“您的神经没出毛病吧？我为什么要去杀他?”

神甫也微微一笑，似乎想说：很少有人会干这样的事情。

磨坊主扼要地向神甫讲述了1943年9月这个当兵的被“蓝色营”的侦缉队杀害的具体情况。后来，显然他又想起了神甫的发问，两眼露出用心思考的神情。

“孩子，他们怎么这样说话?”磨坊主小声地跟专家说道。

“大叔，他们是外国人，另有一套规矩，和咱们的规矩不一样。”

“人家费劲挨累，整整折腾了一路，而且……”

“嘿，我说大叔，您何苦伤这份心！”一个工人对老农说，他从卡车上下来抬棺材。“祝您身体好，我走了。”

老农跟专家说话的时候，公用局的工人们把棺材抬到卡车上放好了。正准备第一个上小轿车的将军，突然又转回身来。

“他是要报酬吧?”将军对专家说。

专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

“不是。”

“他完全有理由要报酬。”将军说，“我们准备给他报酬。”

“他不要任何报酬。”专家说。

将军觉得老农侮辱了他，这会儿可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即使稍微报复一下，也不能放过良机，于是他执拗地坚持道：

“不管怎么说，您要告诉他，我们想给他报酬。”

专家一时犹豫难决。

“我们希望对您的工作付给报酬。”神甫对磨坊主声音甜腻腻地说，“您要多少钱哪?”

磨坊主皱了一下眉头，昂起头来：

“什么都不要。”磨坊主简短地回答道。

“不管怎么说吧，您受累了，干了好几个钟头的活儿，用了不少材料。”

“什么都不要。”老农又重复地说了一遍。

“我们给的报酬可不少哩。”将军插嘴说。

“谢谢上帝，我可不是个伸手要人家施舍的穷光蛋。”磨坊主说。

“可您用面包把这个当兵的养了那么长时间，或许我们还可以算算这笔账呢。”

“我还欠他的账。”磨坊主说，“我没像对待仆人那样付给他报酬。莫非二位是想要我把报酬付给你们?”

磨坊主转过身，向毛驴站着的地方走去。

汽车开动起来的时候，小男孩贴着爷爷的耳朵窃窃而语；老头儿朝着汽车挥了挥手。

"等等！见鬼，我差点给忘了。"老头儿说，"我这里还有他的一点东西。我想把它交给你们。"说着他便把手伸进斗篷里。

"他是要钱。"将军看见老头儿向他挥手，马上说道，"你们看见了吧？我就知道他不会不要钱的。"

"什么东西啊？"专家下了车问道。

"一个本子。"老头儿说，"有时他就在这个本子上记点什么。瞧瞧吧，就在这里记的。"

专家伸手接过本子。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本子，密密麻麻的字，把本子记得满满的。

"是他的一个什么遗言吧。"老头儿说，"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交给你们了。谁晓得，一个穷人，会在里面记些什么！也许是他给什么人留下的关于绵羊和山羊的遗嘱吧。他没给我机会问他。假如他有牲畜的话，肯定得被狼吃掉。"

"谢谢。"专家说，"本子里肯定会有他的名字。"

"我们称他为'当兵的'。"老头儿说，"谁也没想起来问问他叫什么名字。"

"嘿，祝福您一路顺风！"老头儿对专家说道，"祝您身体健康。"

"又是一本日记。"将军一面翻阅笔记本，一边说。然后把本子交给了专家。"我们找到的这本日记是第几本啦？"

"第六本。"神甫说。

汽车开动了，一辆跟着一辆。将军回头望，看见老农在公路旁站了片刻，举目朝着他们的方向瞭望。然后，这位老农民转回身，让毛驴走在前头，他与他的孙子一起上了路。

第十一章

将军因为无事可干，在沙发椅上坐好之后，便翻开日记本看了起来：

1943年2月12日

自从上中学我陷进初恋里，记的日记被同学们发现，受到他们嘲笑以后，我再也没记过一次日记。记得是在历史课和数学课中间休息时，有人像撒树叶似的把我的日记本里的纸页，从第三层楼走廊的窗口向空中抛去。那些纸页散落在学校院子里的各个角落，大家捡到手里读起来。我仿佛像个疯子一样，从院子的一角跑到另一角，拼命从同学们手里抢回日记的每一页。但是，不可能到所有的人手里去抢。大家冲着我哈哈大笑，而她却一边哭，一边到教导处告状去了。

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写日记。

现在我觉得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像每天午后爷爷读的那些纸页都已变黄、落上了许多灰尘的旧书一样。每当在我们街区的电影院里上映新的电影时，不管是我还是别人充当那个骑着自行车满街满巷到处跑的角色，反正我总是第一个拿到电影票！这个我简直一点都不敢相信。

在这样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盘着腿，将日记本放在膝盖上，坐在

火堆旁边。我对自己感到奇怪，我这个“钢铁师”的军人，现在怎么竟成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磨坊主的仆人，头戴一顶白毡帽，就像这一带的农民戴的那些帽子一样。

“当兵的，你在写什么?”磨坊主问我，吸着用桐木制作的黑烟斗。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跟我叫“当兵的”，任何人都没问过我叫什么名字。磨坊主的妻子和他们的独生女儿科蕾斯蒂娜，也是这么称呼我。甚至我觉得，第一个以这个名字称呼我的那个女人，正是科蕾斯蒂娜。就是我们营被游击队打败了那一天，发生了这件事情。当时，我正在后撤，把枪扔进树丛里，然后便顺着树林子撒腿跑起来，老是沿着一道水印跑。因为我知道，水印常常能把你引到一个有人家居住的地方。我没有错，这道水印正是磨坊的那条水沟的水浸出来的。我在一户人家的旧门上敲了敲，一个阿尔巴尼亚姑娘给我开了门，惊奇地叫起来：

“爸爸，这里有一个‘当兵的’。”

那是一月里发生的事情。从那一天起，一种使我感到奇特的外国雇工的生活便在异国的土地上开始了。

“我用面包养活你，保护你。”磨坊主对我说，“如果你觉得轻松方便，得心应手的话，那就帮助我干点活儿。如今我老了，手脚不灵，干不了很多事了。我有个儿子，帮我干好多活儿，可他当游击队打仗去了。只要你不跟我来邪门歪道就行。”他接着说下去，“不这样的话，我可要叫你尝尝棍棒的厉害，就是鬼，也要把他打得服服帖帖的。”

他这些话自然是为姑娘说的。我向他保证说，我要光明磊落地干活儿。直到战争结束，我只要面包糊口和保护，此外别无他求。

“听着，你这个可怜虫，莫非是个特务?”老头突然这么说了一句。他那双严厉、一下子能把人看穿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我。

“我是特务?”我惊愕地对他说。

“若是叫我知道了，我就把你吊在房梁顶上，叫你活见鬼，倒大霉。”

这就是我们的契约。

这个契约已经订下一个多月了，现在我什么活计都干：到树林里砍柴，清理磨坊水道沟，磨磨盘，爬到房梁上换砖，扫地板，往工具上浇油，装麻袋、倒麻袋。

营里的同伴和家里，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如果他们见到我这副模样，先前的“钢铁”士兵如今变了颜色，从头到脚被面粉弄得雪白，头上还戴这么个白毡帽，一定会目瞪口呆，笑破肚皮的。

1943 年 2 月 25 日

天气非常冷。狂风刮了整整一天，仿佛要把磨坊连根刮倒。我们活计干得很少。在这样的冬天里，很少有农民能下决心徒步走到磨坊，磨一袋子玉米或百八十斤小麦。今年田地完全荒芜了，这附近的许多村子已经被烧毁，空空荡荡没人住了。来磨粮食的人，讲了好多可怕的事情。

我待着静听大风的呼啸声，这声响压过了水道沟哗哗的流水声。我觉得现在大风在全世界咆哮着。

1943 年 2 月 28 日

夜里下了雪。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么美的雪景。狂风的呼啸声终于停下来，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洁白。简直不能令人相信，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尽管战争就在眼前。

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呢?

1943 年 3 月 9 日

磨坊主和我相处得不坏。我也同样，干完了所有的活儿，而且干得满带劲儿。昨天把屋顶上被风吹坏的地方修理了一下，拆下旧材料，换上了新的。对我干的活儿，磨坊主非常满意。

“当兵的，一切活计你干得都挺麻利。”他说。他多少带有一点讽

刺意味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了一下，仿佛要掂量掂量我，然后补充说：

“我觉得你就是不提打仗的事儿。”

我满脸通红，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念叨自己开小差的事情。

“不是那么回事。”我恐慌地对他说，“是我自己不想打仗，我不喜欢这场战争。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拍拍我肩膀。

“我不是想刺伤你的自尊心。”他微笑着说，“我说那么干是白费劲，你脱离了法西斯，当然是干了件好事。”

整整一天，这一席谈话一直装在我的脑海里。磨坊主干吗要跟我讲这个话！他自己还帮助游击队，仇恨法西斯呢。

我发现，这只是因为阿尔巴尼亚人崇尚勇敢精神。他们瞧不起胆小鬼。看样子，我在他们面前显得像个胆小鬼。一个高大的男子汉，身长一米八二，居然是个胆小鬼！

假如他们真的以为我是个胆小鬼，这该有多糟糕！多丢人！尤其是在科蕾斯蒂娜面前！她年轻、漂亮，还不满十七岁。每次看见她，我就觉得胸膛里空虚得很，就像自行车的车带突然瘪了似的。就是这样。

1943 年 3 月 20 日

今天，在磨坊里发生了一件异常的事。我到树林里砍柴去了。回来时，看见一个人坐在磨坊门口。我停下脚步，惊呆地听听有什么动静。有个人打口哨，吹着我们的一首歌儿。我朝跟前走去，认出了他的军装的残存衣片。

“喂，朋友，你好啊!”我向他喊道。

他中断了口哨，霍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但却像两个老相识似的拥抱在一起，坐到了门坎上。

“你是哪部分的?”我问他。

“‘光荣’团的。”他说。

“我是‘钢铁师’的。”

“我们曾经是‘光荣’团和‘钢铁师’的人。”他说，“但现在我们可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都笑了。

“日子过得怎样?”我问他，“你跑出来多久了?”

“四个月了。”他说，“你呢?”

“两个多月。”

“在这儿干活儿?”

“是的。”

“这地方太美了。”他说，“简直跟瑞士一样。”

“你跟谁来的?”我问他。

他哈哈大笑起来。

“和‘我的主子’一起来的。”他说，“我们带来了两袋子玉米要磨一磨。”

“有什么消息?”我问他，“我与世完全隔绝了，不知道外界的情况。仗打得怎样？什么时候结束?”

“人们说很快就要结束了。”他说，“我们的人自然不会等很久了。”

“那我们怎办？我们的难题如何解决?”

“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回祖国去。”

“他们能不跟我们算账，不追究我们为什么不去打仗?”

“你神经正常吗?”他说，“你这是怎么说话？谁跟我们算账，追究我们为什么不去打仗？我们倒要跟他们算账，是他们派我们出来打仗的。”

这番话温暖了我们的心，我们各自点着一支烟。

“在这一带地方，像我们这样干的军人有很多。”他说，“多极了！阿尔巴尼亚农民急需帮助，因为多数的小伙子都当了游击队员，打仗去了。他们高兴接纳军人，但怀疑我们中间是否会有特务。”

“我看到我们的人什么活儿都干。从扶犁耕地、放牛，到像当保姆那样看孩子，活儿干得可多啦。”

“喂，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我笑着说道。

“为什么要说扯到哪儿去？还没说保持旺盛的心灵能给我们带来何等的妙事吧？也许我们会烂在某个深沟里，而且任何人连我们的骨头在哪儿都不晓得。”

“这倒是真的。”

“不过，女人的事儿可怎么办呢？”他对我说。

“一点都沾不着。”我对他说。

“女人的事儿，我们可是挺糟糕，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我们当中有个人，因为追一个姑娘，被人们捆在木头上，惩罚了一顿。”

我什么话也没说。

“朋友，我觉得你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一边眨巴灰色的狡黠的眼睛笑着，一边说，“前不久我看见了你东家的女儿，好漂亮的姑娘呀！”

“你神经没毛病吧？”我对他说，“我连想都不敢想，你自己也说了，他们会干些什么。”

“我说了，是说了，可这里不大一样。地方很美，很静，跟瑞士一模一样。”

“你看见磨坊主的两个拳头了吧？你知道有多大吗？”

他讲了一件丢人的事情，我们两个笑得前俯后仰。

从磨坊里传来漏斗摇晃时发出的单调的响声。

他掏出烟盒，卷了一支烟，就像阿尔巴尼亚农民那样卷；然后还给我卷了一支，因为我自己尚未学会卷烟。

“听我说，”他迷糊着眼睛，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听到过有关‘蓝色营’的什么事情没有？”

我的心为之一抖。

“没有。”我半含半露地说，“为什么问这个？”

“听说他们正在阿尔巴尼亚中部的什么地方周旋。”

“离这儿很远吗？”

"挺远。"他说，"可是鬼知道会出什么事。"他挠了一下后脖颈儿。

"你认为他们能到这一带来吗?"

"那谁知道?"他说，"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他抽了一会儿烟，默默地一声不吭。

"也许不会到这一带来。"我说，"也许他们正在被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

"可能吧。"他说，"虽然他们在同游击队的较量中败过多次，而且损失惨重，但是还是重新补充了新的力量。"

"他们总数有多少人?"我问他。

"九百。"他说，"全都是些发了疯的法西斯，到处杀人放火，制造恐怖。而对我们这些开小差的……"

"怎么样?"我说道，觉得心脏的跳动都好像减弱了。

"就地枪决，这个是众所周知的。"

"噢，圣母玛利亚呀!"我嘟嘟囔囔地小声说。

我们在磨坊门口待了一会儿，聊了各种事情。我的磨坊主人和那个农民在磨坊里边和和气气地交谈着。玉米磨完了，两个来者每人扛起一袋离开了。农民走在前，当兵的走在后。我们对他们讲："一路顺风!"

1943年4月2日

如今，在春天里，我们的活计很多。农民们从四面八方到这里来磨粮食，有时徒步，有时骑马或骑驴。每当我听到牲口的铃声，心里可高兴了，因为要看见人了，孤身一人待在这儿，太寂寞了。

磨坊主是个好人，公正的人，可就是有个不好的习惯，轻易不说一句话。总的来讲，我发现阿尔巴尼亚人讲话都很少，特别是男子，讲话更少。磨坊主嘴里整天叼着个烟斗，上帝晓得在一圈圈烟雾后面他在打什么主意。我更多的是跟他妻子交谈；我称她"芙洛莎阿姨"。她什么事情都问我，问我的亲属、父母双亲和家庭。我告诉她，我很

想念亲人。她怜悯地望着我直摇头。

“不幸的孩子！”她小声说道，然后便走进厨房里烤面包或洗餐具。

“现在你走了，离开了家，谁来饲养绵羊和山羊呢？”有一次她问我。

我为之一笑。

“我们家既没有绵羊，也没有山羊。”

“那么有牛吗？”她说。

“牛也没有。我们住在城市里。”

“假如您们有的话，现在你离开了家，狼可该高兴了。嗐，我说孩子，如今连人都像野兽一样互相打来打去，你吃我，我吃你，更不要说狼了。”

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才好。

还有一天，她向我问起身份牌的事儿。

“我说孩子，你脖子上挂的是个啥玩意儿？我觉得它好像是土耳其人的古币。”

我笑了。

“这是我们军人的标记，战争中我们若是被打死了，凭这个可认出我们。瞧瞧这儿，在圣母玛利亚的面部下方有个号码，看见了吗？”

芙洛莎阿姨戴上眼镜看了看。那眼镜真可笑，一个镜片还打破了。

“这东西是谁给你们的？”

“指挥官们。”

“这哪有个准哟！”她说道，然后一边小声地嘟囔着什么，一边走了。

这些就是我与芙洛莎阿姨交谈的内容。至于科蕾斯蒂娜，我很少能看见她，同她交谈当然就更少了。我正想跟她多谈谈，特别是现在，我的阿尔巴尼亚语多少还讲得不错嘛。可是，磨坊里见不到她，她整天忙家务或打毛衣。即便是来通知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也只在磨坊门口站上一分钟；她瞟起她那黑黑的温和的眼睛，就那么匆匆地斜

视我一下，然后就把头转过去。我在她那栗色秀发上瞄了几秒钟。末了她便走开了。

有时她根本就不下来，只从家中的窗户喊我们。

“爸爸，午饭准备好喽!”

有时，我走到院子前面，她就冲着我喊:

“当兵的，告诉爸爸，午饭做好了。”

当坐在餐桌旁吃饭时，她从来都不抬一下眼睛。我也挺害怕，心里七上八下的，只好让眼睛守着盘子。

接着，整个一晚上，我就一直想着她。有时我走到门口，望望夜景，倾听磨坊水沟淙淙的流水声，幻想着一切的一切。

1943 年 4 月 17 日

农民们继续来磨粮食，讲述发生在被游击队员解放了的地区的种种奇闻妙事。成立了好几个村议会，这是迄今为止从来都没见过的。分富人家的粮食，正在出现一些我根本弄不明白的新事物。

1943 年 4 月 25 日

今天，科蕾斯蒂娜对我微笑了。

昨天晚上，磨坊遭到了土匪的袭击。

巴露阿这条大狗叫起来的时候，大伙正在睡觉，可我却立刻就醒了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心里在纳闷儿，感到身上直发抖。时间已经很晚了，差不多是半夜的时候吧。在这个时辰，任何人也不敢到外面活动。

巴露阿叫得更加发疯，我觉得木头台阶发出轻轻的嘎吱嘎吱的响声。有人来到我睡觉的门廊里。他是磨坊主。他向我招了一下手，叫我跟他走。这时，我发现他另一个手里握着一杆长枪。我操起一根大木棒子，跟在他后面。我的心怦怦地跳得挺厉害。

"假如是他们怎么办?"我在考虑,"如果有人搞特务活动,报告他们我在这里,那可如何是好?"

磨坊主在门口停下脚步,竖耳静听有什么响动。屋外边,无论是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还是嚓嚓的脚步声,一律听不清。他们到这儿并没有明确目的。我默默地思考着。

突然间,响起一阵轻轻的突突声。接着,什么东西咔嚓地响了一声,打碎了。

"土匪来了!"磨坊主小声喳喳。他推开房门,摸着黑向外走了两步,举起枪,啪的一声打响了。噢,上帝啊,我从来没听到过有什么枪能响得这么厉害,这么脆,发出的火舌能这么大。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老牌枪!磨坊主再次把枪举起来,向磨坊那面射击,山口里重新响起一串串回音。

那边稍远一点的地方,响起了嚓嚓的脚步声。磨坊主半猫着腰冲在前头,我手持大棒跟在后头。

我们跑了一会儿,然后停了下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土匪走了。"他说,"咱们回去吧。"

我们一声不吭地回去了。

"嗳,怎么样?"我们跨进门槛,芙洛莎阿姨问道。茫茫的夜色中,她和女儿站在门廊里。我看见芙洛莎阿姨手里握着一根棍子。

"是土匪。"磨坊主说。

"对,是土匪。"我也这么说了一句。我感到胸膛里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喜悦和自豪。我从未想过在黑暗中半猫着腰追土匪的事儿。这真叫人高兴。

"这些该死的家伙!"芙洛莎阿姨说道,"好像别的灾难到不了我们这儿了。"

"这可是打仗的年月啊。"磨坊主说,"科蕾斯蒂娜,你害怕了吗?"

"我害怕了,爸爸。"科蕾斯蒂娜说。我觉得从来也没听到过比

她的声音更美的声音。我拼命想在黑暗中看看她的眼睛，但没有这种可能。

“那好吧，当兵的，晚安！”磨坊主说道。他第一个登台阶，跟着他，她们也登上去了。最后一步台阶响了一下，然后便是一片寂静。

清晨，我们看到了砸碎了的磨坊门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心里是那么空虚。

1943年5月25日

我的心思花在很多事情上，但是，更多的还是花在科蕾斯蒂娜身上。我尽想些发疯的事情。我自己知道，那是些发疯的事情。可是，尽管自己知道那是发疯，却还是愿意去想。

昨天中午，我躺在磨坊跟前的水沟边上。由于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便向水里扔起小石子儿来。四周响起萝卜叶子窸窸窣窣的声音，哗啦啦的流水声使人犯困，真想睡上一觉。

突然间，我听到了巨大的喧闹声、打开水龙头接水声、口哨声、说话声、马蹄声。我爬起来，瞧我看到了什么：我们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从远处开来了！我想跑，可不知为什么两条腿却挪动不得，我好像被钉在那个地方了。他们来了，从四面八方把我围了起来。

“这就是那个磨坊吗？”一个人问我，同时还做了个暗号。

“是。”我惊恐地说。

“喂，勇士们，我们放把火，把一切全变成灰烬吧！”他喊叫着，第一个冲了上去。我跟在他们后边，也冲了上去。我不知道，我的两条腿怎么骤然间开了枷锁，身上也变得灵活、敏捷了，仿佛是一种妖术解脱了我。我的头脑发热，凶相毕露，就像去年冬季攻势中，我们一连放火烧了六个村庄那一会儿一样。

我们一边发疯地狂喊乱叫，一边一窝蜂似的冲上去，两个人把磨坊给点着了。另外几个人抓住磨坊主就地拖，拖到门槛处，把他给枪决了。

我的心思跑到科蕾斯蒂娜那里去了。我跑步登上房子的台阶。别

的人把芙洛莎阿姨的手脚全给捆上了，顺着台阶把她往下拖。她看见了我，吐我。

“噢，狗！噢，特务！”

可是，我没去听这个，心思全在科蕾斯蒂娜身上。我迅猛地跑到她的卧室，冲到床前。科蕾斯蒂娜全身在发抖。

“当兵的，不行啊，当兵的！”

可是，热血涌到了我的头顶。我对自己讲，要快，快，不然时间就错过去了。

我掀开被子，发疯地撕开了她那薄薄的衬衫，趴到了她的身上。

“当兵的，噢，当兵的。”

猛然间我站了起来。传来了科蕾斯蒂娜喊我的声音。周围还像原来一样，水依然还是那样静静地流淌，青草散发着沁人的清香。我稍微睡了一会儿。

“当兵的，喂，当兵的。”

我迈着懒洋洋的步子朝家里走去，科蕾斯蒂娜走到中间那扇窗的前面。

“妈妈叫你。”她对我说。

我还在揉眼睛。

她若是知道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嘛！

1943年6月24日

离走的市民，陆续从纪诺卡斯特[①]那儿走出来。他们很疲劳，肩上搭个兜子，妇女手里抱着孩子，老人吃力地拖着双腿赶路。一种巨大的恐惧感，震撼着人们的心。听人家说，要把全城烧成灰烬。有的人还说，是要用炸药炸毁它。总之，可怕的事情在预测之中。

离走的人们在村庄里借宿过夜。有的到解放区去，有的待在半解

---

①纪诺卡斯特是阿尔巴尼亚南方的著名山城，离希腊很近，作者卡达莱的故乡。

放半被占领、就像我们磨坊附近的村子那样的地方。

纪诺卡斯特被有计划、有步骤地轰炸。有时我爬到耸立在水沟旁边高大的梧桐树上，瞭望山城。山坡上，好像有人拼死拼活地厮杀在一起，难解难分，似乎那里正在发生一场大灾难。我在那儿服役一年多，熟悉那里几乎所有的大街小巷以及卖饮料和肉丸子的商人。我还认识瓦洛街的两名妓女。

纪诺卡斯特城常常是早晨九点半和下午四点被轰炸，因此当我们无事好干的时候，我便提前半小时到那儿去观光，等着飞机飞过来。我站在那里观看，右边是格里霍迪，我们师曾在那里安营扎寨过，兵营的驻房很长、很新。格里霍迪旁边是一大片高地，高地的峰顶上，耸立着伊斯兰教的教堂，四周被亭亭玉立的柏树环抱着。下边铺满小鹅卵石的地段上，是基督教教堂和公墓。河面上有座桥，在那儿，夜里也不知我值了多少次勤，放了多少回哨。在河和申·特里阿德高地之间，有军用飞机。我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尽收眼底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巷、溪流以及把城市很多部分连在一起的桥梁。

飞机是非常准确的，经常先在北面戴佩莱纳山口出现。首先开火的是格里霍迪的防空兵。听不到那里的枪响，唯独能看得见发射炮弹的白烟。然后开火的是泰切高地的防空兵。然而，即使是他们，也破坏不了飞机的平衡。飞机安然地朝城里飞去。我的想象就跟这会儿纪诺卡斯特的情况一样。警报响了，人们往地下室里奔跑。让你感到奇怪的是，飞机掠过时，在阳光的映照之下，闪烁出白光，好像几枚抛向高高的天空的银币。真不可思议，就这么两三个小东西，却能叫这座延伸得又宽又广的城市陷入惊恐万状之中。

最后开火的是设立在高高的塔楼上的城堡防空兵。从这时开始，情况就清楚了。飞行员施展种种花招，飞机向下俯冲，直逼军用机场和城堡。然后重新向高处飞去，接着又俯冲下来，同时向下投射一连串重型炸弹。

从这时开始，在炸毁的房屋上空，卷起一团团黑烟。然后，飞机

又闪着亮光，安然地朝着来时的方向飞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这一切在白天才看得见，到了晚上，纪诺卡斯特城奉命进入黑暗之中。一开始吃黑暗之苦的是窄街小巷，低矮的房屋，河上的桥。接着，从山下的水溪小桥开始，最后到城堡、钟楼、清真寺的塔楼（仙鹤还在顶尖上筑了巢），所有的街道，全都得吃忍受漆漆黑夜的苦头。

夜里，当我凝望这座陷入黑暗，仿佛从来都未曾存在过的城市时，心里在想，这个奉命必须进入黑暗的沉痛的时代是如何来到的，世界干吗要把自己的面貌藏起来。我想起了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当时我们连第一次踏上穿过纪诺卡斯特中心、通向南方的道路。

那是一个黑漆漆的特别闷热的夜晚。我们累得狼狈不堪，身不着水，脏得要命，心情很烦。我们来到格里霍迪兵营过夜，刚一到就要求他们把我们送到妓院去。命令来了，允许我们去。我们大伙顿时活跃起来，跟原来一个模样，胡子不刮，烂泥满身，脏得一塌糊涂。武器也没从肩上卸下来，就又重新站好排，从大门走了出去。妓院在纪诺卡斯特城里。这样，经过长途行军之后，为了赶到那里，我们还得走上一公里多的路。可是，这会儿我们觉得走路倒挺轻松。我们列队走在黑糊糊的公路上，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笑话；彼此讽刺挖苦，觉得挺幸福。夜里不准唱歌，若不然的话，上帝晓得我们会干什么。夏天的一个夜晚，军人们列着队，背着上了保险的枪，一块儿走在安全无险的公路上，那确实是一种幸福的时刻。想起来，就好像在眼前。有人轻轻地吹起口哨，那是一支老曲子。我望着路两旁的夜景，左边是轮泽里山阴森森的倒影，看上去近极了，好像伸手就能摸着；右边是黑黢黢的吉尔山[①]，纪诺卡斯特城应当就在山腰上。

到了河桥，城区检查站的哨兵把我们检查了一遍。后来，为了走近路，我们离开公路，从田地中间穿了过去。

我们进了瓦洛街，开始朝上坡街登去。城市显得如同死了一般，

---

① 这里提到的都是纪诺卡斯特城附近的地名和山名。

窗户全关着，黑咕隆咚的。我们的登山鞋，在石板路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躲在门窗和家中沉重的大门后边的人们，一定被吓得浑身发抖，因为他们以为可能又要来一次新的屠杀。他们哪里晓得我们往什么地方去！

我们终于来到“院”前。我们当中有人把妓院称做“院”。夜色漆黑，燥热使你气喘吁吁。我们站在大门前边，我们的长官推开门，走了进去。

妓院里没开灯，一片寂静。看样子，未曾有过嫖娼的惯客。

“她们是不是睡了？”我们当中有个人担心地说。

我们大家都很不安。因为长官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如果她们睡了，应当马上起来。”有人说。

“就是嘛！”又有一个人说，“我们是军人。应该受到尊敬，特别我们还是过路者。”

“今天是过路者，明天就不是了。”另一个人说，音调又尖又细。

可是，大门推开，长官出来了，我们全都凑到他跟前。

“嗳，怎样？”有人在黑暗中间道。

“听我说！”长官说，“现在你们就进去，只不过你们要有秩序，不然我就给你们大家往后安排。来，大家都排好队！”

我们站了一排，上帝知道我们站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排。我们不能忍受了，巴不得马上就进去。

“注意！”长官说，“里面很黑，因为天气很热，窗户都打开了，所以不能划火柴点灯。任何人都不要用打火机，也不要用火柴，否则要倒霉的。在这附近有一个机枪监察点。”

“就那么办好啦。”两三个人说，“我们要灯干什么？没有灯我们也能干。”

“说得对，我们不需要灯，我们需要……”

“住嘴，你这脏东西！”长官训斥他们，“请安静！先进来第一拨儿，五至六个人。”

第一拨儿人你推我拥地进去了，消失在黑洞洞的院子里。

“不要弄错了枪。”长官对他们喊。然后又面对我们说，“另六个人跟我来。”

在这六个人当中就有我。我们进去了，有人在我们后边把大门关上了。我们如同醉汉一般摇摇晃晃地走在院子里的石块上，然后登上台阶，走进走廊里。走廊里漆黑一片，热得要命。虽然所有的门窗全部洞开，照样还是热得不行。

“安静！”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位女人肯定是个鸨母。

我们像核桃似的聚在一块儿，不知道往哪儿奔。摸着黑，我听到我们的长官跟鸨母小声地喳喳了一点什么，然后她就把长官领到了一个地方，无疑一定是领他到最漂亮的女人的房间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又重新觉察到了踏在垫子上的脚步声。几秒钟以后，走廊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的同伴们不知钻到了何处，仿佛被黑夜给吞噬了。我在黑暗中朝前走，听见了一个人的呻吟声，然后又听到另一个人也在呻吟。热血涌到我的头顶。钻进第一间敞开门的屋子里，又听到了一种沉重的呼吸声。我立刻走出来，进到另一个门里。在黑暗中，在一个角落里，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点白色的东西。我向前迈了两步，站住了。

“来呀。”一个女人叫我，声音软绵绵的。

我颇为胆怯地走过去，张开双臂，摸到了她。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我的双手从她那汗水津津、有点湿润的身子上滑下来。两眼发花，无法弄明白床在什么地方。

“把武器卸下来吧。”她语气平静地对我说。

我卸下枪，依着墙，然后她自己主动地在床上倒下了。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不过凭声音和性别听得出，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请原谅。”几分钟以后，我一边在她的怀里疲倦地喘气歇息，一边对她说，“我这样脏，请你原谅。”

“没关系嘛。”她漠然无事地说。这说明她早已习惯于军人的汗

水了。

“你们往哪儿去?”她问我。

“到南面打仗去。”

她再也不说了。这是我们交谈中唯独的几句话。

我竭力要弄清楚她是属于哪种类型和特点的女人，但这是不可能的。如同电影放映机不好使时镜头出现的糟糕情况那样，类型和特点全都化为乌有，模模糊糊分不清了。我慢慢地站起来，拿起枪，将它斜挎在肩膀上。我再次回过头，朝倒在角落里那白白的肉团投去一瞥。

“晚安!”我说。

“晚安!”她冷淡地回答，我走了出去。估摸着台阶的位置，顺着它走下去。那些干完了事的人，在外面等着，一声不响地抽着烟，坐在门口的石台子上，把枪夹在两膝中间。

一小时以后，我们又走在了公路上。这阵子既不讲话，也不开玩笑，而是听着我们走在公路上发出的乱糟糟的脚步声，我们又陷入寂寞无聊之中。我们很累，身上满是泥巴，像鬼一样脏。

“黑糊糊的一片，真该死!”有人好似说梦话似的诅咒，然而任何人也没搭腔。我们默默地继续向格里霍迪走去。

过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师再次路过纪诺卡斯特市时，我们曾要求再到妓院里玩一次，可是告诉我们说，妓院关张了。我记不清关张的原因，可是，还想得起来别人说过，那里曾打过一次架，闹得一团乱，其中一个姑娘被杀，其他的姑娘被清除了。当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起了在那个闷热的夜晚和我玩过的那个姑娘。我想是否就是她被杀害了。不过，也许被杀的并不是她。在我的印象里，那里有五六个姑娘，往多说是七个吧。

1943年6月29日

科蕾斯蒂娜最近打扮得漂亮起来了，每次看见她，我的心都像插进了一把刀，一剜一剜的疼。前天，她到磨坊水沟里洗腿。啊，她那

双腿是何等漂亮啊！她的一切都很美，尤其是那对眼睛。这对黑黑的温柔的眼睛，使你会想起夜里的一点东西，连你自己都不晓得该如何描绘她。只是那目光的意思，让你怎么也弄不明白。总的来讲，阿尔巴尼亚姑娘的眼睛，犹如汉字一般不可思议。汉字有多可怕，太可怕了。或许只是对我们外国兵才显得这样？

上帝知道！

1943 年 7 月 13 日

夜里，部队从纪诺卡斯特公路上向北挺进。这里看得见卡车的灯光。看样子，是要驻扎一个团的兵力。

1943 年 7 月 21 日

附近的村子聚满了国民阵线分子。到磨坊磨粮食的人说，国民阵线分子到村子里，如同在他们家里那么随便折腾，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白天大吃大喝，夜里唱歌，把农民可坑害苦了。我们的磨坊稍微偏僻一点，这可是太好了。若不然，他们就到我们这儿来了。

磨坊主对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见他们那白色的前面带有很大的雄鹰饰物的毡帽，我就得藏起来。他对科蕾斯蒂娜也这么说，也要她躲藏起来。

我待在一边琢磨着：假如国民阵线分子来了，我就和科蕾斯蒂娜藏到一个地方，她若害怕，我就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让她放心，感到是在我身边。我们俩互相靠在一起，就我们俩！……

然而，这样的事并没发生。电影里常有这种事，但是，电影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特别想去看电影。

1943 年 8 月 3 日

机枪整整响了一个下午。晚上的时候，国民阵线分子从村里逃走

了。游击队员又进到村里，重新建立起“议会”。这事是今天天不亮就来到这儿磨粮食的两个农民跟我们说的。科蕾斯蒂娜今天老是甜腻腻地看我。最近，她的脸上换了另外一种表情；这表情隐秘，奇怪。

我每天都在幻想中描摹她，当然我是爱上她了。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我这是无希望、毫无希望的，因为说到底，我不是什么人物，只不过是一个正在遭到失败，被击溃的军队的一名老兵，一个仆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失败者。一句话，什么都不是。是上帝和法西斯主义使人落到了这步田地。

1943年8月6日

再有一个星期，科蕾斯蒂娜就要结婚了。我完全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一消息的。我根本不知道她早已订婚。因此芙洛莎阿姨到水沟打水时，我对她的询问是完全徒劳的。

“近来您为什么昼夜不息地在织布机上忙活呀?”

“是时候了。”她说，“时候到了，我说孩子。”

“什么时候到了?”我对她说。

“干吗还要问什么时候?下个星期我们就要给姑娘办婚事了。你不知道吗?”

“不。”我对她说，“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小极了，以至于使她大为诧异，向我望了好一会儿。我拼命掩饰自己神色的慌乱失态，然后对自己说，见鬼去吧，干吗我要掩饰自己为此感到遗憾的真情呢?

她是否理解我受到很大震动，这我是不知道的。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说：

“孩子，就是这样，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她变成一个需要嫁人找丈夫的大姑娘了。你也要回家的，这场战争一结束，为了关心你，你母亲就将为你找个漂亮姑娘，给你结婚的。”

当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难为情地用手抱住头。因为我觉得她是在安慰我，所以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正在向我袭来。

我走到磨坊的水沟旁边坐下来，对自己说：科蕾斯蒂娜，你要结婚了。这些就足够了。

1943年8月20日

日子一天天单调乏味、令人寂寞地过去。稍过些时候秋天就到了，不晓得它会带来些什么。

科蕾斯蒂娜结婚了。上个星期天，新郎方面的亲属来到女方家里，把她给领走了。来了大约六个男子。他们骑着马，全都带着武器。路非常险，阿尔巴尼亚人即使在和平的日子里，走路也把枪挎在肩上。如今，他们一刻也离不开武器。没有举行婚礼。男人们坐在餐桌旁，稍微喝点烈酒。他们不能喝得太多，因为他们要走很远的路。他们把我也请到餐桌旁，可是来宾不跟我讲一句话，似乎我并没在场。

两天以前，我也曾想过为科蕾斯蒂娜做一个小礼物。可是，做什么呢？我身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竭力想刻一把木刀，就像阿尔巴尼亚农民刻的那样，但我未能刻得出来。于是我便打主意，想把身上的这个身份牌送给她。她曾三番两次挺有想法地打量过我这个东西。

“拿去好了。”我对她说，“作为我对你的纪念送给你。”

她接过身份牌，高兴地看了看。

“圣母玛利亚？”

“是的。”我对她说。

“是谁送给你的？”她问道，“是妈妈给的？”

“不是。是司令部发的。”

“那为什么？”

“为的是一旦我阵亡了，好凭它认领我。”

她笑了。

“你怎么知道你会阵亡？”

“我是说如果我阵亡了的话，就凭这个东西辨认我是谁。”

“科蕾斯蒂娜！”芙洛莎阿姨从院子里喊她。

她向我说了声“谢谢”就跑掉了。

就这样，我把唯一的一件东西送给了她。

我要身份牌有什么用？我是个毫无用途的人。我虽然活着，但毫无用途，一旦死了，人们何必还要找我？

吃完午饭，新郎方面的亲属起身要走了。他们把武器挎到肩上，跳上马准备登程。其中一匹装饰得漂漂亮亮的白马，是为科蕾斯蒂娜准备的。科蕾斯蒂娜哭鼻子，芙洛莎阿姨也擦眼抹泪，而磨坊主却叼着个大烟斗，默不作声地吸烟。然后，大家都去跟姑娘拥抱。不过，我可是悄悄地稍微靠边一点站着，希望至少这会儿，在这最后的时刻，她能瞟我一眼。可是，她两眼噙满泪水，双肩直发抖。她显得有多美呀！我也想和她打个照面，可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勇气向那几匹马靠近，大概是因为新郎的亲属仪表举止太庄重，若不然，也许是因为自己心里太乱，不知如何是好，才不敢靠前。反正究竟是出自什么原因，我自己也说不清。我只晓得晕头晕脑地呆在一旁，任何人也没想起来还有我这么个人在场。我从来没感觉到比站在这群人中间更显得格格不入，毫无用途。

几匹马出发了。科蕾斯蒂娜再次回过头看了一眼，然后马队就钻进树林里去了。先是马失去了踪影，接着人的肩膀不见了，最后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是几支长长的黑枪筒。

我们三人一声不响地走回去。磨坊主和妻子进了家门，我一屁股在水沟边上坐下来，趴在地上忧心忡忡地在青草上倒下了。突然间我泪水哗哗地哭了。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我并不是为科蕾斯蒂娜出嫁离走而哭泣，更多的还是为自己伤心。可是，不晓得是为什么伤心。

1943年8月24日

几天来，在纪诺卡斯特的公路上，老是不停地有大兵活动，看样子，很快就要有点事情发生。到磨坊来的农民讲，村子里又住满了离

散的市民。难民四处游荡，好像到处都刮着带有灰烬的风，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大的灾难。

除此之外，他们还讲，“蓝色营”已经在这一带出现。有人说，是在轮泽里山的那一侧；也有人说就在附近看见的。夜里又是那么可怕，我睡不着觉，起来偷偷地听听周围有什么动静。

我很想念科蕾斯蒂娜。

1943年9月1日

秋风在吹刮。一种剧烈的隐痛，不时地折磨着我，我觉得是离不开这个地方了。我只有二十二岁，觉得现在就陷入一片沙漠之中了。

有时候我到磨坊的水沟旁边坐一坐，这是一个我最喜欢逗留的地方。

我站在那儿，望着水沟里静静的水流，那水时而卷动着一片叶子，时而携带一只鞋，时而又什么都没有，只映照着几个倒影。

我回想起我们师在阿尔巴尼亚农村发动军事攻势的那些日子。我回想起我们四处看到的水沟。不晓得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乡村里人们用锄头、铲子开通的水沟里那静静的流水，叫我那么样的头晕目眩。任何别的事情，也不能使我对和平日子的回忆比对那些水沟的回忆更加集中，更为清晰。我肩上挎着枪，从水沟旁边走过，自我感觉不太好。这些水沟深深地、下意识地刺激着我。这种刺激是说不清道不白的。我觉得它们唤醒了我的一种旧有的本能，促使我去干一点什么事情。

上中学时，有一次在书本上我曾读到过一篇东西，但记不得作者的名字了。那篇东西讲的是狼狗的老本能。狼狗总是不时地向牲畜探头，我同水沟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这种险恶的时候，水沟在我的心灵里唤起了被遗忘了的旧情。它们在呼唤着我，我感觉到了它们那永恒的叮咚声。肯定是在村子的某一条水沟旁边，开始朦朦胧胧，而后愈来愈清晰地产生了逃跑开小差的念头。

而今我常到这条小沟来，在旁边坐坐。我想对我们这些原来的军

人来说，日子也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可这又有谁能晓得呢。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该往何处去。

1943年9月5日

寂静。叶子开始变黄了。今天早晨，在我们头顶高高的天空上，有几百架飞机朝东北方向飞去。

不知道它们来自世界的什么地方，又到世界的何地去轰炸！天空是广阔无垠的。

世界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第十二章

日记记到此处就结束了。上面还注明了日期：1943 年 9 月 7 日。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竟向上画了一条线。看来他是另有主意了，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写；也许是写日记这种事情让他感到无聊了吧。

将军轻蔑地把日记本扔在椅子上。

“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事吗？”神甫问道。

“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哭鼻虫写的日记。”

神甫拿过日记本，掀开了第一页。

“他没在任何地方写自己的名字。”将军说，“只写了身长，一米八二。”

“这正是 Z 上校的身长。”神甫说。

两个人互相凝视了一秒钟，然后各自把目光转向一旁。

“注明是哪一营、哪一团没有？”

“只写了师，是‘钢铁师’的。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证明。”

“怪事！”

“有一点关于‘蓝色营’的话。不过，并没有写有关 Z 上校的事。”

“这是 1943 年的日记。”神甫一边翻着日记本，一边说，“关于‘蓝色营’是哪个月写的？”

“在开头和结尾，就是说在冬天和九月。”

“九月里上校已经不在人世了。”神甫说。

“那当然了。”

将军在思考：根据老农对神甫讲的情况来看，这日记怎能收尾呢？“蓝色营”是如何到达这一带地方的？所有的人是怎样吃了败仗而发疯？一天下午，他们如何突然地闯到磨坊？肯定是有人向他们报告了，说有个开小差的逃兵在那里干活儿。另外，他们又是怎么样在面袋中间把他找到的？他身粘面粉，遍体雪白。还有，他们是怎样将他抓住，用自动步枪的枪筒逼着他朝前走？他总是磨磨蹭蹭的，在到达磨坊的水沟之前，他一直走在后面泡蘑菇。假如他就这样往后退，肯定会栽到水里的。可是，这种事情并没发生，因为他们正好在离水两步远的地方朝他开了枪。因此，当他倒下去的时候，只是脑袋掉在了水沟里。最后，水绕着死者的脑袋打了个小小的旋涡，好像有人往水里投下了一块小石头。将军还想：那轻悠悠的水流，是如何把死者湿淋淋的头发如同黑黑的奇妙的水草一般顺着它的流向往前冲？

将军一边吸烟，一边想：全部情景就是这样。不这样的话，一个逃兵还会有另外不同的下场吗？稍过片刻，他对自己补充了这样一句话。

“嗳，怎么样？”一小时以后，当神甫合上日记本的时候，将军说道。

神甫耸了耸肩膀。

“一本平平常常的日记。”神甫说。

“是这样。”将军说，“没有任何特别的内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是一本多愁善感的哭鼻虫写的日记。”

“另外两本日记更有意思。”神甫说。

“没脑子的家伙。这种军人，见到第一个女人出现在眼前，就把武器扔到水边上，然后就同她谈情说爱。同这号军人在一起，永远我们也不会打胜仗。”将军生气地说，“这叫什么军人！”过了一会儿，

他又补充说。

“这些军人日记，有些共同的东西。”神甫说。

“这是很自然的，只要穿军装的人写日记，就是这个样子。不过，虽然如此，从本质上讲，他们还是有区别的。您还记得我们找到的第一份日记吗？那日记具有怎样一种战斗精神啊！每行每字都显示出那是一个有头有脸有棱角的军人。”

神甫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见解。

“诚然。在某些地方，是有犯浑的一面，但总的来讲，还是洋溢着崇高的战斗精神的。”

“我说它们有共同的东西，那是因为我注意到了形式。”神甫讲道，“我们找到的这些军人日记，自然是不同的。只有结尾是相同的，就是说他们当中任何人都没写的那一点是共同的。”

“您说得可真好，只有死这一点是相同的。”

“尽管这个不幸的人未自杀，而是去光荣地冲锋陷阵了，但还是把自己送入作为一个逃兵被枪毙、脑袋掉进水沟里、湿成落汤鸡的狼狈境地。”神甫说。

“您看了他如何描写水沟的那一段了吗？”将军问道。

“看了。”神甫回答他。

“他以为在水沟里可以得救，然而在那儿等待他的却是死亡。”

“他是逃不脱上帝的惩罚的。”

将军点着一支烟。

司机使劲地鸣笛，一大群羊从公路上走过。两个甩着长鞭的牧人，尽力想拦住一半羊群，以便让汽车开过去。

“他们从山上下来，到冬季牧场上来了。”神甫说。

将军向个子高高、身穿长上衣、头戴黑毡帽的牧羊人扫了一眼。

“您还记得那两名在困难的境域里，保卫一个阿尔巴尼亚农村的羊群的上尉吗？他们是哪个师的？我的印象里他们是阿尔卑斯师的。”

“我想不起来了。”神甫说。

“我们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里，竟发生如此的怪事。”将军接着说，“真是奇怪。或者为了让我说得更准确些，应当说是丢人的事。”

“您是说那些为了混口面包吃，给阿尔巴尼亚人当雇工的军人吗?”

“是的。特别是在我们投降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了，它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总指挥部我看见过一份文件，事情令人难以相信!”

“这是真的。”神甫说，“发生过许多可笑的事情。”

“不过，我们自己也多次遇到过这样的事。有许多次，当我们听说我们的军人很狼狈地洗衣服，为阿尔巴尼亚农民看小鸡的时候，羞得我们面红耳赤。两个钟头以前，那个牧人，或者是磨坊主，管他是个什么鬼东西，反正是他弄得我烦极了，真叫我心神不宁。”

神甫再次点头肯定他的见解。

“您说了，发生过许多可笑的事情。不过，这些事不仅仅是可笑，首先是令人痛心。”

“战争中很难把悲哀同笑话分开；也很难把英勇同悲痛分开。”

“有的人极力要无愧于此。”将军说，“他们想无愧于我们师。我们师在投降之后被阻拦在这里。没有船舶，大海被封了。这些可怜的人，能做什么呢？说到底，他们得用面包保护住灵魂。灵魂要用面包保护，但不能糟蹋你的国家的尊严。”将军生气地喊，“一个伟大军队的军官，即使是败军的军官吧，也得接受看鸡的任务!”

“开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卖武器。”神甫说，“他们出卖武器，或者用武器换一碗玉米或一兜芸豆粒。”

“当时您不在这儿，对不对?”

“不对。”神甫说，“当时我是不在这儿，不过，别人告诉我了。他们告诉我是怎样为了一块面包和一点点葡萄酒出卖手枪。因为阿尔巴尼亚人尚未广泛使用手枪，他们对步枪感兴趣。步枪的价格最贵，贵到一挺步枪能换一口袋面包。而机关枪、自动步枪和炸弹，阿尔巴尼亚人几乎可以白白拿去，只交换给败兵们一个鸡蛋，一双破破烂烂

的山民鞋[1]，两个洋葱头，或者顶多给他们半公斤奶酪就够了。”

“真是极大的不幸！”将军说。

神甫想继续说下去，可是，将军再次将他的话打断了。

“所以阿尔巴尼亚人是成心嘲笑我们，您看见了吧，那个牧人，或者说磨坊主，是怎样地中伤我们啊？他是个什么东西？”

“他们崇尚武器。对他们来说，出卖武器简直是不可思议，尤其是为了一块面包而干这种事，就更无法理解了。”

“那么重武器呢？”将军发问道。

“重武器除非落到游击队员手里还有用，平时使唤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门迫击炮能换一只母鸡。”

“太不幸，灾难啊！”将军又说，“那么说，在我们投降的日子里，在阿尔巴尼亚是举办了一次真正的武器博览会喽。”他接着说道。

“正是如此。”神甫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览会。从前，阿尔巴尼亚人对武器渴望了整整一辈子。战争期间，这种欲望自然是变得更加强烈了。我相信，他们的祖先，多少世纪以来都幻想能做一次这样的交易。”

“听说败兵们出卖或用食品交换了一万多支枪。”

“也许还要多一些。”神甫说。

“这确实是一部伟大的战争的模仿作品。”将军说。

“那一年，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事故比任何一年都多。”神甫接着往下说，“孩子们拿武器做游戏。因为互相骂架，所以有时便使用炸弹，打破对方的脑袋，把脑浆抛在空中。”

“哼！”将军对他说。

“有时还有这样的事：像女人们习以为常那样，邻居的娘们儿白

---

① 一种用牛皮或羊皮手工缝制的普通农民鞋，类似我国东北农民穿的靰鞡。解放前，这种粗制手工皮鞋是阿尔巴尼亚农民唯一的鞋。解放后，他们基本上不再穿这种鞋了，只有演员在舞台上演出时，为了突出民间艺术的特色，偶尔才穿。

天毫无理由地吵了架，到了夜里，机枪就从窗户或屋顶上响起来，造成灾难性的流血事件。”

“我觉得您是言过其实。”将军说。

“丝毫也没夸大。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病。”神甫继续说，“阿尔巴尼亚人好像喝多了酒的醉汉，所有那些古老的战斗的本能，全都复活了，他们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可怕。”

“也许是因为他们打过仗，而且受了伤。”将军说，“第一颗子弹打在狮子身上，它们也是这个样子。这事我是了解的，在非洲我曾亲眼看见过。”

神甫掂量着要说点什么，可是，将军打断了他的话：

“除此之外，看得出来，那时候阿尔巴尼亚人曾预见过新的危险。”他说，“邻国随时都可能进攻他们。”

“阿尔巴尼亚人的预见常常是多余的。”神甫说。

“有一件事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将军说，“这一点确实是事实；投降以后，他们并没跟我们捣乱。甚至发生过完全相反的情况。我们原来的盟军，一见到我们的军人，当场就枪毙，可阿尔巴尼亚人，却保护我们的军人免受原来盟军的杀害。您记得这事情吗？”

“记得。”神甫说。

“还有一份文件。”将军继续讲下去，“在我们投降之际，游击队指挥部曾向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发布过号召书，号召人民不要叫我们成千上万的军人饿死。我们的军人犹如衣服褴褛的乞丐一般，在阿尔巴尼亚的街道上游荡。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自己看过一些材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谜。他们原来是那么仇恨我们，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去干这样的事情呢？若不然纯粹就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伎俩？”

“这种蛊惑人心的伎俩也太粗劣庸俗了。”神甫说，“即便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件很突出的事情。”

“我们曾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将军说，“在我们作战的时候，他们经常疯狂地进攻我们团。然而，这时却突然发出了一些这样

的号召书!”

“就是，就是。”神甫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是我们军队在阿尔巴尼亚令人痛心流泪的悲惨结局。”将军说，“所有配备武装、带有军衔、身着军装、荣膺勋章的军人，全都沦为仆人、雇工、徒工。我一想到他们干什么活计，就感到害羞。您还记得，人家是什么时候告诉我们的关于上校在一户人家里洗衣服、织袜子的事吗?”

“记得。”神甫说，“我甚至还想过，Z上校是否到一个农民家里当了牛倌，如今依然还在放羊。”

“如果蓓蒂看到他是处在这样一种境域里，那该多有意思。”将军笑着说。

神甫微微一笑，但没说话。

他们继续交谈着，一边说话一边走完其中的一段路，而最长的一段却是在沉默中走完的。公路上洒满了黄黄的和腐烂了的树叶。风儿将黄树叶时而刮到这边，时而又吹到另一侧；而那些烂树叶，费了好大劲才稍微挪动一点，然后又停在原处不动弹，好像被水和烂泥加重了分量，活动受阻了。它们就那么黑不溜秋、七零八落地分散在公路上，现出一副就地等死的模样。

小轿车急匆匆地从叶子上飞过去。

第十三章

许多天以后，在“达依迪”旅馆的大厅里，他们又面对面地坐到了桌旁。从下面的饮酒间里，又传来了音乐声。有这样的音乐响在耳边，将军感受到了异国的生活情调。他的面容显得很消瘦，眼神也极为呆滞。

“夜里没睡好觉。”将军说，“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

神甫抬起头来。

“梦里看见了那个卖淫的女人。您还记得那位烧咖啡的老头儿对我们讲了什么吗?”

“记得。”

“这不，她在我的梦中出现了。不过不是活的，而是死的，躺在棺材里。妓院门口，军人们排着长队等着，他们也躺在棺材里。”

“这个梦太可怕了。”

“不过，我觉得梦里的这一切是完全正常的。我走到那儿，问道：‘这些排队等候的军人，是从前线来，还是到前线去?’有人回答是从前线来的。另外有人说是到前线去的。于是我说：‘到前线去的人，不要等了，让他们打一次仗，然后就有权利享受了。那些从前线来的人，就排队等着吧。”

“这是个坏梦。”神甫说。

“而在另一个晚上，我看到了Z上校。‘您以为我身长一米八二，对吧?’他笑呵呵地讥讽我。‘先生们，你们错了，我没有那么高。’‘那您的身长是多少?’我问他。他又笑了，然后任性地对我说：‘不告诉你这个。’”将军掏出烟盒，“我总是做噩梦。”

“这是因为您太辛苦了。”

“是的。这一回我们是累了，比哪一次都累。”

“那你有什么办法。”神甫说，“我们还要挨更多的累，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我们简直成了中世纪身无定居的游荡者。整天不停地走啊，走啊，路是永远也走不完的。”

“军人的家属在等着我们，他们对我们寄托很多希望。”

“他们的家属以为我们是从镶有弹簧的地里挖掘死难者。”将军生气地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他们是没有过错的。”神甫说。

将军用手指敲击桌子。

“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神甫说，“今晚天气蛮不坏。”

他们走下旅馆的台阶，慢条斯理地朝地拉那大学的方向走去。在宽阔的大街上，小汽车来来往往，异常繁忙。车灯在桥头，在与“马尔塞尔·卡深”大街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分散了，有的向左拐，向多数的外国使馆区开去；而另外一些，则直向“斯坎德培广场”①驶去。

他们一直走到部长会议大厦，然后又走了回来。大街的两旁，工人们正在把含羞树②挖出来，然后在它们那很大的根穴里又栽上了松树。

“他们正在为节日作准备。”神甫说，“夜里他们也工作。”

---

① 斯坎德培是阿尔巴尼亚十五世纪的民族英雄。地拉那市中心的大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

② 含羞树是一种热带、亚热带树木，叶子终年常绿，冬末开黄花，并放散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这些松树他们是从哪儿运来的?”

“我相信是从山上运来的。”

在旅馆前面的台阶上，他们遇到了市长。

“噢，先生，您可好啊?”

“很好。您好吧?”

“谢谢。”

“我很高兴。”

“我也如此。”

“我的同事在哪儿?”

“在阿尔巴尼亚中部。我们在几个平原地段上挖掘寻找。你们呢?”

“我们要休息一两天”。

“你们会干得不错的。我明天就乘飞机起程。前天接到了家里的电报，我妻子生病了。相信一个星期我就会回来。我不能耽误更长的时间，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

他们一边交谈，一边登上了台阶。市长跟他们说了声再见就上了电梯，而他们二人却又走进厅里，坐下了。

将军要了一瓶弗尔奈特酒，点着了香烟。然后将杯斟满，一饮而尽。坟墓上那些令人感到讨厌的泥土块子，又反反复复地在他的眼前跳起舞来。

我不明白，我们同伴的遗骸为什么要挨门逐户地分开。我不相信，这会像某些人所要求的，是他们的最后愿望。对我们这些战争的老兵来说，这些多愁善感的举动，真是可笑。军人只有在同伴中间（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同伴）才会感到舒心。把我们的伙伴留在一起吧，不要将他们互相分开。他们的坟墓能使我们军人的传统精神永生。不要听从那些小肚鸡肠、流了一滴血就要号啕大哭的人。相信我们这些老兵吧。

将军喝得晕头晕脑。

他在想：现在我有一支全部由死者组成的军队。不同的是，他们现在不是穿军装，而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尼龙袋，这种尼龙袋有两道白线，一条黑带子，是“奥林匹克”的专有产品。过后这些尼龙袋子要装进棺材里。棺材挺小，长、宽、高都有一定的尺寸，是根据同公用局签订的合同制作的。开始只为几个班做了棺材，后来增加为几个连，再后来又扩充为好多个营，而今则是为许多团、许多师添做棺材，整个军队都被裹进尼龙袋子里了。

“跟他们能干什么呢?”将军半含半露地说道。

“您不太舒服。”神甫说，“大概您是发高烧了吧?”

“我什么事也没有。”将军说道。他觉得弗尔奈特酒从来也没像此次这样伤脑，显然这是因为他太劳累所致。他重复说，“我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想喝酒。”他又满上了一杯。“我想喝，可是，神甫您，或者上校，鬼才知道您是个什么东西，是您阻拦我。您想跟我要什么，嗯?”

将军突然耀武扬威起来。每次喝酒他总是这个样子。

“我忍受不了搜查，您想跟我要什么？说呀!”将军差点没狂叫起来。

身材瘦小的男子，像往常一样地坐在收音机旁的桌边上，写着什么东西，这时把头转了过来。

“先生，我什么都不要。我对您毫无妨碍，什么也不跟您要，我连想都没想过。”神甫冷淡地说。

“那么您待着好喽，看我怎么喝。”

“没必要越轨丢丑。”神甫说。

将军又满上一杯，这会儿神甫不想再劝阻他，归根结底他毕竟是主角。

他把心思又转到他的军队方面去了。他在考虑他那有着两道白线、一条黑带子的蓝色军队。我可跟他们如何是好？他心里想。他们

人数很多，蒙在尼龙大衣下面，肯定很冷，非常冷。他们的那些愚蠢的将领，把他们扔在战场上，一切都留给我来收拾。我若率领他们作战，会打许多大胜仗。

他竭力在脑子里过滤着在军事学院里学习过的那些战役，确认哪些战役可以率领这些军人取得胜利。他开始在烟盒上拟订作战计划，标出阵地的位置，进攻的路线，重点袭击的目标。神甫一声不响地望着他写出的七扭八歪的字迹，喝着可可。将军从古时候开始，展示他的雄才大略。开头先包围柴扎尔，接着斩断了卡尔大公将士的道路，后来又突然出现在拿破仑的面前，将他击退。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开心。不开心的原因是，他之所以能取得各个时代所有战役的胜利，那是因为仗着现代化武器的优势，而并不是凭他作为一个将军的本事。于是他又去追溯最近的战争。他在许多海岸登陆，包围了几个国家的首都。他把他的蓝色士兵从诺曼底海岸派到朝鲜三八线。他还把他们打发到可怕的越南丛林中，然后又把他们健全、完好地调了回去。历史公认的败仗他反倒打赢了。他赢得了胜利，因为他统率得好，没有把他的士兵扔下不管。他懂得如何统率军队。对于在山区作战，他还作过专门的研究呢。除此之外嘛，军人还挺勇敢，噢，特别勇敢。他们勇敢，那是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将军思考着，又喝了一杯。烟盒被七扭八歪的字弄得黑糊糊的，他又想起了一次战争。他退却了一次，然后又派一大批死人——这些尚未被挖掘出的蓄备力量去冲锋陷阵（他们在战斗中曾是最凶猛的人）并取得了胜利。

“就是这样。”将军几乎是满意地嘟囔道，“谁敢出面迎击拿破仑大军?”

“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病哟!”神甫嘟囔着站了起来。

第十四章

将军觉得自己全身疲惫不堪，好像散了骨头架子。他打开百叶窗帘，清晨冷飕飕的。天空灰蒙蒙的，一动也不动。他依着窗户，有点头晕。我身体不好。他心里这样想。难道就是那件事？那时候我也是这样开始的。起初我想过，原因在于非洲气候，但并不是那么回事。

他向窗外望了望，秋天就要结束了。对面的公园里已经光秃，绿色的长椅，肯定有很长时间没人坐了。只有叶子，它们很快也会腐烂。将军很熟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装，但是，只是如今他才注意到，那种军装的颜色，跟秋天里叶子颜色的特点差不多。一开始，它们是绿色的，然后变成淡咖啡色，现在呈现出深黄色；而那些腐烂的叶子，则变成了黑色。

我觉得不存在黑色的军装，将军心里在想。或者说得确切些，是现在没有，从前法西斯曾穿过黑色军装。

在公园中心，挨着那株圆圆的翩翩起舞的雪松，一个挨一个地摞着一大堆湿淋淋的椅子，那棵雪松现在显得很高大，很忧郁，它被抛在一边，无人理睬。在乐队演奏的地方，在一切地方，到处都落满了树叶，清扫工正在挥舞扫帚清扫。

我身体不好，将军重复地对自己说。他走下楼梯去吃早餐。

“您身体不妙。”当他们坐到餐桌旁时，神甫对将军说，“大概您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吧。”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病。”将军说，“我身体不好，这是真的。我觉得昨天晚上，无意当中我刺伤了您的自尊心。我请求您宽恕，我当时是喝醉了。”

“不必客气。”神甫彬彬有礼地说。

“这是一种什么鬼天气?”

“明天我如果单独一个人出发，也许会不坏呢。相信在海滨挖掘会比在山地容易得多。”神甫说。

“我也相信会这样。”

“您休息一段时间吧。晚上去看看电影或歌剧，一定不坏。”

“我睡眠不好。”将军说，“应该见见阳光。”

他们走到大街上，在旅馆前面高高的雪松下边宽阔的人行道上散起步来。一群群小伙子和姑娘，从他们身边走过，很显然，他们是地拉那大学的学生，这会儿正忙着去上课。

“交给我们承担的这件可怜下贱的工作，是个什么差事?”将军说道，好像他要把说了一半的话接着说下去，“到埃及金字塔去挖大石块，寻找尚未发现的法老[1]，也要比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挖两米深的坑，往外拽这些军人容易得多。”

“对这件事您总是想得很多。”神甫说，“大概这就是您自我感觉不好的原因。”

“这里的战争不同于先前的任何一次战争。”将军说，“因为这里的战争没有成为战场上的战争。它像蛆虫一般深入到一切地方，浸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个细胞里，所以它便具有另外一种性质。”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那是因为从天性上来说，阿尔巴尼亚人在战争中都是一马当先的人。”神甫说，“他们以高度的觉悟拥抱战争。战争是这个民族自身的组成部分。战争使阿尔巴尼亚人血管中

---

① 古代埃及国王的称号。

毒，好似一个喝烈性酒的人中了酒毒一样。所以说，在这里，战争确实是可怕的。另外，事情还不仅仅是在那里。从前，人民中间常常有战争；将来，打仗的事也还会经常发生。但是，对几个国家的人民来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那里起主要作用的，无疑是他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心态；另有一些国家的人民，他们怀着热烈得过分的愿望拥抱战争，这些国家的人民最危险。”

“这个您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了。”将军说。

“对，我记得有这么回事。”

“看来这是您最喜欢的话题。您是否在从事一项研究工作，就像我所研究的这样?”

“没有。”神甫说，“不过这是很有趣的谈话的依据。因此，老是周而复始地讲同一件事，我也会变成一个郁悒寡欢的人。”

“噢，别这么说嘛!”将军说，“我很喜欢听您讲话，您说的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战争心理。”

“是的。”神甫说，“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阿尔巴尼亚人，有史以来，总是肩上扛着武器四处流浪，他们那些家长制观念很强的山民，直到昨天好像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现在却背上了最现代化的武器。想想看，这差别有多大。我已经跟您说过一次了，不打仗，不拿武器，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要失去生机，根子也要慢慢枯萎，最后他们就会消亡。”

“那么有了武器，有仗打，他们就能返老还童吗?”

“他们是那么想的，但实际上武器会使他们消亡得更快。”

“照您说，对于他们来说，战争有点像早晨做的体操。它能美化、灵活四肢，并且使呼吸顺畅。”

“短时间里会这样。”神甫说。

“那就是说，有武器也好，没有武器也好，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注定要消亡的。”

“看样子是这么回事。”神甫说，“他们今天的政府，使阿尔巴尼

亚人对战争一马当先的古老传统有了原则，把它纳入自己的政治轨道。邻国有幸的是，他们只有二百万人。”

将军点着了一支烟。

“您还记得，在山上，我们睡在帐篷里的那些晚上，公用局的工人们唱的那些歌吗？您还记得，当我们听到那些歌的时候，一种怎样的讨厌和痛苦的感情，压在了我们的心头？”

“我记得。”将军说，“有些事是很难忘记的。”

“那些歌主要是赞颂破坏和死亡的。”神甫接着讲下去，“这是他们艺术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歌曲里，在衣着上，在每一事物中，都能找到。这或多或少是巴尔干人民的性格特征，而在阿尔巴尼亚人身上，这一特征最为鲜明。甚至连他们的国旗，除了象征血和灾难之外，再也不象征别的什么。”

“讲起这些事来，瞧您的劲头有多大哟！”将军说。

“我干这行已有很长时间了。”神甫回答，“奥斯卡尔·乌阿蒂在一个地方曾说过，下层阶级的人需要犯罪，因为犯罪能给他们一些强烈的印象；而这些印象给了我们这些人之后则认为是艺术。他的这一说法你可以很恰当地用在阿尔巴尼亚人身上。唯一的不同就是你得把‘犯罪’这个词换成‘战争’，或者换成‘杀人报仇’。这是有原因的，我们要客观地说，阿尔巴尼亚人并不是注定的犯罪者。他们杀人常常是根据古老的规矩和习俗才那么干的。他们杀人报仇，是戏剧性生活的一幕，这一幕是在领教了悲剧的全部规则以后写出来的；有序幕，戏剧性愈来愈强，还有尾声。这种尾声没有杀人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杀人报起仇来，简直就好像一头发疯的小公牛。这种小公牛一放到山上，就要造成大灾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小公牛的脖子上佩戴很多装饰品。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打扮小公牛的，以便当小公牛放出去，到处撒下死亡的种子的时候，他们好连同死亡一起，再尝受一下审美的欢愉。”

将军聚精会神地听神甫讲话。

"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好像跟在剧院里差不多。"神甫继续说，"它是根据古老的习俗治理的。阿尔巴尼亚人生和死，都像在舞台上。只有一点除外，即台上的布景是高原和山峦。在这里，他们在一切方面都过着赤贫的生活。阿尔巴尼亚人常常死去，那是因为需要重视一些规矩，而并非客观原因所致。在陡峭险峻的群山之中，蒙受着巨大的痛苦和艰辛萌生出来，严寒、饥饿或山上的雪崩也毁灭不了的生命，常常因为不经心说出的一句话，一句多余的笑谈或者投给一个女人一瞥火辣辣的目光，就会突然结束。发生杀人报仇的事情，常常不是出自任何一点火气，而仅仅是习俗规矩要求要那么干。杀人者杀害他人，造成牺牲流血，那也仅仅是为了忠实地履行习俗规矩中某一章节的内容。这些陈旧不堪的内容，如同绳索一般，一生中都束缚着手脚，直到某一天腿脚被缠住，绊倒在地，再也无法起来的时候，才能告一段落。就这样，千百年来，阿尔巴尼亚人除掉演出了一出杀人流血的戏之外，没干别的事情。"

他们觉察到身后有某人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阿尔巴尼亚专家。

"我在旅馆里找过你们。"他说。

"事情怎么样啊？"

"明天需要与公用局指挥部的代表一起重新审核一下协议，他们十点钟等我们。"

"那好吧。"将军说。

神甫蛮有意见地看了看专家。他想弄明白专家是否听到了他讲的最后那几句话。

"我们在交谈你们的风俗习惯。"神甫以一种心平气和的语调说道，"好有趣的风俗习惯哟。"

专家自己微微一笑。

"他给我讲杀人报仇的事儿。"将军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太有意思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毫无意思。”专家打断他的话，说道，“有些外国人以为，杀人报仇和另外一些坏风俗能说明阿尔巴尼亚人的心理，可这是荒谬可笑的。这些风俗是压迫者和宗教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是这样?”神甫说。

“有些外国人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注视杀人报仇这一问题，这是怀有一定的目的的。”

“这是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神甫说。

“我不这样想。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舆论，并且宣传一种消灭阿尔巴尼亚人种的思想。”

“噢，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神甫一边冷冰冰地微笑，一边说。

专家又和他们一起走了几步，然后同他们问了好就走开了。

“您只是根据心理因素来解释风俗习惯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我想还是有客观、历史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专家一走开，将军便说道，“您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民使我想起什么了？他们使我想起了野兽，野兽察觉到危险的时候，猛扑上去之前，先是心血翻涌，火上头顶，绷紧全身的肌肉，使出所有的力气，全部神经都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显然，这个国家经常濒临危险的边缘，这种受惊的状况，形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

“您说的这个，正是他们称做‘警惕’的那个东西。”神甫说道。

神甫接着讲下去，可是，将军不再听他讲了。

“关于他们我们似乎说得太多了。”将军终于讲了这样的话，“他们的事情对我们有什么用？一个多小时之前，他们不是散伙了吗?”，

神甫张开手掌，做了个手势。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事儿看得并不清楚。”将军继续说道，“我们没能更好地看清楚我们的这一工作有多糟糕，它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您就没看见我们也停滞不前了吗？在这一工作中，难道不存在一点落后的、黑暗的、不相称的东西吗?”

“不存在。”神甫说，“我没想过会存在这种东西。这是一项崇高的使命。”

“我们好像变成了一个活动瘤。”将军说，“我们老是围着人们转悠，跑前跑后累腿磨脚，妨碍他们工作。”

“您说的是那一次，因为我们挖掘坟墓，寻找军人的遗骸，而使水利工程耽误了好几天吗？”

“不是。”将军说，“不光是那一次。在我们的工作中，有点不正常、不太好的事儿。”

“绝对没有任何事情。”神甫说。

“您是否考虑过，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寻找的军人，也许并不喜欢我们挖掘坟墓这桩事吧？”

“这是荒谬的。”神甫说，“我们的使命是如此的崇高，如此的人道！每个人都会感到自豪。”

“虽然如此，还是有点不相称的东西在里面，有一种讽刺意味，哪怕再小，但总还是有。”

“没有。”神甫说，“什么也没有。也许您作为一名军人，心里感到不舒服是另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将军问道。

“我们何必谈论这些事情？也许是您本人就不喜欢向自己承认这些原因。”

将军装模作样地微微一笑。

“莫非又是心理原因？”将军说，“显然您是在搞心理分析。我听说了，关于这一问题说法很多。可是，我要说句真话，这事我还是弄不明白。我们军人不喜欢这些细琐事。”

“那么，其实……”神甫是想说，每人都有他喜欢的事物。

“话虽然这么说，”将军说，“可您怎么解释我处在困难之中的心境？我喜欢听您论东道西地讲大道理，您讲得非常精彩。不仅如此，我还要向您保证，不管您对我讲什么，都不会伤害我的自尊心。”

“既然您如此地坚持要我说，那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您。”神甫特别平静地说道，“在您的神经里不断形成的印象，实际上是，您在心灵深处为自己不是那个在阿尔巴尼亚统帅师团的将军而感到遗憾。而且您还在想，假如统帅师团的是您，也许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您不会领着军人打败仗，落个注定死亡的结局，而是要把他们拯救出来。因此您不时地打开地理形势图，趴在上面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若不就在每个烟卷盒上，描绘军事策略模型。您为每个打败了的战役而哭泣，让每次败仗转溃为胜，潜意识地把您自己放在命运不佳的军官的位置上，不断地幻想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转败为胜。”

“够了。”将军说，“那么说我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您竭力要从我的心灵里挖出点东西来证实这一点，您好像是费托尔·陀斯妥耶夫斯基吧?”

神甫微微一笑。

将军变得满脸阴沉沉的，很难看。

“我没有什么秘密的理由。”他慢腾腾地说道，“我可不是一个天真的姑娘，以为搜集军人的遗骸类似一出多愁善感的歌剧。我知道这是一项繁重、前景黯淡的工作。我也知道，在这一工作中帮我的忙的将有爱与恨。对这些可怜的军人的爱，对屠杀他们的人的恨。授予我这一使命的那一天，我从作战部回到家里，感到有一种音乐响彻在我的心中。这种葬礼乐是哀伤的，同时也是庄严的。后来，当我打开文件夹子，一页一页翻起来的时候，觉得从那厚厚的没完没了的纸页中，刮起了一种愤恨与报仇的风。我走到地球仪前，找到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小极了，小得像一个小黑点，这一事实使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狂。然后，一种愤愤的仇恨之情又捕捉了我的心。这个见鬼的国家，这个小黑点，吞噬了我们那么多英俊而勇敢的小伙子！我想尽早动身，来到这个野蛮、落后的国家，来到我曾把他们想象成一群群土人的人民当中，在他们中间自豪地散步、逗留，愤愤地、轻蔑地盯着他们，对他们说：‘噢，野蛮人，瞧瞧你们干了些什么！’我想象

着运送遗骸的庄严气氛，描摹着阿尔巴尼亚人惊奇、茫然的眼睛；那好像是无知的犯有过错的人的眼睛。此人打碎了一个漂亮珍贵的花盆，待在一旁伤心地凝视着。在他们中间，我们将跨过我们军人的棺材，显示出这样一种神威；甚至我们的死亡也比他们的生命更美丽。当时我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可是，到了这里，工作起来，却是另一回事。这个您比我更清楚。首先失去的是自豪感，然后是庄严的气度，接着是另外全部的想象力，而今我们则是在这里，在普遍的冷漠和不可思议的、冷嘲热讽的目光中四处游荡，成了两个可怜的战争的笑柄，成了在这个国家里作战并惨遭失败的全部军人当中最不幸的人。您说不是这样吗？”

神甫默默地没搭腔，将军后悔不该讲这些话。

他们一声不响地走了一段路，最后的叶子不停地从树上飘下来，落在人行道上，人们在那儿走来走去。将军很难过，觉得自己很孤独。他不愿意谈论这些事情，最好还是说说他们在公路上和帐篷里度过的那些令人不快的日子。在那儿，雨水淋湿了身上的衣服，冷风吹得你浑身打哆嗦。谈谈身着黑色粗料衣服的农民们的不可捉摸的目光；谈谈神甫梦中惶恐不安地叫喊的夜晚；谈谈那个战场，如今它积满了一个水电站的湖水，坟墓都淹没在水底下，每当黄昏，水就变成红色，到处都是红红的一片。最后，还要谈谈那块头骨。头骨里依然还存有所有的金牙。工人们把金牙挖出来的时候，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样子，这块头骨似乎正带着恬不知耻的神情，对一切发笑呢。

他们慢慢地走着，来到地拉那大学前面的广场上。然后转身向右边拐过去，来到歌剧院近旁，开始向两旁长着椴树、弯弯曲曲地盘绕在申·普洛科普小丘上的坡路登去。

路旁的两条沟渠，积满了黄黄的树叶，宽大的公园里的塑像，在光秃秃的林木当中，似乎被冻得直发抖。

当他们登到小丘的顶端时，看到了躺卧在小丘之间的人工湖；这

个湖很长，跳荡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浪花。在一座小丘的尖上，矗立着一座教堂，紧挨教堂有一个舞场。在舞场的一棵圆圆的松树周围，有一排高高的柏树，风儿一吹，发出呜呜的涛音。旁边放着一大堆木箱子，箱子上写着黑字：科尔察[1]啤酒。

“这个湖应当是很晚的时候，直到最近才建成的吧。”神甫说，“在这个地方，过去未曾有过舞场。”

“这地方蛮漂亮啊。”

“是的。从这儿望去，几乎整个地拉那都能尽收眼底。”

他们从人工湖方向转回身，朝地拉那市里瞭望，将军的雨衣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

将军望着那条将地拉那一分为二的大街。一棵杨树在前面迎风抖动着，它的一部分枝叶，时而挡住了部长会议大厦，时而又遮住了党中央大楼。风大的时候，枝叶连地拉那市的大钟都给挡住了；那大钟看上去仿佛跟清真寺的塔楼粘在一起了。枝叶也遮掩了一部分斯坎德培广场，滑到议会大楼上面，差点碰到了国家银行大楼。

“那本介绍阿尔巴尼亚情况的书上说，大街整体建筑的一半，很像里克托尔的斧子。”将军挥手指着前方说。

“这是真的。”神甫说。

“话是这么说，我费了好大劲，用好几分钟去寻找相似之处，可我怎么也找不到。”

“您要仔细看才成。”神甫用手指着说，“大街使你会想到斧把，大学校长办公室的高高建筑物，则是斧把末端顶出斧头的那一部分，歌剧院好似斧头的后面。而体育场嘛，”神甫伸手指向右边说，“体育场就是斧头的圆顶。”

“真有意思！”将军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找到相似之处。”

“也许是得站在比这儿更高的地点上看才成。”神甫说，“除这

① 科尔察是阿尔巴尼亚东南方的一座著名古城。

一点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战后阿尔巴尼亚人竭力要除掉这种相似之处。”

“莫非是整体建筑的一部分被他们破坏了？”

“没有。”神甫说，“恰恰相反，在整体建筑中他们还增建了另外的东西。这个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我以为全部破坏你对斧子想象的东西，是左边那条长街。”将军说。

“那是整整的一条街。”神甫说，“我觉得那条街的名字是叫‘五·一街’。”

“用一句话来说，这好像是用一个巨大的印章在市中心盖上的印迹。”

“战后共产党人第一次乘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于是立刻下命令除掉里克托尔的斧子。”

“从前共产党人了解这件事吗？”

“你上哪里能了解到这个？他们可能了解，也许不了解。”

“不管怎么说，从高处看，会瞧得更清楚些。”将军说。

“那当然了。”

他们走在教堂旁边的柏油路上。路边的一条长椅上坐着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她把头伏在小伙子的肩膀上，两眼有气无力地望着他；而他却在抚摸她的双膝。

“走下去吧。”将军说，“刮起冷风来了。”

他们又开始沿着两旁长着椴树的道路向下走去。

第十五章

汽车将公路甩在左边，开进平原的正中间，与农场的葡萄园方向平行前进。将军把一张地理形势图放在膝盖上，不时地朝车外张望。他晓得，与此同时，在后面的卡车司机室里，专家像他一样，也把同样的地图放在膝盖上，而且不时地朝车外张望，以便准确地找好应当停车的地点。

> 右边是一排高高的杨树。如果你向那边望去，就可以辨认出远处一个地主庄园的房屋，再远一点，仍然还存留一个磨坊。杨树下边正是墓葬地。为了搞清楚坟墓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按 V 字形挖墓，尖端处指向大海。五人在一侧，其他五人在另一侧，少尉在最前头。

“告诉司机，往杨树那边开。”将军说。

神甫把将军的话译给了司机。

他们走下这段坡路，起风了，杨树发出飒飒的响声。神甫第一个朝着应该是坟墓的地方走去。突然，他惊奇地叫了起来。

“怎么回事?”将军一边靠近跟前，一边说。

“您瞧瞧嘛。”神甫说，“往那儿瞧瞧。”

将军向那边望了望。

“这是怎么个意思?”将军气呼呼地说。

杨树下边，有两排挖好、相互交叉在一起的坑，其形状为V。看样子，那土坑是一个或两个星期之前挖好的，因为最近下的雨，使每个土坑淤积了一半水。

“我简直是什么都弄不明白。”神甫说。

“在我们抵达这里之前，有人就把坟墓给挖了。”将军说。因为发火，声音都颤抖了。

“专家来了。”神甫说，“让我们瞧瞧，看看他怎么说。”

“发生什么事情了?”专家走到跟前的时候说道。

将军不说话，用手把土坑指给他看。专家看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膀。

“奇怪。”他慢慢地说。

“有人不经我们允许，背着我们就把坟墓给挖了。”神甫说，“您还有什么好跟我们说的?”

专家再次耸了耸肩膀。

“这种挑衅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将军嚷嚷道，“我立刻就把这事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这会儿我什么也不能说。”专家说，“可我要把它弄清楚。请您稍微忍耐一下。”

“那好吧。”将军急赤白脸地说。

凑到跟前的工人和两名司机，奇怪地望着他们。

“这样一件事从来也未造成乱子。”上年纪的老工人说。

专家又重新把土坑数了一遍，把地理形势图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一会儿。

“喂，听我说。”他转身对卡车司机说，“你到农场去一趟，带上一个人来，随便什么人都行。告诉他，我们是部长会议派来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们。”

“好吧。”司机说。

“我们看看农场的人会跟我们说什么吧。”专家说。

“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将军说道，声音苦溜溜的。“这是一次严重的挑衅事件。所有的人都有义务遵守国际法。”

“这一会儿我什么都不能说。”专家重复说，“我只是要对您保证，如果有谁胆敢干这样一件有意伤害您的事情，那他一定要受到我们法律的制裁。”

“不管他怀有怎样一种目的，”神甫说，“这总算是一种渎神行为。”

“我要把这事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将军又说，“我知道某一天我会变成别人挑衅的对象，但我不相信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对您没有干任何挑衅的事儿。”专家说。

“那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将军用发抖的手指着土坑说道。

“现在我们就会有个水落石出了。”

这时候，工人们站在土坑前面，议论着土坑奇怪的方位。

“头一回碰上了坟墓排列的方位为V形的坟地。”

“怪事！”

“大雁就是按这样的队形飞。”上年纪的老工人说，“秋天它们飞走的时候，你们看见了吧？”

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越听越近。在司机坐室里，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一个人。

“现在我相信一切都可以搞清楚了。”专家说。

司机跳下车，给陌生人开了门。陌生人下了车，把眼前的一切都用心地逐一地看了一下。

“您在这个农场里工作？”专家问他。

“是的。”

“工作很久了吗？”

“很久了。”

“那您知道这些军人坟墓的事？”

陌生人看了看掘开的墓穴。

“这事大家都知道。”

“比方说，谁知道？”

“这是外国军人的坟墓，在这儿存在二十多年了。”

“那怎么解释……”

“他们是十天前来到这儿把墓挖开的。”

“我们想要知道的正是这个。”专家说，“那么十天前是谁挖开的？”

陌生人再次逐一地望了一下公用局的工人、将军、神甫，后来还看了看汽车。

“您见过挖墓的人没有？”专家问道。

另一个人躲躲闪闪，不愿马上回答。

“您是在讽刺人吧？”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您比我清楚。”

专家打了一个感到奇怪的手势，周围寂静无声，树叶飒飒地响个不停。

“我请您简短明了地告诉我们：十天前是谁挖的坟？”

农场的这位陌生人生气地瞟了专家一眼。

“你们挖的。”陌生人斩钉截铁地回答。

专家的额头汗水津津。

“是你们大伙挖的。”另外那个人说。他用手指了指公用局的工人、将军、神甫和司机。

大家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是谁发现的？”有人小声地问卡车司机。

“听我说，”专家说，“这不是体面的……”

“甭说这些。”农场的陌生人说道，气得直眨眼，“多余给我添乱。你以为你是有文化的人，可以耍弄别人吗？”

他轻蔑地瞟了专家一眼，转身就要走开。

“等等，我说同志。”上年纪的工人喊他。

“喂，你在那边待着吧。”卡车司机对他大声嚷道。

“您不害臊，”农场的陌生人转回头说，“您寻思人家都是傻瓜？您以为十天前你们来到这里，从早到晚挖坟，我们没看见你们吗？”

“这个我们也需要。”神甫低声说。

“谁？我们？”

“你们，可不就是你们嘛！你们坐的就是这个草绿色小轿车，还带了这辆卡车，车上装得满满的。”

“嗳，等等。”专家冷不丁说道，“挖坟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没有，我们是老远看到的。”

专家点了点头。

“我觉得我是明白了。”他说，“肯定是另外那些人。这是多么大的误会呀！”

“怎么回事？”将军问道。

“我觉得是那位中将和他的那个老百姓打扮的人，在我们之前先来过这里了。”

“那么这事是他们干的？”

“我可以肯定是这么回事，不会不是这样。”

农场的陌生人，一边打着手势述说着，一边指着一点什么东西让工人和司机看。

“这怎么可能呢？”将军说。

“他们没有正经八百的图纸和说明，也许是把这些坟当做他们军人的坟给挖了。”

“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应该问问当地人呀，再说还有身份牌可以作证呢！”神甫说。

“这也使我感到吃惊。”专家轻轻地咬着下嘴唇说。

“这是严重的无耻行径。”将军说。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回干这种事了。”专家说，“人们告诉我，在这儿，在南方，他们还错误地挖过两个国民阵线分子的坟；在另一个地方，还挖过一个古老的穆斯林坟地。”

“那些遗骸他们也拿走了?”

“拿走了。”

“真是太富有幻想性了!”将军说。

“这些人神经没毛病吧?是什么唆使他们干这种事?”

“可能有一个原因。”专家若有所思地说,“我怀疑有一个原因。”

“一个什么原因?”

专家支支吾吾不愿回答。

“您是怀疑他们在做投机买卖?”神甫问道。

专家微微一笑。

“我任何事情也不能对你们讲,请你们原谅。”

“也许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一种很肮脏的勾当。”将军说,“也许是他们一无所得,于是现在便开始盗别人的墓。”

“是他们自己对我们说的,他们在白费时间,瞎找。”

“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不是国家的使者,而是两个冒险家。”将军生气地说。

“而且糟糕的是,他们立刻就把找到的尸骨打包存起来了。”专家说。

“那就是说,这十一个人的尸骨我们是运不走喽?”

“如果尸骨已经运走了,我觉得那就难办了。”

“这意味着我们军人的尸骨要分送给另一个国家人民中的一些家庭,代替他们自己亲人的尸骨。”将军叫喊道,“这简直是太耍弄人了!”

“看这个意思,他们是许下了诺言。”神甫说,“所以他们才匆匆忙忙地把尸骨运走。”

“当他们找不到他们自己军人的尸骨的时候,就喊了:‘好汉们,让我们偷吧,见到什么偷什么。’噢,这事干得有多漂亮啊!”

将军恼火极了。

“我们走吧。”他突然说道,“在这儿还有什么好干的呢?”

他们上了车,向着大海,正好朝方位排列为V形的尖端方向开去了。

第十六章

海岸迷漫而凄凉，水泥砌的堡垒峭拔挺立。在被海水淹湿了的沙子上，在稍远一点的悬崖旁边，现出另外一些更大的堡垒。

公用局的工人在挖支撑帐篷的桩子。第一个帐篷挖掉的时候，在被水冲积得发硬的沙滩上，留下了几个奇怪的脚印，好像有一个大爪子动物来过这里。

工人们把第一个帐篷扔进车里，放在木箱子上面，然后又去拔另外一些帐篷的桩子。

从海上刮来冷飕飕的风。

将军向北望，在那儿，在堡垒后边，浴场的首批别墅开始展现在眼前，另外还有夏季火车站、一排排休养所和高大的旅馆。大多数休养所和旅馆，已经过了营业季节，关张了。

战争爆发第一天阵亡的军人的尸骨，正在往一块儿搜集。他们在海边上已经活动整整一个星期了，在当年军队的所有登陆点上都停一停。每个登陆点都有自己的坟地。

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战争爆发的第一天，1939 年之春。那时候，他在非洲。收音机在夜里广播了消息：法西斯军队在阿尔巴尼亚已登陆，阿尔巴尼亚人民以和平的方式，手捧鲜花，欢迎光荣的给他们带去了文明和幸福的师团。

后来，报纸到了。再晚些时候，杂志也到了。杂志上登了很多有关军队登陆的照片和通讯。他和军人们读到过不少关于那一年美丽的春天，阿尔巴尼亚瑰丽的大海和天空，浴场和清澈的地平线，阿尔巴尼亚女人的爱情，漂亮的服饰和美妙的舞蹈的材料。报纸和杂志每天都刊登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夜里，军人们就做换防到阿尔巴尼亚，到美丽的充满和平气氛的海滨，到永生的橄榄树下的美梦。

将军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也希望换防到阿尔巴尼亚去。然而，他得了病，离开了非洲。以后再也没去过任何地方。

尽管如此，命运仍然还是给我保留了一份儿战争，让我以后去参加。将军自言自语地说。正是现在，二十年过后，当世界进入和平的时刻，我来参战了。

将军看着公用局的工人们如何卷起另一个帐篷。他上了小轿车，神甫跟着他也坐了进去。

“干完了吗?”将军问道。

“干完了。”

“那样我们走吧。”

小轿车开得很慢，卡车在后边发出闷声闷气的响声。司机把头探出窗外，朝后边看了看。卡车的发动机时而响声很大，时而声音又挺小。后来，响声戛然停下了。

“卡车不走了。”司机说道，减慢了车速。他向窗外望了一会儿，然后推开了车门。

“发动机熄火了。”司机说，“我去帮他一下。”

将军把头伸到他身旁的车窗外边，看见了正在卡车后边用力推车的公用局工人和向他们奔去的轿车司机。卡车慢慢地动了起来，工人们时不时地喊着“加油!”继续把车朝前推去。稍过了一会儿，卡车开到了小轿车的旁侧。工人们继续一边喊一边推，脚在沙地上一哧一滑地朝前面挪动。刹那间，将军看到了工人们汗流满面的吃力相和紧贴在车帮上、绷得很紧的胳膊和肩膀。车厢里边，像往常一样，一

些大箱子和一大堆镐头和铁锹，正在咣里咣当地颠簸着。

“这是头一回碰上卡车发动机熄火。”将军说。

“是的。也许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吧，”神甫答话，“我们已经是两天两夜没挪窝了。这里不停地刮风。”

“没有什么能比马达打不着火的汽车更混账的了。”

神甫没说话。

突然，从那边传来了马达嘟嘟的响声，他们的司机一头大汗，直向小轿车跑去。

“见鬼，噢，这活计真够折腾的！”司机一边钻进车里一边说，“好不容易打着了。”

稍过片刻，小轿车赶超上来，从卡车旁边开过去。将军再次看到了坐在大箱子上，抽着烟，颠得东摇西晃的公用局的工人们。

他们从海滨浴场的别墅楼旁边开过去，这些别墅楼现在显得冷冷清清，无精打采，已经上了窗板。他们还在旅馆和夏季餐厅的现代化大楼旁边走了一段，这些旅馆和餐厅早就不营业了。海边的跳舞场很长，在角落里堆放着许多桌子、凳子，摞得高高的，好似塔楼一般，被扔在一边，仿佛是对夏天的纪念。

“夏天这里应当是很美的。”将军说。

“我也这么认为。虽然如此，可我总不相信，在军事堡垒旁边洗澡、散步，会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尤其是对女人来说，更是这样。”

将军很有意见地环视四周。

“我想，加上全部的现代化防卫设施，一部分堡垒，即使在今天，在军事上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喜欢反反复复地宣扬，阿尔巴尼亚是亚得里亚海岸的一座堡垒。”神甫说。

将军转首向海边瞭望。

“您跟我说，大海给阿尔巴尼亚人带来过不幸，所以他们不爱大海。”

“是这样。”神甫说，“阿尔巴尼亚人像那些使水感到害怕的野兽

一样。他们喜欢爬山越岭，向荒野进军。在群山万壑之中，他们觉得心里踏实。”

海滨渐渐地离开了，现在既看不见夏季火车站，也见不到分散在四处的雪白的别墅了。

“现在我们还剩下一个任务，只要找到战争爆发第一天死去的一名军人就够了。”将军说，“这是需要在海滨找到的最后一个军人。”

“奇怪！”神甫说，“为什么这个军人要那么特别？”

“谁晓得当时是怎么回事情。”将军说道。他掏出一张地理形势图。“瞧瞧他该在哪里。”他用红铅笔划了一个点。

“我相信一个小时以后我们会到达的。”

“也许还会早一点，我们马上就把这事干完。”

“除了一些个别的挖掘任务之外，我们还得到这一带干一轮。”神甫说。

“是的，是在一个半山区。这一轮照样很困难。”

“没关系。”神甫说，“主要是要让这项工作尽早结束。”

“您希望尽快回国吗？”

“那当然喽。”神甫说，“怎么，您不希望尽早回国？”

“我是在这么幻想。”将军说，“我急不可待。不过，这会儿谈这个为时尚早，我们连工作的四分之一都没完成。”

“是这样。”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还早。”他又重复一遍，“甚至是太早了。”

神甫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你忍受不住了，他们在等你回去。将军自言自语道。

“我们很久没见到他们了。”他大声说。

“他们是谁？”

“中将和市长啊。”

“谁晓得他们在哪里挖呢！”

“不在某一条大街，就一定是在某个体育场。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还未上轨道。”

“他们老是按照原来既定的路子干。我不相信他们能在两年内离开这里。”

“那我们该怎么办?”将军说，“主要的是可不能让他们偷走我们的一个军人。”

他们不声不响地走完了另一段路。

特别军人之墓所在的修道院，坐落在一个小丘上。公路在那儿分成两个道岔，一条继续通向北方，另一条向左拐，延伸到海岸边。

他们登到一个小丘上。首先登上去的是将军、神甫和阿尔巴尼亚专家，跟在他们后头登上去的是肩上扛着镐和锹的公用局工人。两位司机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各自点着一支烟。

在修道院建筑物的前面，曾有过几座年限很久、堆头挺大的坟墓；墓上面有很大的十字架和用拉丁字母写的碑文。修道院古香古色的大门关闭着。大门上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凿着“社会耶稣”几个字。

阿尔巴尼亚专家多次敲门，一直敲到里边传出脚步声，他才停下来。一位头发花白，身着黑服，头戴小小的三角帽的神甫来到门口。

“神甫，您好!”专家说。

“您好!”他回答道。

“在你们修道院这儿，有一座外国军人的坟墓，那位军人是1939年阵亡的。我们想把他的尸骨取走。”

年老的神甫向将军、神甫和公用局的工人瞥了一眼；公用局的工人，还未把肩上的镐头撂在地上。

“我们是国家命令在身，并由先生授权。”专家一边从皮夹子里取出一点东西，一边说道。

老神甫瞪着水汪汪的动人的眼睛，看了一会儿介绍信。他读信，搐动着嘴唇，好像在嚼点什么东西。

“好吧。”老神甫说，“现在我带你们到坟那边去看看。”

所有的人都跟在他后边，绕着环围修道院的外墙向前走，从修道院后边走了出去。

“这就是坟。”老神甫说。

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坟头立着一个石制十字架，另外还放着一个钢盔。因为时间久了，钢盔已经褪色，盔边也陷进了烂泥里。春季里，当小草长出地面时，它一定会被绿草严严实实地遮掩起来。

一名工人用铁锹将钢盔挖走。另外两名工人开始拔石制的十字架。其他的工人作好挖坟的准备。

“这里为什么单单只有这一座坟?”将军问道。

“这位当兵的是尼科·玛尔蒂尼杀死的。”老神甫的话憋在嗓子眼里，声音没有力气。

老神甫提到尼科·玛尔蒂尼的名字时，将军带着疑惑的神情望了神甫一眼。

“那是一个陌生的山民。”神甫解释道。

“我亲眼看见他杀死了那个意大利兵。”老神甫接着说，“他是在那边的山坡上，从高处向意大利兵开枪的。”

他们转过头去，看到了那座高高的、宛如城堡的塔楼一般的小丘；这座小丘陡峭地屹立在公路旁。

“这里有过激烈的交火?”将军问道。

“没有。”老神甫说，“在这一带地方，从这儿一直到海边，是没人居住的。任何人也不知道靠我们跟前这个地方会有军队登陆。”

“从这儿到海上有多远?”

“十公里。”老神甫说，“显而易见，军队纯粹是悄悄地登陆的。任何人也没想到军队会在这个不显眼的地方登陆。唯独尼科·玛尔蒂尼得到了他们登陆的消息。”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将军问道。

“是个山民。”老神甫说。他言谈呆板，仿佛是重复他已背熟的话。“是一个普通的山民。他肩上扛着枪，来到公路上的时候，我看

见他了。因为认识他，所以我便走到他面前问他：‘尼科·玛尔蒂尼，你想往那儿去？’‘我要去开枪。’他说。‘就你一个人？’‘就我一个。’我想拦阻他，走下小丘，来到公路上，站在他前面，划起十字。‘上帝的奴隶们彼此都要和睦相处。’我对他说。他恶狠狠地看看我，就把枪端了起来。‘神甫，快从路上躲开。’他喊道，然后目光向钟楼瞟去。他一声不吭，径直向修道院走去，我跟在他后边。我们俩登到钟楼上，从那儿瞭望被登陆军队搞得一团乱的海岸。‘他们登陆了。’我对他说，‘尼科·玛尔蒂尼，回家去吧。’‘我不回去。’他说，开始像一头猛狮似的转来转去。后来，他从钟楼上下来，我看他迅速地跑到公路上，向那座小丘跑去了。”

“后来，他打枪了？”将军问道。

“是的，只一个人战斗。他开枪整整打了一个钟头，子弹射得并不密集，空中的枪声都是啪啪啪地单响。公路被大兵闹个乱七八糟，他不停地射击，已经不可能离开那儿了。只有当大兵用迫击炮射击他的时候。枪声才停下来。”

“把他击中了？”

“没有。开头，当他的枪声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以为他被击中了。可后来我们又得到消息，在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尼科·玛尔蒂尼又爬上一座山丘，重新开炮射击，射了一个多小时。”

“是的。”将军说，“这样的一座山丘，是爬不上去的。如果不开炮，可以在那儿坚持一整天。”

“他们试图爬上去。”老神甫说道，“那个意大利兵也在那儿死了。我们站在修道院的窗户旁边，看到了他们拼死拼活的全部情景，他们白费劲了。后来，他们用军大衣包好那个阵亡的军人，抬到一个地方，动手把他埋了起来，同时还决定使用迫击炮，轰击山头。”

“那么，那位山民还活着？”将军问道。

“您是说尼科·玛尔蒂尼？”向山那边眺望的老神甫把目光收回来，抬起动人的眼睛问道。

"没有。"老神甫说道，"他牺牲了。那一天，他挺身而出，在四个不同的射击点上进行战斗，直到累得筋疲力尽倒下去为止。人们都说，当子弹打完了，眼看载着军人的卡车向地拉那急驰而去的时候，他大叫了一声，就像死了人，我们的山民大声叫喊那样。大兵从四面八方把他包围起来，用许多把长刀把他剁成了碎块。"

一连几秒钟，周围一片鸦雀无声。

"尼科·玛尔蒂尼没有坟。"老神甫说。他以为他们现在也要寻找玛尔蒂尼的坟呢。"玛尔蒂尼既无标记，也无十字架，只有一首关于他的歌。"

"真奇怪！"半小时以后，当小轿车向地拉那驶去的时候，将军说道，"怎么能一个人单独作战呢？"

"他们为能单独作战而感到光荣。"神甫说，"这是他们很悠久的传统。"

将军点着一支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现在结束的也是战斗的一天。"将军声音低低地说。

神甫未说一句话，他望着公路两旁的原野。冬天的冷风，开始在原野里吹刮。走了几公里，亚得里亚海又呈现在眼前。这一次，大海是在公路的右边出现的，它是那么辽阔，那么无边无际。

海岸的对面，耸立着许多脊梁圆圆的小山丘，山丘上埋着战争的第一天为国捐躯的阿尔巴亚尼人。

他们从不同人的口里详细地了解了那一天在阿尔巴尼亚的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这两个海岸上发生的种种事情。当时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敌人从海上来了，阿尔巴尼亚人从全国各个角落结伙出发了。有的是五个人，有的是十个人，也有的是二十个人。他们背着枪，来参加战斗了。没有人进行组织，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跨过千山万壑，朝这里来了。在他们的脚步声里，有一点古老的、非常古老的、也许是作为一种本能一代一代留下来的东西。从杰尔吉·埃莱兹·阿

里雅[1]的传奇时代开始，当祸事犹如魔鬼一般，经常在海上出现，为了不让它深入到内地，需要将它在海边消灭的时候，这种本能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古老的警报，是一种来自蔚蓝的海水，总的说是来自遥远的低矮地方的恐惧，因为祸事总是经常从低矮的地方向外蔓延。因此，他们从高山上下来，要和还在抵抗的皇家军队的残兵败将聚在一起，共同作战。他们闻到了海腥味，感受到了大海的广阔无垠，同时也察觉到了危险；他们把波涛的轰响当做战斗的音乐。

那一天，几十个这样的小队，就是如此地从山上下来的。在这些小队当中，有戴礼帽、戴眼镜的人，他们与身材高大的各种家族的山民混合在一起。这些家族的人们，依然还过着家长制的生活。也许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在进攻阿尔巴尼亚，他们是在同哪个敌人作战，因为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祸难已从海上来了这个事实，而且需要把它赶回海里去。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人，从来未亲眼看见过海，因此，当亚得里亚海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奇妙地喊道："这海有多美啊!"也许他们不相信，祸事会从那边来到这里。后来，从山上下来的人冷漠地望了望军舰；军舰上那一排排直冲着海岸的大炮，使舰船看上去好像一大片黑糊糊的东西。他们还望见了飞得很低的飞机，登陆的船舶。然后，他们没打很多时间，便投入到搏斗中，就像习俗所要求的那样。接着，他们有的在先，有的在后，一个接着一个地牺牲了。

后来，当日晚些时候，那些迟到的人赶来了。他们来自遥远的山区，迢迢的路程累得他们全身瘫软，四肢无力。太阳落山的时候，也就是正好在侵略者用猛烈的炮火血洗都拉斯[2]的大街小巷，在夕阳的映照下，街上四处仿佛燃起大火的时候，他们投入到了战斗中。

---

① 阿尔巴尼亚民间故事中的英雄人物。

② 都拉斯是阿尔巴尼亚亚得里亚海岸的重要港口。1939年4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首先是从这里登陆进犯阿尔巴尼亚的。本章的一些描写，都是以历史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为根据的。

在黄昏来临之前，一直有迟到者陆陆续续赶到这儿来。他们当中有些人完全是单独一个人，好像挎枪的倒影，出现在山丘的尖上。探照灯一发现他们，机关枪就向他们扫射，将他们打倒在地。夜里的露水打湿了他们的头发，一个个脸、腹着地，一直躺到清晨。

第二天，人们将他们就地埋葬了。那年春天，他们的坟墓处处可见，就像散落在山丘和对面海岸上的羊群一样。任何人也搞不清楚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到这里。死后只在头旁边放上一块石板。人们只是凭着富有特色的地方服装认出了山民。有的人来自遥远的北方阿尔卑斯的一些家族。在那里，遇上死人的时候，他们的物品都要蒙上黑纱或黑布。冷冰冰的、郁悒的石头塔楼和死者，也要蒙上黑东西。然后还要唱一首歌。而对在这种场合战死的勇士，歌曲里肯定要有一点关于海的内容；关于遥远的背信弃义的海的内容。





春天来了，又去了。在异国的土地上，长出了青草。青草盖满了山丘，铺展在河谷的坡地上，占据了公路附近每一条窄窄的土地。

整个春天，将军、神甫、阿尔巴尼亚专家和公用局的工人小组，总是攀高山，下平地，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周旋。夏天他们也是这么度过的，整整一个夏天，他们的休息时间没超过两星期，因为工作的进展并不太好。在最炎热的月份里，他们在北方阿尔卑斯山上挖找尸骨。后来，天气一冷，便又从山上下来，回到一些先前已经挖过一次的地方。

他们又在阿尔巴尼亚公路上度过了十月。天气突然变坏了，远方的地平线上和公路的尽头，又重新被隆隆的雷声所笼罩。

这种在异国土地上乏味的跋涉，比他们原来预想的延长了好多。夏天，在第二次出发来阿尔巴尼亚之前，将军在自己国家组织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对完成这一使命还需要多少时间一事，记者们提出了许多令人讨厌的问题。他对记者的回答简明扼要，干净利落。有几回他公然发了火，还有几回，语调里流露出轻蔑的味道，好像要对他们说："喂，漂亮的小伙子，你们也来试一次，也干一干我干的工作嘛。"

将军常常总是觉得，他的生活现在就跟异国的许许多多湿漉漉的无边无际的十字路口一样。走在这些公路上，他越来越回想起那些

冗长无聊的谈话和嘱托。他把这一切，他的思想，都描绘成一种低俗的、单调的、非常单调的东西。它们好像一种斜体字，似乎字母都受到了一种东西的打击，所有字母全都头朝地地倒下了。

第十七章

一般说来，我们若不是依着大桥的铁栏杆吸烟，就是待在小木板房里，白天就是这么打发掉了。小木板房的主人，在门口用斜体字写上了“咖啡——汽水”几个字。我们是六个护桥兵。这是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人建筑的，已经好久都没有人经管了。我们是在道路和桥修好后最初的日子里来到这里的。修桥的军人给我们建了一个碉堡和一个小营房。这么一来，我们可就是一切都具备了。我们把重机枪架在碉堡里，随时备用的轻机枪放在营房里。

周围荒凉而凄怆，放眼一望，到处是光秃秃的一片，有的只是一些小石头。有些地方，偶尔能看到一棵树。村子小得很，连十户人家都没有。这些人家的房屋，全是一些怪里怪气的石头建筑。小小的窄窄的洞孔，取代了窗户；这些小洞孔跟我们的碉堡的洞眼差不多。

开头，我们烦闷极了。很少有军车通过，农民与我们交往，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白天，我们整日绕着桥栏杆转悠，往小河里扔石头玩；夜里出来站岗放哨。

可是，有一天，顺着山间公路，来了一个人。他赶着三头驮着木板、箱子和油毡纸的骡子。他是一个来自城里的买卖人。

两天之内就在桥跟前建起了一个木板房，在房门口用黑漆写上了这样几个字："咖啡——汽水。"

从那天起，我们就成了他的正规的买主。尽管门口写的是咖啡和汽水，可是实际上，他还卖白酒和质地不好的葡萄酒。不时地有军人乘汽车从那里路过，他们在木板房前停下来，喝上一杯。木板房好像把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一下子给活跃起来了。有时农民们也到这儿来喝咖啡或者喝一点别的什么。他们对这位买卖人卖的白酒不感兴趣，至于葡萄酒，就更不喜欢了。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到这儿来，是为了用他们的鸡蛋换子弹。我们曾严厉地禁止这件事，可是，大家还是照样地干。夜里放哨的时候，我们常常空放一梭子子弹，第二天就说，我们耗费了双倍的子弹。我们用搁起来的子弹换鸡蛋吃。

可是，夜里放的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却闯下了大祸。看样子，大祸是我们自己招来的。过了一些时候，游击队员们果然开始跟我们捣乱了。假如没有碉堡的话，他们会立刻就把我们清除掉。

第一个人是夜里放哨的时候在桥上死的。很显然，游击队员们试图将桥摧毁，但是，未能成功，因为他发了警报。清晨，我们见到他已经死了，是在桥栏杆前面死的。他张着嘴，死的姿势很怪。您看过《赛车人之死》那部电影吗？我看那部片子时，差点在大厅里叫起来。他的死很像那部电影里的情景。

两周以后，又死了第二个人。情况几乎是一样的。我们怀疑是农民向他开的枪，不过，对此我们并没有把握。现在，我们再也不给他们子弹了。可这又有什么用？已经晚了。

当第三个人被打死的时候，便作出决定：站岗放哨的人不要到桥上去。上面又运来一批军人，替换死亡的哨兵。同这些军人一起运来的还有一个探照灯，大家把它安在了碉堡里。这会儿，夜里大桥不时地被碉堡照得一片通明。在探照灯的光照下，

大桥显得很恐怖，预示着将有一种不好的事情发生。它由成百上千块黑黑的纵横交叉在一起的铁件组成，像一条可怕的蜈蚣一样。有时深更半夜，在冰冷的白白的灯光照耀下，我望望它，悄悄地对自己说，这座桥要把我们所有人的脑袋逐个地全吃掉。

游击队员们没有离开这座桥。

第四个军人是在我受伤的那天夜里死掉的。我记不起任何事情，因为在一开始的几秒钟里，子弹就把我打中了。我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人们把我放在了骡子的后背上，那头骡子慢慢地行走在大桥上。桥上的木板在骡子的蹄子下面发出奇怪的响声。那是一个早晨，一个冬天里灰蒙蒙的早晨。我目光麻木地望着桥上无数个铁螺丝帽。那些螺丝帽从我眼前一晃而过，我觉得有一点沉重的冰冷的东西紧箍着我的心脏，死死地锁住我的性命，怎么也不放开我。

当骡子下了桥，走在公路上的时候，我费劲地转过头，最后一次看了看桥、碉堡、坐落在高山平地上的阴郁的农家房屋、桥墩旁边伙伴们的坟墓（他们尚未开始挖新墓），以及附近的木板房。房子上写有叫人瞧不起的“咖啡——汽水”几个字。

将军坐在一块钢筋水泥上吸烟，工人们在下边，在桥墩旁，在四处乱丢的碎板块附近挖找尸骨；那些碎板块与生了锈、七扭八歪的烂铁混杂在一起。新桥梁建在下边几百米远的地方，靠着炼油厂。新筑成的公路从那儿经过。在原来旧的山间公路上面，长出了灌木丛，不少地方还长出了野草。

爆炸应当是很可怕的，他思忖着。桥梁从正中间被炸断，一大块一大块沉重的钢筋混凝土，飞到碉堡近侧，甚至还飞到更远的被废掉了的公路上面。桥旁边建起了一个旧木板房，房门口迄今依然还能看出原来写上去的“咖啡——汽水”几个字。

一个星期之前，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犹如桥梁、碉堡和一部分

公路一样，木板房也成了半个残废。遮盖房顶的油毡纸已经变得千疮百孔，许多块木头也松动或腐烂了。可是两天以后，从小镇里来了一个地方社会食品公司的流动售货员，他带来了香烟、白兰地酒和一个烧咖啡用的电炉。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除了五名长期工以外，又雇了另外七名临时工。这些男子汉同司机、专家、神甫和将军一起，要在这里生活漫长而辛苦的两个星期。售货员在旧木板房落了脚，将几块木头在两三个地方固定好，又在油毡纸上放了一些石头，以防被风吹起来刮走。

木板房使这点地方活跃起来了。每天早晨，工人们在开始干活之前，总到这儿喝咖啡或者来上一杯酒。农民们整天在那儿转悠，观看工人们挖找尸骨，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这当儿，将军看到农民当中的两个人用手指着桥墩附近的一个地方，对上了年纪的老工人讲一点什么事情。

他们当中是谁向我们哨兵开了枪？每次当农民们在工人们脚前脚后转来转去，或者到木板房买香烟的时候，将军就这样想。他们已经在这儿待了一星期，现在，他已能认出他们当中几个人的面孔。

挖找尸骨的工作在桥那边和桥墩附近进行。桥墩附近只葬了哨兵，多数坟墓都在公路旁。那会儿他们一个挨一个排成队，待在被烧毁的汽车车架子旁边。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打阻击战、拦阻成队的汽车的地方。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毁掉桥梁之前。

神甫和专家向路旁的斜坡上爬去，专家回到了木板房里，神甫朝跟前走过来。

“喂，怎么样?”将军问道。

“很正规。”

“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能报道吗?”

“完全能。”

“后天我们应当开始到路那边挖。”

山口弥漫着一片大雾。

“天气真糟糕。”将军说道。

神甫点了点头。

“阿尔巴尼亚人有句谚语。”神甫说，“‘天气变坏找好友，美妙前程随你走。’”

“在这种时刻，我们得不到什么。”将军说，“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给我们开门。”

神甫咳嗽了几声。

“这一两天我嗓子有点疼。”

“真是叫人心烦，一切都这么潮湿。”

“应该拿点褐藻胶来。”

“如果今冬情况还跟去年冬天一样，事情可就难办了。”

“事情就应该那样干。”神甫说。

“我们在这儿已经一年多了。我觉得好像我们要待上一辈子。”

“现在主要活计我们已经干完了，多数工程已就绪，剩下未完成的只是少量的了。”

“这个工程拖的时间越长，就越叫人无法忍耐。”

“我们太累了。”

“更多的费劲的活计还在前头呢。”

“可不管怎么说，多数工程已经结束了。”“如果在夏天里，我们把需要登山的工程干完，那我们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那么这三个月里先干点啥?”

“我们连家都没回过，哪儿都没去。”

“是这样，我们搁浅在这儿了。”

“延期使一切预想全吹了。我们相信，春末以前我们会结束的，最晚也过不了仲夏。”

“我们是没有过错的。”

“根据已知的情况，‘闪电战’可能有，‘闪电寻找尸骨’却是没有的事。”

“战争越是具有‘闪电般的速度’，未来挖坟寻找尸骨的时间就拖得越长。”

“把我们给拴在这个见鬼的桥上了，简直无法离开。这里的景色我受不了。”

“我不理解游击队员为什么要那么卖力气，直至把桥摧毁。”神甫说。

“这座桥梁是一个好圈套，曾为游击队员帮过忙。因为假如没有这座桥，成队的军车就不会路过这里，那样一来，游击队员们也就不可能打阻击战了。”

“那么说，坟的数量要大两倍，我们在这儿就不是要呆两个星期，而是四个星期喽。幸好情况不是这样。这里的风光，这些农民叫我受不了；他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转来转去，观光赏景，看我们怎么样把死者挖出来。”

“他们到处打圈圈。”神甫说，“很显然，这事让他们挺高兴。”

“当年他们跟护桥的哨兵混熟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邻居，用鸡蛋换过子弹。他们当中肯定有人向我们的哨兵开过枪。现在，当然很有兴趣到这儿看挖找尸骨了。”

“他们到这儿转悠，好像要在公用局工人和司机面前，为杀死哨兵而大显威风。”神甫说，“有个留着浓密的八字胡的老头儿，腰上别个手枪，脸色沉沉的，每天早晨都来到这儿，在工人中间转悠。您看见这个老头儿了吗?”

将军搐动一下面颊。

“您说的是那个胸前戴着两三枚勋章，走起路来趾高气扬的老头儿吗?”

“是的。”

“我看见了。专家告诉我，战时他失去了一个儿子。”

“是这样?”

“他的年岁已经很大了。刚一听到我们来到此地的消息，就把

勋章挂到胸前，把手枪别在腰上，到外面四处晃悠，现在他每天都这么干。”

“甚至他目视阿尔巴尼亚工人时，也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自负感。”神甫说，“前天专家向他打听一点事，可他却不回答。”

“这是一个很狂妄的老头儿。很清楚，他觉得专家和工人也是我们的盟友。”

“到这儿来闲逛的还有另外一些人。”神甫说。

“这事太叫我恼火了。”将军说，“特别是这个老头儿竟把上一个世纪的手枪别在腰上，这就更叫我心里起火。”

神甫又咳嗽了几声。

“我知道，”将军用一种更为亲密的语调说道，“人应该把每一件事都提前估计到。这类精神病患者真叫我害怕。他一发火，掏出手枪，中午时朝我射击怎办？”

“凡事都有风险。”神甫说，“跟像他这种心肠坏了一半的人打交道，什么事情你都会碰上，应该当心才是。”

从远处的山口，又开始传来隆隆的雷声。

将军点着一支烟。

“这些农民对挖墓寻找尸骨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多少我还是理解的。”他说，“在我们出发来这里之前，一个从前在这座桥上当过哨兵的军人，对我讲过一点事情。刚才我坐在这儿的时候，大概是第十次想起了他的话。”

“是我们让他们回忆起了战争年代。”

“这是自然的。战争期间，这个小村庄的命运，是与桥连在一起的。对他们来说，桥是一种厄运。它被炸毁以后，我们的复仇主义者，在这儿进行了一场血腥大屠杀。如果没有这座桥，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的生活，就会平平安安，它就会躲过战争的骚扰。可是，桥建成了，并且发生了这一切事情。而现在，突然间我们来了，寻找护桥哨兵和其他军人的尸骨。这件事使他们又回忆起往事，不能安安静静

地呆下去了。他们四处转悠，在木板房里买烟抽。也许木板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复活那些岁月的气氛，因为被扔掉二十年以后，我们一到这里，它又开门营业了。”

“这可真有意思。”神甫说，“这个我不知道。”

工人们收工时，吃午饭的时间到了。专家同公用局的老工人谈了一会儿，然后走到跟前来。

“两座墓是水泥板封盖的。”他说。

“那我们怎么干?”

“应当用炸药。”

“那好，就用炸药吧。可我们带来炸药没有?”

“没有。明天我们到小镇上搞点。”

他们吃午饭去了。

午后，下起牛毛细雨。工人们站在冷飕飕的灌满了烟雾的木板房下边看下雨。

第十八章

晚上，老工人病了。这天下午他就开始觉得不好，但没有重视。傍晚时脸色发黄，要躺下休息。大家都以为他是着凉感冒了。将他送到一个农民家里，生起一大堆火，把他放在了壁炉旁边。可是，夜里他的病情更重了。

当有人到将军和神甫睡觉的帐篷前边敲门时，天还没亮。将军是第一个醒的。

“有人敲门。”将军说。

神甫起来，掀开雨布，原来是专家敲门。

“早晨好！”专家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没关系。情况怎么样？”

“我想问问，你们的车是否有空儿。我相信今天你们不想下山进城吧？”

“不想去，可您问这个干么？”

“领班的老工人病得很厉害，需要赶紧把他送到最近的城里去。”

神甫把专家的话译给将军听。

“让他们使车好啦。”将军说。

“谢谢。”

专家准备走开。

“他会怎么样？”神甫问道，“昨天下午他就显得不太好。”

“不晓得。”专家说。

“会不会是着凉感冒了?”

“我怀疑他是感染中毒了。”专家说，“左手有一块轻微的伤。”

“感染中毒?”将军吃惊地抬起头来。

专家从帐篷里走了出去。

“他会怎样？能是什么病?”将军再次问道。

“我也怀疑他是感染中毒了。”神甫说，“昨晚那脸色就像烂泥的颜色一样。”

“怎么能感染中毒呢?”

“有可能是军大衣上某个生锈的纽扣，或者是某块碎骨头引起的。昨天挖了许多墓。”

“可他是一名蛮有经验的工人啊！他还教别人如何挖墓呢。”

“他发现不了。”神甫说，“可能是手上沾了烂泥，所以没注意到伤口。”

“若是昨天晚上把他送走就好了。”

有一段路很糟糕，不好走，老早就废掉没人管了。即使白天行走，也不那么容易。

“不管怎么说，也得把他送去。”

“今天他们就会到达。我不相信会是一件危险的事。现在有的是防毒办法和防毒药品。”

将军再次用毡子把身体裹好。

“外面天气怎么样?”将军问道。

“阴沉沉的。”神甫说。

他们走出帐篷的时候，几名工人已经开工了。他们在碎了的钢筋水泥板块上凿眼放炸药。其他人站在木板房前面喝咖啡。这是一个星期日，但是，这儿显不出星期日的气氛。

“没专家在这儿，会使我们的工程进展缓慢。”神甫说，“工人们不知道从哪儿挖”。

“大概今天晚上他就会回来，最迟也过不了明天早晨。”

“在专家回来以前，他们最好就别干了。”神甫说，“我怕会再出别的乱子。”

“您认为别的骨骼也会有毒，感染人?”

“为什么不会？在自动化部队里可能有许多带毒的军人。”

“也许是应当往挖开的坑里撒些石灰才对。”将军说。

“我们应该问问专家，这些事情他懂。”

他们来到木板房前，要了咖啡。

“细菌在地下隐藏了二十年，突然间就会泛滥开，真是怪事。”将军说。

“就是这样。”神甫说，“细菌与空气和阳光一接触，就会繁衍起来。”

“如同野兽从冬眠中醒来一样。”

神甫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

“我觉得下午我们会碰上雨。”

“这天儿可真叫人发烦。”将军说。

确实不假，这日子真令人生厌。整整一上午。他们直打转转，不晓得干点什么才好。午后又下起雨来了。

“如果出事儿的话，我们应该付给他家里报酬。”将军说道。

“付给终身养老金?”

“对，协议里是这么写的。”

第二天早晨，专家回来了。卡车司机第一个看见了吃力地攀登在山间公路上的小轿车。

“他们来了，回来了。”卡车司机喊道。

因为下雨而钻进木板房里的将军、神甫和工人们，闻声立刻从里面走了出来。

在远处的公路上，草绿色的小轿车，躲过路当中的一堆石头，慢慢地向上攀登着。

“他会好的。”有人说。

当小轿车朝跟前又走近一点的时候，他们看到整个车上全被烂泥巴喷脏了；它一停下，卡车司机就惊诧地喊：

“挡土板怎么歪了！”

专家是第一个下车的。他脸色憔悴发黄，眼神疲倦而发呆。先向外伸出一条腿，然后伸出另一条，冷漠地朝四周环视了一眼，露出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

“喂，出什么事了？”沉寂中一个人问道。

专家向他转过头去，好像对他的发问感到奇怪似的。

“死了。”专家慢吞吞地说。

“死了？”

“死了。怎么？不相信吗？”在他之后下车的司机喊道。司机因为睡眠不足，眼睛都熬红了，脸上和手上沾了一块块烂泥。

“什么时候死的？”有人问道。

“半夜里。”

“是一种很严重、很可怕的感染中毒。”专家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地说着。

这群人默不作声地向木板房走去。

“车出事，被撞伤了吗？”卡车司机问道。

“没有。”轿车司机说，“只不过同路上的石头碰触了两三下。整宿没睡。”

“你干得好。”

人们来到木板房前。

“给他俩每人来杯咖啡，没看见他们受多大累，有多狼狈吗？”有人对小卖店售货人喊道。

“你们是否每人再来一杯白兰地？喝点白兰地对您有好处。”

“那就给我们每人再来一杯白兰地吧。”

“老兄，对我们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儿？”

司机举杯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司机对售货人说道，“夜里有多糟糕！我们去时，一路上他一声不响，一会儿冷，一会儿发烧。后来就开始昏迷了。我们对他说，躺下吧，他就在后排车座上躺下了。不过，仍然稳不住神。我把油门加大到最大限度。上帝晓得我们怎么没撞在什么地方落个车毁人亡。莱依兹，你说话呀，感觉怎么样？我们问了他好几回，可是，他不张嘴，只是望着我们，似乎想说：不好，老弟，不好。我们终于到了城里，把他紧急地送到医院里。每半小时我们就进去问问病情。护士们脸上的表情很紧张。其中一个护士对我们说，你们应该早一点把病人送来。我们懂了，事情不妙。我们请求去看病人，可医生们不允许。夜幕降临了，我们从一家咖啡店串到另一家，在旅馆里坐不稳站不牢。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又去了一次医院，想问问病情。医生叫我们立刻进去，这时候，我们很惊奇。情况怎样？我们询问一位护士。不好，挨不到早晨，他说。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们叫我们立刻进去了。他的生命在垂危中，脸色变得发灰，全身不时地发抖，在床上使劲儿挣扎。他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直摇头。然后，两眼死死地盯了一下手上的伤口，似乎在说：这块该死的伤口要了我的命。半夜的时候，他陷入一次严重的危机中。莱依兹，这个怪叫人可怜的老头儿，断气以前，受苦受大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再给我满上一杯，上帝呀！这事儿真是活见鬼了。噢！”

木板房里一片寂静，听得见旧房顶上风儿吹刮一块撕坏了的油毡纸发出的嘶嘶声。

“简直不能叫我相信。”另一个人说，“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不存在了。”

“莱依兹走了，不明不白地走了。”

“他是多好的一个人！”一个人说，“可亲可爱，质朴谦恭。”

“他是个勇士。”

“对，是个勇士。”

“谁去通知他的妻子？”

"噢，搁下这个，先别提这事儿。"

"她这个可怜的女人，不喜欢她丈夫干这个工作，好像她已经觉察到了灾难。她写给丈夫的信中经常问，工人们什么时候挖完这些坟墓呀？莱依兹回答她：再挖几个就完活儿了。"

"可怜的女人。"司机说，"有一次我到地拉那给她捎过一封信，她向我诉了一顿苦。她很担心。战争岁月她等丈夫等了好多年。现在，她觉得丈夫好像又到前方打仗去了。"

"因为在他做的所有的工作当中，这件事直接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他自己常说：只要活着，我就和法西斯分子干到底。现在我又和这些家伙干上了。"

"嘻，他同法西斯分子斗争了许多年，战胜了他们，最后自己受了害，受了法西斯分子的害。噢，这活儿可真见鬼！"

"似乎在他死了以后，他们报了仇。莱依兹用子弹杀了他们；而他们却用一个纽扣从背后杀死了莱依兹。"

"敌人就是敌人，即使死了也还是敌人。"

"就是这样。"

"他们像两只黑乌鸦似的待在那儿，不吭声。"司机声色俱厉地说道，并以仇恨的眼光向神甫和将军那边望了望。神甫和将军披着大块雨布，站在桥梁废墟旁边。"这会儿你们可是心满意足了，嗯？"

"嘘！"有人说道，"别发疯，算了吧！"

"我们要关注这件事，要把莱依兹安葬在烈士陵园。"

"那还用说！今天我们就给地拉那党委会发一份电报。"

"应该先通知他妻子。"

木板房里又是一阵死一般的静，听得见房顶上撕坏了的油毡纸一会儿被风刮起来，一会儿又被风舒展开，发出阵阵的响声。

"是他们把我们的莱依兹杀害了。"一个人声音激动、愤愤不平地说道，"是他们夺走了我们的莱依兹，是他们把我们的人杀害了。"

房顶上，油毡纸发出嘶嘶的叫声。

无章节的一章

“挖到没有？”神甫问道。

“没有。”专家嗓门疲惫地说。他小心地踩在大块大块发红的黏土堆上，向前挪动着脚步。

“奇怪。”神甫说。

“我们在旁边另外两个地方挖，在附近这一带地方应当能挖到。”

将军朝跟前凑了凑，长筒雨靴被黏黏的烂泥染成了红色，往土上一踩，很难拔出脚来。

“嗯？”他问道。

“什么也没找到。”专家说，“我们算挖不到了。”

“我们被迫放弃这块地方。”将军说，“这个军人是个什么军衔？”

“上尉军衔。”

“不知道这个受了伤的上尉从这儿爬到哪里去了。”

“有可能爬走了。”专家说。

稀疏的雨点落到堆在坟坑两边发红的黏泥上，仿佛是在地平线上挂起了红色的窗帘，这窗帘向地面投下了红色的、令人腻烦的折光。

“我们挖到了。”突然，远处的一个工人喊道。

专家赶忙迈快脚步，向挖开的坟坑奔去；为了防止滑倒，他走得很小心。神甫跟在他后边。

他们绕着挖开的坟坑转悠了好长时间，最后，神甫的脸上带着一副烦躁的神情回来了。

“我们白白地费力气。”他音调倦怠地说道，“折腾了半天，挖出的尸骨不是我们军队的。”

“是谁的？”将军问道。

“专家说可能是英国飞行员的。”

专家来到跟前。

“我们白费劲儿了。”他说。

“那我们干什么呢？”靠拢到跟前来的工人当中有人问道。

“我们走吧。”将军说，“在这儿我们没什么好干的。”

“对这个英国人我们怎么办？”一位老工人问道。

“再把他埋起来。”神甫说，“你别无选择。”

“这个英国人的事儿，不归我们管。”将军说，“应当把他再重新埋起来。”

专家向坟坑那边望了一眼。

“你们再把他埋上。”专家对工人们说。

两名工人把骨头棒子扔进坟坑里，开始填土埋坑；而一队人则走开了。当将军第一次回头望的时候，两名填土的工人还在干着，从远处看得到铁锹正不时地扬起来、落下去。稍过片刻，将军再次回头看时，显然他们已经干完了。他们肩上扛着铁锹，正从小丘上走下来；迅速埋好的坟再也看不见了。

“我们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将军说，“完全是浪费，白干。”

无章节的一章

从前有一个将军和一个神甫，他们为了寻求好命运到外面去了。不，他们到外面去不是为了寻求好命运。他们出去，是为了搜寻在一次大战中他们那些阵亡的军人的遗骨。他们走啊，走啊，跨过了许多山岭和平原，挖找、搜集这些遗骨。这个国家险峻、可怕，经常刮风，没完没了地下雨。可是，他们没半途而废，而是继续向远处走下去了。他们搜集啊，搜集啊，回来数点搜集到的遗骨，结果发现还缺很多很多。于是他们又套上雨靴，披上雨衣，重新出发上了路。他们走啊，走啊，跨过了许多山岭和平原。天气恶劣，坏极了。他们累得筋疲力尽，这一工作打击了他们的心。不论是风，还是雨，都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所要寻找的军人在什么地方。他们搜集啊，搜集啊，又回去数点搜集到的那些遗骨。数完以后发现，仍然还有很多军人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又疲惫不堪地出发，登上了大道。他们走啊。走啊，实在是永远也走不完啊。时逢冬天，正下着雪。

“那么熊呢?”

“于是熊在他们面前出现了。”

一般说来，将军几乎每天晚上对自己重复，并且一回到家里就想对他的一个孙女讲述的童话，总是以孙女“那么熊呢?”的发问而结束。小孙女听童话时，常常提出这个问题。

第十九章

第十天，他们终于开始下山了。现在，公路越来越加向下伸延，把群山的峰巅留在自己的上边。

这是最后的一轮工程，干起来也最为艰巨。地方很遥远，山上还不停地下雪。一连十天，透过车窗，将军望到的总是路旁漫长的无聊景象。远远近近，在树木覆盖的陡峭的山坡后面，一座座很小的披着银白色雪装的村庄，在眼前时隐时现。

在四周坦平的地平线中间，群山高高地、冷冰冰地、悲壮地耸入天际。在远远近近的山口里和光秃秃的山间平地上，一队队青年男女处处可见；他们正在开垦新土地和修整梯田。长长的梯田绵延不断，在山坡上形成鳞次栉比的景观，仿佛是一条条没头没尾的堑壕展现在面前。那白雪时而一片片存留在原野里，时而又开始消失，只剩下星星点点的残迹；这是一种干雪，一种冷漠无情的雪。夜间，他们睡在村子里。白天干活。

在一次重大的冬季行动中，阿尔卑斯山人碰见过死人的事儿，这里有许多当地人的坟墓。

这是一种最为艰苦的地理环境。大雪把坟墓全覆盖了，凭地形测绘图，很难确认坟墓的方位。看样子，这雪不愿意让他们把自己掩埋的那些死者取走。她以一种美丽、洁白、祥和的面容，把那些死者掩

藏起来。当镐头和铁锹忙活起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丑陋不堪，美丽的面容也变得难看；它遭到了破坏，仿佛裂开了一块块伤疤。在新雪降下来之前，一切就以这个样子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公路犹如蛇一般，弯弯曲曲地缠绕在这一带地方；它也好像一条乱了套的绳子，搞不清里面哪是头，哪是尾。小轿车开在前面，蒙着雨布的卡车跟在后头。雨布上面落了雪，显得挺白。他觉得大家正走在一天前已经走过的道路上。除了这条窄窄的山间公路之外，再也没有别路可走。它无情地叫他兜圈子，打转转，不让他搞清楚东西南北，使他弄不清楚到了什么地方。现在，正是当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却突然觉得永远也无法从这些山岭当中走出去了。

在转弯的地方，再一次现出那些带有窄窄的窗户的堡垒。那些窄窗户是用来射击的。有的是垂直的，有的是平行的，好似张开的嘴，时而显得奇特，时而又显得扭曲、变了形。将军注视着他们那种僵硬的表情，再一次感到永远也无法从这种坚如磐石的讽刺中逃脱出来了。

载着大木箱子的卡车，继续循规蹈矩地开在小轿车的后面；在这些大木箱子里装着上百个盛满遗骨的尼龙袋子。裹着皮大衣的公用局工人，坐在木箱子上抽烟。自从最年长的工人死了以后，他们再也不唱歌了。

将军回忆起他这一生中见过的成千上万辆军用卡车。他看见过军人们一排排地坐在卡车上，胡子贴着枪筒，不停地颠簸。现在，他又看见上百个军人坐到一辆卡车上，而且又东摇西晃地颠簸起来。只不过就是现在弄不清哪里是胡子，哪里是手罢了。

将军的思绪老是围绕在一点上兜圈子，就像这盘山公路一样，绕着山转啊，转啊，成了群山的牛鞅子；这种群山的牛鞅子，恰似找不到线头的一球线团。

自从他们看见雕像那一天起，神甫便又变得沉默寡言，表情忧悒。那天早晨，当他在梦中惊恐失色地喊起来的时候，他的脸上就挂着这样一副愁眉不展、阴云密布的惨相。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他们是三天以前在两条公路的交叉道口上看到雕像的。雕像突然间在路上出现了，好像一个人站在路边上，等着拦阻一辆车，把它抢为己有。将军回头要把雕像指给神甫看，发现神甫早已把眼睛瞪得溜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神甫受到这么大的震动。他的两只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雕像，脸色全黄了。

“您怎么这个样子？”将军问他。

神甫没有回答。小轿车迅速地转了个弯，因为落了雪变得白白的雕像，显得近极了；它从车窗旁边一闪而去，甩在后边公路的交叉口处。

后来，将军向神甫问过雕像的事情，可是，神甫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说当时他的头给弄晕了。

在这以后，他们俩有很长时间一直没讲话。

一天以前，工人们挖开了最后一座坟墓。土冻得梆梆硬，镐头很难刨下去，那冻土似乎至少要把最后一个军人留下。工人们不停地往手上哈气，在雪地上跺脚。将军两手揣在胸前，看挖墓工人如何干活儿，心里琢磨着，这些工人如何把整个军队从地下挖了出来。然后，好似最后一声枪响，最后一把镐当啷地响了一声撂下了。阿尔巴尼亚专家喊道：“正好是一米六十。”

有许多次，将军一边目视公用局工人挖土刨坟，一边在心里描摹这一工程相反的进程。特别是在黄昏时分，当工人们如同倒影一般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他就闭上倦怠的眼睛，觉得好像并不是他们五个人在挖土，而是他们国家的军人在干这一差使。二十年前，有一次正是那些陌生的军人，干过一件埋葬他们的同事的事情。他闭上眼睛，想象着这一工作当时是怎么进行的；那时候，这种事更多的是夜间在手持刺刀和匕首的情况下干的。

但是，这是第十天，他们正在下山，他再也不去为发生的那些事伤脑筋了。对山岭的包围，这会儿就要结束，干硬的雪开始被湿漉漉的雪所代替。在下边的山谷里，雨水作为老相识肯定正在等着他们。

很快他就要回到祖国去。遗骨的事儿将由别人来管，负责到底，

他的这一轮工作就要结束了。然后，公用局的代表和两国的财会人员，将坐在桌边结账。另外，还将核算别的一些混乱不清的账目，在收据、凭证上签字。最后还要草拟决算议定书。然后，还要举行一个小型的由双方代表参加的宴会；宴会上，双方还要作简短的正式讲话。宴会结束后，还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悼念军人魂灵的仪式，各家通讯社将发布有关完成这一使命的新闻。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还要再次面对成百上千名讨厌的记者发表讲话。

与此同时，素不相识的木匠，还要按照契约书上规定的尺码，做好成千上万个小棺材，别的人将往每口棺材里放一尼龙口袋骨头。所有的师、团、营、连，都要混杂在这一大堆棺材里。然后，要把所有这些棺材装到一艘大轮船上；为了把这支伟大的、如今已经变成了几吨重的磷和钙的军队整个地运回祖国，轮船将载着重载，沉甸甸地出发呢。

将把在阿尔巴尼亚四面八方寻找到的这一堆东西全都装到轮船上。轮船回到祖国以后，将重新把这些遗骨分送到各个地方去；这些军人当年就是这些地方抽调出来，送到阿尔巴尼亚打仗的。要把所有人的骨头全都装上船，然后再从船上卸下来。这些人当中，还包括这样一些宝贝：两名身挎步枪坠下来的飞行员；四百名未能越过山口，就被游击队员的机枪扫射阵亡的军人；在一个山涧河谷里，自相射击而丧命的十八个军人；五十名在军营里自相残杀，剁成肉块的军人；一个营与骡子一起送死的全体官兵，这些人的尸骨竟与牲口鞍子、笼头、缰绳等一整套东西和枪支掺和在一起；那些认不出姓和名、被陌生的阿尔巴尼亚人杀死的军人；另外还有那个年轻的卖淫者。她是所有军人当中唯一的女人，白去了一次阿尔巴尼亚（虽然她也简单地被当做“一名军人”，但没有意义，因为归根到底，解剖学家还是能从骨骼上搞清楚，死者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

那些尚未找到的军人，将留在阿尔巴尼亚。也许以后会有另外一个专家小组到这儿来，再次开始寻找。以 Z 上校为首、约二百人丢失

了。新的专家小组将再次走上这条讨厌的毫无尽头的道路，直到一个一个把他们全部找到为止。率领专家小组的军官，对他将会有怎样的想法？（这个军官不会是将军，因为不可能仅仅为了二百人派出一名将军。）

公路愈来愈向山下伸延，像蛇一般蜿蜒起伏，围着群山众岭兜起牛鞅子弯，如同它向山上攀登一样。公路的弯子兜得越来越大。最后，将军感到一切的一切都结上了死疙瘩，解不开，斩不断，于是心里平静下来了。

他们下山时，将军不时地回头往外张望。群山越来越远离了他们，轮廓变得更加抽象起来，挑衅性的意味减少了。将军以这样一种姿态向上瞭望，似乎在对群山峻岭说："现在，你们的压力结束了，我可算是离开你们了，可离开你们了。"后来坐在车里打瞌睡的时候，猛然间，糊里糊涂地吓了一跳。他觉得千山万壑好像伸出了它们那冷冰冰的手，让他再重新回到它们的大嘴里去；那里大风呼呼地吼叫着，就像在地狱里咆哮一样。

但是，他永远也不想回到那里去了。

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一个很大的村庄里。十天来将军第一次嘴角上露出了笑容。工程最后总算结束了。那天晚上，他们将在那里过夜，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要去地拉那，再过几天，还要回到祖国去呢。将军的情绪蛮不坏。一股欢快的温暖的波涛，正竭力地捕捉着他的心，虽然这种波涛还不是那么奔腾激荡。

村里还没有张灯。小轿车从村子中间泥泞的道路上跑过去，后边跟着一群孩子。在农业社俱乐部前面，司机从前门探出头来，打听农业社领导部门在哪里。孩子们吵吵嚷嚷地给他指路，说话间，一些孩子跑到前面，更准确地告诉他农业社领导部门在什么地方；而另外那些孩子则跟在后边。这时候，小轿车便慢慢地行驶在孩子们中间。这些小家伙闹哄哄地叫喊着，声音又尖又细。

欢快的波涛变得更加热烈了。

通过车窗，将军凝望着轿车前边迅速活动的小脚；回过头再往后望，看见了另外一些孩子正尾随汽车朝前走，于是他笑了。孩子们总是对他感兴趣，而神甫却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将军对此感到很高兴，虽然他晓得全部事情就在于他穿了一身军装。

这种妄自尊大、耀武扬威的感情，还在向别处蔓延，他竭力把头抬得高高的。

喧闹的队伍，一走到村子的正中心，就在农业社领导部门的房屋前面停下了。司机和专家跑步登上房子的台阶。一分钟以后，卡车停在了小轿车的后头，公用局的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不过，卡车对孩子们并没有很大吸引力。他们把头靠近小轿车的窗口，极力要认出留在车里边的两个人是什么人。看上去，这两个人，坐在黑洞洞的座位上一动也没动。其中的一个人在抽烟。烟是孩子们从外边唯一能辨认出来的东西，但这一点东西太少，所以他们便围着轿车团团转。那一张张好奇多怪的小脸，不时地贴到车窗的玻璃上。

“Z 上校应当是在这个村子里失踪的。”神甫说。

“有可能。”将军冷淡地说。

“对这个我们应当问问。”神甫说，“应该干点什么。”

将军一连吸了两三口烟。

“跟你讲真的，今天晚上，对寻找 Z 上校这件事我不感兴趣。”将军慢条斯理地说，“总的来说，今天晚上寻找任何事情都不能叫我感兴趣，我对自己这样说。光荣属于上帝，这一崇高的事业终于结束了，然而，您又把我给搅乱了。”

“这是我们的任务啊。”神甫说。

“知道，我知道这个，可我这会儿再也没有兴趣去考虑它。今天晚上是伟大的一夜，我对您感到奇怪。对我们来说，今宵就是节日。现在，我想安静安静，洗个热水澡。告诉您，这个才是今晚我主要关心的事情。帝国的一半大业是为了洗个澡。”他笑着补充说。

将军的情绪蛮好，兴致勃勃的。这全部的沉重的恰似一种急不可

耐的痛苦的跋涉，终于结束了。这不是一种跋涉，这是在死亡的茫茫的黑暗中的一次远征。正如一首古老的瑞士歌曲所唱的："我们的生命是在冬季、在黑夜里的一次旅行。"

将军心花怒放，摩拳擦掌。

现在，他得救了，现在，他可以从远处冷漠地目视陡峭而暴躁的千山万壑了。

"如同一只悲剧性的、孤独的鸟……"他记不清原先那位伟大的太太送行时对他讲的这句话的准确说法了。

专家从农业社领导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你们就在这所房子里睡。"专家挥手指着一所带凉台的房子说。

十分钟以后，将军走到小小的凉台上，依在木栏杆的旁侧。在房间里，神甫从手提箱里取出一点东西。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有院子，从凉台上可以看到一部分村庄。将军在倾听着附近井台上担水的妇女的讲话声和水桶的咣当声，离群的牛发出的哞哞的叫声，刚打开的收音机的广播，以及在空地上跑跑跳跳的孩子们再次发出的喧闹声。这会儿灯已亮起来了，控制中心发出单调沉闷的嗡嗡声。

将军如果也闻到了阿尔巴尼亚这些村庄富有特色的香风甜气的话，此轮公差的这一夜，也将像所有其他的夜晚一样地过去，不会留下任何值得记忆在心的东西。这一香风甜气是淡淡的，几乎抓不到摸不到，可是假如他现在很好地将它记在心里，并且把它从许多香味中辨别出来，那么，这一夜，就会跟其他的夜晚具有相同的意义。现在，神甫出去询问有关Z上校的事情去了，而将军却靠在凉台上，凝望着接二连三地到井台上担水的妇女们。虽然在远处，在村子的当中，突然开始传出鼓声和琴声；声音响彻在住着一个新的漂亮的先生的村庄的夜空，但每件事情都能正常进行才好。

将军是熟悉婚礼的鼓声的。时间若不是秋末，将军将会感到，这鼓声是一种非同小可的悲哀。可是，时间正是秋末。他在书中读过有关阿尔巴尼亚的风俗，书中说，阿尔巴尼亚农民通常都是在秋

天，在秋收完毕，五谷归仓的时候举行婚礼。现在是他们在阿尔巴尼亚农村逗留的第二年了，恰好处在操办婚礼的季节。这时候，冬天临近了，人们正在操办最后一拨婚礼；这些婚礼都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才推迟至今的。而在几轮工程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天天夜里都有婚礼举行。

夜里将军常常有意思地去聆听这种在远处、在秋雨声中咚咚作响的鼓声和琴声。那声音时而欢快，时而深沉，如同这一带地方经常敲打和演奏的那样。他把头蒙在毯子里，一边听一边想，人在异国他乡是多么的格格不入。比长在路边的树木还格格不入，虽然它们是树木而不是人。比起圈里的羊、狗和夜里摇着铃铛响的小公牛来，也更为陌生。

这天夜里，尽管举行婚礼，但是，假如将军去想想这一切，另外也听听神甫讲的关于Z上校的事情，听听神甫是如何到俱乐部，与几个农民坐到桌旁；关于他的失踪，这个村的农民又都对他讲了些什么；而且他又是如何地怀疑这一切，那么，这一夜也会像其他的每个夜晚一样地过去了。然而，最后这一夜，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夜晚，将军的心思没放在神甫讲的那些事情上面。将军实在是太开心了。

"现在，讲的这些够了。"将军第三次对神甫说，"就这些我已经够了！现在我需要休息一会儿，需要稍微快活一下。对不?"

神甫没有回答。

"今天晚上是美妙的一夜。听点音乐，喝上一点白兰地……"

"你想到哪儿去?"神甫说，"这里除了农业社的俱乐部，任何娱乐场所都没有。俱乐部是个什么样子，您是了解的。"

神甫的话，将军没有听完。他提出了一点建议；这建议叫神甫大为惊讶，说什么也没有同意。这是神甫第一次对将军作出的非常坚决的反抗。但将军却以粗暴的方式回敬了他，让他懂得将军我才是主角儿，如果需要的话，将军我还可以对神甫你下命令。

"我们为我们肩负的使命感到自豪，你说对吗？这种事您重复干

了好多次。今晚我们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使命。我想快活快活，高兴高兴。想听听音乐，到剧院看看演出。您对我讲过，他们的婚礼如同演戏一样，对吧？不然您就只是跟我说过葬礼仪式？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今晚我想快活快活。如果有葬礼仪式的话，我们就去参加葬礼仪式好喽。好不好？难道这些乡下人能叫我们丢丑吗？再说，您跟我说过，阿尔巴尼亚人的好客已发展成为怪癖。所以事情不管怎么样，也不存在他们惩罚我们的危险。”

没等神甫回答，将军就穿上大衣，第一个走了出去。

神甫跟在将军后头，也出去了。

第二十章

婚礼正在村子中心的一户人家里举行，将军和神甫老远就看见了明亮的灯光；灯光下，那雨下得好像更大了。天气虽然不好，但这户人家的门却敞开着。在房子宽宽的廊檐下边，有不少人。人们进进出出，在通往这户人家的窄窄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笑语喧哗，声音嘈杂，气氛十分活跃。将军和神甫都披着黑雨衣，一声不响地朝前走，从街上传来他们的脚步声。将军的脚步迈得大，声音沉重，他旁若无人，大大咧咧地在水坑中间走着。而神甫的脚步却很轻，并且走得最快。

在两扇大门前边，他们停下来，站了一会儿。房子的廊檐下边，有几个小伙子和姑娘。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吸着烟，嗓门不高地交谈着。然后，他们向里边走去，将军是第一个进去的。在门灯的映照下，将军的黑雨衣霎时间闪起亮光，在他的后背上照射出一点模模糊糊、抽象莫测的东西。神甫是跟在他后边进去的。走廊里有许多女人和吵吵嚷嚷的小孩子。鼓声停了下来，屋里边传出男人们的声音。走廊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嘁嘁喳喳的场面：有人通知了一点事情，于是，一位上了年岁的男子，满脸带着惊奇的表情，走到他们面前。他

手贴心坎，向他们问了好[1]，帮助他们脱掉雨衣，然后又将雨衣挂在农民们的毡斗篷旁边。当他们在户主陪同下，走进宽敞的大屋子的时候，大家都动了起来，交头接耳，喊喊喳喳，伸长了脖子看他们俩，仿佛像一个遍地生长着灌木丛和五颜六色的鲜花的小树林，在一阵疾风吹拂下，顿时东摇西摆地活跃起来。

将军没估计到，这一场面会给他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他晕头晕脑，慌张极了，以至于一开始走进去的时候，除了一团动来动去、充满勃勃生机的颜色之外，什么都没看清楚，仿佛有人朝他的眼睛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打得他眼睛直冒金星。

有人领他到桌旁边坐下来，有人接过他的军用大衣。他频频点头，毫无目标地向人们问好，用他们国家的语言嘟嘟囔囔地讲了几句话。

只有当鼓重新敲起，发出咚咚的响声和回声，琴声尖溜溜地四处荡漾，人们再次跳起舞来的时候，他的情绪才开始稳定下来。后来，他觉察到了玻璃酒杯发出的吉祥的响声和身旁有人讲话的声音；这个人用将军本人的语言讲道："举起酒杯来！"他举起杯子饮了酒。他要弄清楚，那个讲话的人要开始给他讲点什么，可是他没有能力把事情弄清楚。他自己也很奇怪，对事情的辨别能力怎么能丧失到这种地步。

现在，他觉得婚礼好像是一个庞大的无形而强有力的肌体，它能够呼吸，能够活动，能够小声说话，能够跳舞，还能使周围的一切充满一股温暖的、令人发醉的、混沌不清的气息。

等到将军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他感到孩子们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不动弹，那眼睛在欢快的沉寂中闪闪发光。他们头碰头、脸对脸地凑在一起，伸出小小的手指头，冲着将军这边指指点点，数着什么东西。也许是在数军装上的金纽扣或者肩章上有几道杠吧。因为后来他们互相议论起来了，还摇晃着小

[1] 这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一种习俗，客人来到家中，主人向客人问好，表示欢迎时，把一只手捂住胸口，贴在心上，并且有时还点点头。

脑瓜。看得出来，他们的想法不尽相同。

也许是出自于他的职业的原因吧，第一个映入他的眼帘的，是一个没戴帽子的军人；此人在人群中串来串去，一会儿在这里冒出头来，一会儿又到那边打个照面。他听说了，原来这个军人是新娘子的哥哥。都是因为他，要等他从部队回来，所以婚礼才推迟到这会儿举行。他跳了几次舞，这会儿正在和姑娘们说说笑笑。他非常年轻，头发黄黄的，眼睛小小的，但表情挺愉快，向周围扫来扫去。

然后，将军把一切全看到了。他看到了那些留着很大的八字胡的老头儿；这些老头儿盘腿坐在坐垫上，四平八稳地交谈着，嘴里叼着他们那长长的烟袋杆儿。他看见了穿着一身白纱长裙的新娘子，她整个形象如同一只美丽的枭。他看见了汗流满面、四处跑来跑去的新郎和一群露着笑容，从这个墙角跑到另一个墙角，到处说着悄悄话的姑娘。好像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笑和说悄悄话，保证奉献欢乐，永不泄露自己承诺的一切之外，她们再也不知道别的事情。他看见了年轻的小伙子们一个劲儿地吸烟，装模作样地假痛苦，看见了脸色发黑，汗流浃背的乐手，以及进进出出、从这个屋子串到另一个屋子、为一些没有头绪的难心事儿而忙碌的全体妇女。最后，还看见了那些身穿黑装，带着饱经风霜、寡言少语的面容的老太婆。这些老太婆眼神激动而痛苦，好像一排苍白无力的圣像。所有这一切，将军都逐一地看到了。

然后，将军开始注视在震颤人心的歌声控制下腿脚作出的灵敏动作和脚掌在地板上发出的节奏和谐的响声；一对对男子的白衣裙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这衣裙实在是太白了，白得像阿尔卑斯山的积雪一样。那里他已经去过了。他还注视着作长篇大论、语无伦次、翻译起来几乎毫无意义的讲话时人们如何举杯敬酒；他也注意地聆听着男人们粗犷的歌声，这歌声让人想起陡峭险峻的高山上夕阳西下的情景。他也注意地听着妇女们唱的那些拖着长音的情歌，这歌声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这些妇女靠着男人们宽大的肩膀，永远谦恭地同他们一

起前进。

将军望着周围的一切，无法去思考任何事情，只是喝酒和不停地微笑，就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是在对谁笑。

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个军队的，因为我从来也不熟悉各种军装。现在来熟悉、掌握这一套更不行，我已经很老了。不过，你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曾经屠杀过我们的那些军队中的一员。你会的是那种征服、侵略别人的万恶手艺，你是把我变成人不人鬼不鬼、变成一个神志不清的老太婆的那些人中的一员。现在，我这个老太婆被害得来参加别人的婚礼，坐在一个角落里，撬动嘴唇，跟你说话。谁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我不想干使别人扫兴的事儿。由于我不愿意干扫兴的事儿，所以才坐在这个角落里，撬动嘴唇，慢慢地、从容不迫地骂上一通，以便不让别人听到。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也来参加这个婚礼，你的两条腿怎么搞的，居然让你到这儿来了。你坐在桌子旁边，像那些脑子有毛病的人那样发笑。为什么你不站起来，披上大衣，顶着雨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噢，你这个该死的，难道你不明白呆在这儿是多余的？

女声合唱在继续。将军感到自己胸口上有一股热气，觉得是在光线充足、歌声嘹亮的热水浴中休息。这种光线和歌声，仿佛像从热水龙头流出来一般倾注在他的身上，将存留在他身上全部的坟泥一股脑地冲洗下来。那坟泥还散发着发霉的恶臭和死亡的气味。

这会儿，新娘从他跟前走过，他的高兴劲儿上来了。他想聊天，说说或听听漂亮话。他举目四望，寻找神甫，后来找到了。神甫就在对面的桌旁坐着，如同坐在荆棘上一样，眼睛死死地盯住一个地方。

将军把身子朝他那边探了探，说道：

“您看见了吧，这儿有多好？”

神甫无言以对。将军感受到了，周围的人投出的目光，简直就像一支支无声的箭一样；这些无声的箭落在兜上、纽扣上、皮带上，很少落在他的眼睛上。这是男人们射出的黑黑的沉重的箭，这是年轻的姑娘们射出的敏捷、刺眼、危险的箭。

“你像一只受伤的鹰，不过仍要自豪地飞起来。”

“这很有趣吧，是不是?”将军又对神甫说起来，可是神甫照样还是没有回答。他只是看，似乎要说“大概是这样吧”。他把视线收了回去。

“这些人对我们挺尊敬。”将军说，“我们能使他们敬仰我们，虽然我们曾经是敌人。”

“在任何地方，人们对死亡都是尊敬的。”

“战争早已结束了。”将军说，“战争过去了，也被忘记了。我肯定，在这个婚礼上，任何人也不会动脑筋去想与别人为敌的事情。瞧瞧，人们有多高兴!”

神甫没讲话。将军决心不再说话了，但是，他的黑色衣服上的一点东西，却开始在眼前跳起舞来了。

显然，神甫觉得自己在这里是多余的，他心里想。我在这儿是不是多余的?这一点理解起来是很困难的。现在，事情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们来了，是多余的也好，不是多余的也好，反正这会儿是难以走开的。在机枪的火力下撤退，要比站起来，肩上披起大衣，离开这个婚礼，走到雨地里去容易得多。

你自己本身也明白，你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已经感觉到了，在这个婚礼上，有个人在骂你。母亲的咒骂，任何时候都没有害处。尽管人们尊敬你，可你是明白的，不应当到这儿来。你拼命要把你心里明白的事情掩藏起来，可是你藏不住。你举酒杯时手发抖，眼睛里流露出非常恐惧的神情。

鼓声又响起来，黑管在哭泣，琴声紧跟在它后头铮铮作响。年轻的客人到了。他们来迟了，毡斗篷湿了个透。河里涨水，水流很急，把他们整个傍晚的时间全给耽误了。他们拥抱了所有的人以后，便在桌旁边坐了下来。

将军在思忖：显而易见，这些人把婚礼看得很神圣，不然不会为了参加一种娱乐活动黑夜里去跋涉，即使再大的娱乐，也是不会这么干的。看得出来，外边正下着大雨。在这样的一个夜里，连挖战壕都不可能，因为战壕里会积上一半雨水。

人家都说你在搜集你们国家的死人。也许你已经搜集到了很多，而且还要到各地搜集到更多，也许你将把死人全都搜集到。但是，你很清楚，有一个人你是一辈子、几辈子也找不到的，就像我一辈子、几辈子都永远也找不到我的姑娘和我的丈夫一样。我多么想把你永远也无法找到的那个人说出来，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不愿意对那些烈士提起战争的灾难。那天夜里下了一场什么样的雨啊，那雨比今天晚上的雨大得多。雨水四处流淌，不可能去挖坑，因为坑的一半都积满了水，积满了黑黑的脏水。那水好像是黑夜自己放出来的似的。但是，我还是把坑挖好了。不过，为了不打别人高兴，也为了不打你高兴，我什么也不会说。噢，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将军点着一支烟，可是奇怪得很。在那些黑黑的长长的用欧石南木制作的大烟袋杆儿面前，他觉得他的烟卷儿显得既渺小，又无力。老头儿们用他们那满是皱纹、饱经风霜的手握着这种大烟袋杆儿，一边说话，一边不时地吸烟，仿佛以此来掌握自由敞开的谈话的节奏。

户主，即刚一开始在走廊里欢迎他的那位上了年岁的老头儿走了过来，坐在将军旁边。这位老头儿像其他别的老头儿一样，手里握着烟袋杆儿，胸前戴着金黄色的勋章；这枚勋章在他的用粗糙毛料制

作的黑衣服上面摇动着。他对农民们经常挂在胸前的这些金黄色的勋章并不陌生，经常感觉到，在每一枚这样的勋章后面，都有一张被它的军队杀死的军人的苍白的脸。将军面对老头儿那满是皱纹的脸微笑着。老头儿使他想起一株干枯的、褶皱片片但依然还很结实的树干。坐在他身边，一开始对他喊“举起酒杯”的那个人，把老头儿开头讲的话译了出来。户主请求客人原谅，因为客人还在不停地来，他需要接待所有的人，所以未能同他谈天儿。

将军一边点头，一边说了几次“没关系，没关系”和“谢谢您”。老头儿不言语，慢慢地抽着烟。然后大声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

将军回答了老头儿的发问。

老头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将军懂得，老头儿从来也未听说过他的出生地是座什么城市，城市的名字肯定闻所未闻，尽管这是一座很大、很有名气的城市。

“你有妻子和孩子吗?”老头儿再次发问。

“有，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将军说，“我有两个孩子。”

“祝愿他们为你长命百岁!”

“谢谢!”

老头儿擎着长烟袋杆儿，又吸了一口烟。额头上堆起几道深深的皱纹，看样子是要说点什么。将军觉得老头儿正是要说那件事情，此事他在这一带地方已经愕然地听说过好几次了。

“我知道你干吗要到这儿来。”老头儿以一种特别平和的语调说道，仿佛是一把尖刀穿透了他的心。在他停留在那里，并对可能成为挑衅理由的谈话感到恐慌时，他竭力要让自己忘记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件事，因为这样他便觉得别人也会忘掉这件事。他愿意今天晚上呆在这里，作为一个旅游者随便而感兴趣地了解一下这一古老人民的风俗习惯，以便以后告诉给他的那些生活在祖国的朋友们。可是，这一可诅咒的谈话终于还是爆炸了，将军对来到此处参加婚礼感到后悔莫及。

“对的。”老头儿接着讲下去，“你搜集死亡的军人，这事儿干得

好哇，因为上帝的每个奴隶，都应当躺卧在他的祖国安息。”

将军点点头，以示同意老头儿的说法。老头儿庄重地站起来，请求原谅，因为他需要迎送其他朋友。

将军轻松地喝了一口酒，现在他的高兴劲儿又来了。这会儿挑衅的可能性已过，他可以不那么太专心地注视婚礼的进程，可以随心所欲地喝酒了。

“您看到了吧?”将军又对神甫讲起话来，他的舌头有点变粗了，“他们尊敬我们。我说了，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被忘记了。您说呢?”

“我说在这种场合，搞不明白哪里是风俗的结束，哪里是尊敬的开头。”神甫回答道。

“对将军来说，尊敬总是永远存在的。”

将军又喝了一杯。

“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将军一边把脸凑到神甫跟前，一边几乎是狡黠地说道，“我想起来跳舞。”

神甫闻听此言惊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您是当真?”

“怎么不是?”

神甫急赤白脸地摇了摇头。

“今天晚上我理解不了您。”

将军发火了。

“您像个奶妈似的，把我管得太厉害了。让我安静安静吧，活见鬼！我不想让别人监督我。”

“有话慢慢说嘛!”神甫说，“人家正听着我们哩。”

“何时能打碎这一丑恶低级的传统? 将军还要时时受监督?”

神甫伸手捂住额头，似乎要说：这会儿我们遭了什么难噢!

“我要起来跳，说一不二，就这样。”

“可您不会跳，您要成为笑柄的。”

“我成不了笑柄，这些舞都很简单。再说，我在谁面前成为笑柄?

莫非是在这些乡下人面前?"

神甫再次伸手捂住额头。

人家跟我说，今天晚上在俱乐部里，你特别询问了有关他的事情。显然，你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但就是找不到。你为什么询问，又为什么花那么大气力去寻找那个坏蛋上校呢？莫非他是你的朋友？既然你花那么大功夫去找他，肯定他就是你的朋友。整个晚上到处打听，没漏下一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在这附近入了土，可任何人也不清楚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你离开这儿，取不走你的朋友，你的坏蛋朋友。是他把我的生活给毁了。你走吧，越早越好，因为你跟他一样，也是一个可恶的家伙。现在，你像一头小羊羔似的老老实实地呆在那儿，嘴唇上挂着笑容，观看人家怎么样跳舞。可是，我知道你脑子里在打什么主意。你在盘算，有朝一日怎么能率领军队再进攻我们国家，到我们这儿来，像你的同事那样对我们烧、烤、杀、劫、掠。你不应该来参加这个婚礼。当你要往这儿来的时候，你的两条腿应该发抖。至少对我，对我这个神志不清，灾难深重的人，你应该发抖才是。这是干什么？你要起来跳舞？你敢去跳舞？你还微笑呢！还要站起来！人们还让你留下来！滚出去！你这是干什么！这太过分了！上帝真是有罪啊！

鼓声又像炮声一样咚咚咚地响起来。黑管发出哭声，尖细的琴声跟着也骤然大作，就像妇女的歌声一样。在屋子中央，产生并开始形成舞蹈的雏形，开头两个人跳，然后是三人跳，最后很多人都去跳了。

将军望着人们跳舞，然后望了神甫一眼，最后又再去看跳舞。过了一会儿，又去望神甫。这样，他的眼睛就忙活开了：看跳舞，看神甫，看跳舞。可是……

现在，原来要干的事儿干成了。他仿佛像喝醉了酒似的站在那

里，准备进到舞圈里。他觉得这个舞圈像火一般热。舞圈中的人将手伸出两三次，然后又收回来停止片刻，仿佛被火烧了一下。这舞蹈恰似海豚一般游动在他的面前。那个拉着他跳舞的老头儿，弯着膝盖，蹲下去，又站起来，把一只脚在地板上跺得啪啪响，好像在说："这个要这样跳，这样才站得住。"老人手里摇着白手绢，离开同伴以后，兜起圈来；双膝一扭，迅速一晃，好像镰刀割倒的庄稼，刷地一下子要栽倒在地上。然后又站起来，再撒手栽倒下去，仿佛被雷电击中了。然而，在轰轰隆隆的雷声下，霎时间他又复活了。鼓声响得越来越凶，黑管的响音如同滚滚起伏的波浪，就像一个巨人的嗓子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响声一样。琴弦也好似蛇一样狂舞乱跳。鼓敲得愈来愈快，声音也就响得越来越急。现在，在琴声中，你会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人从高高的山崖上推下一块巨石。将军还继续坚持着，在那狂热的、危险的、光芒四射的动作和激情下面，他头晕目眩了。他不懂这舞蹈已经持续跳了多久。他环视了几秒钟，好像在云里雾里一样看到了乐手们大汗淋漓的面孔和黑管的管颈；在烟气中，黑管时高时低地抖动着，好像高射炮的炮筒一样。他还看到了情绪极为亢奋的跳舞人闭起来的眼睛。后来，鼓声停止，琴弦也松弛下来。一切都很美妙，一切都可以蛮不错地进行到半夜，也许会进行到更晚的时候。但是，恰好在人们要各自分开的时候，听到了一种悲叹声，仿佛有一点东西把将军射穿了。婚礼上声音嘈杂，然而，很奇怪，这一悲叹声大家全听到了，任何人也不相信，妮澈老太太的悲叹声会那么大，那么刺激人。

"噢，唔！"她声音尖细地哭泣着。突然，一片鸦雀无声，肃静极了，以至于不仅哭声，而且连她的抽泣声，也清楚地听到了。但是，这种沉寂只持续了几秒钟。将军看到人们是怎么样立刻向老太太奔去，看到那儿是如何地出了事情。有个人被喊到跟前，看样子，这个挺苦的老太太似乎已经安静下来了，谁晓得她干嘛要激动。

假如事情像将军想的那样，老太太安静下来，他们不在她跟前，

那么，一切事情都会进行得正常无错，将军将在那里一直逗留到半夜，也许还会呆到更晚一些时候。可是，妮澈老太太又哭起来了。显然，谁也不能让她安静下来。不仅如此，又传来了她的一声叫喊和他人嗓门很高的声音。她的哭声比别人的声音都大，好像她用刀把欢乐给破坏了。另有一些人跑到老太太跟前，男的，女的，人可真不少呢。将军觉得，聚集到她身边的人越多，她的哭声就变得越响。乐手们演奏完了，乐器不响了，可是妮澈老太太反倒哭得更加厉害，乐器也像害怕似的一声不响了。将军看到她周围的那一大帮人是怎么样地活动；好像有点什么东西正拖着她。最后他看到妮澈老太太离开人群，冲到前面去了。他第一次看到了她那张干瘪、发黄、长着一双很大而又噙满泪水的眼睛的脸，看到了她那又瘦又小的身材。她在干什么？她想要什么？为什么哭？将军在发问，骤然间，他变得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谁也没有回答。人们拥在妮澈老太太后面，两位妇女扯着她的胳膊，想把她好好地送回去，可她喊叫起来，挣脱出去，拦阻在将军的前面。他看到了她那副由于愤恨而气歪了的面孔，什么也弄不明白。她冲着他喊叫，打着手势，对着他的脸痛骂。他脸色蜡黄地站在她的面前。这一场面只延续了几秒钟，因为人们把她架走了。她迅速地向门口走去，出了屋。

将军直挺挺地僵在那里，谁也没把妮澈老太太的话译给他听，因为人们都不晓得神甫会阿尔巴尼亚语。他们都凑到正在哭泣的新娘和脸色变得惨白、举手划着十字向上帝祈祷的家庭主妇跟前。

“一开始我就跟您说了。”走到将军身旁的神甫说，“我们就不该到这儿来。”

“出什么事了？”将军问道。

“这会儿不是时候，过后再说。”

“您是对的。”将军说，“我做过分了。”

这一大群人一开始好像一个颜色斑驳、吵吵嚷嚷的小灌木丛，现在突然变成了一片阴森森的冬树林。所有的脑袋、胳膊和手都动了起

来，干巴巴的手指头，如同被暴风雨剥光了叶子的树枝，东摇西摆地朝下弯。后来不知谁干哑地咳嗽一声，这一声干咳把这一切全给压了下去，骚动逐渐平息了。

“他们干吗想参加我们的婚礼?”一个青年小伙子说。

“嘘！别丢人。”

“干吗丢人?”另一个人说，“他们居然还敢起来跳舞。”

“我们不能撵他们走，我们的先人留下的规矩就是这样。”

“什么样的规矩？对可怜的妮澈来说，先人的规矩又怎么说?”

“嘘！别让他们听见。”

“别害怕。”又有一个人抢着说，“即使他们懂阿尔巴尼亚话，也听不清我们说的什么，因为声音太嘈杂了。”

将军和神甫什么也没听到，他们只是逐个地打量了一下人们的面孔。将军迅速地把目光从男人和青年人身上转移到披着黑头巾的老太太们的脸上：这些老太太看上去都像加了黑框的照片上的人一样。她们呆呆地一个挨着一个站着，仿佛预感到了另外的不幸。

将军感到害怕，对到这儿来很后悔。以往的事情不是很容易能被忘记的，而且阿尔巴尼亚人又都想报仇雪恨。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这个奇怪的、突如其来的、疯子才会有的想法，是个什么主意？截止到目前，事情进展得还是不错的，他在有人陪同和法律的保护下四处活动。可是今天，却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何必要单独地与神甫一起参加这个婚礼？在这里，他越出了规定和法律所能允许的范围。这里什么事情都能发生，任何人也不负责。

“我们走吧。”将军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我们马上就走开。”

“对，对。”神甫说，“我们走，他们把我们中伤得太厉害了，那个老太太讲了我们最糟糕的事情。”

“那么说，在走之前，我们应该给他们作个回答。那个老太婆说什么了?”

神甫准备回答将军的话，可是户主来到了他们面前。

“坐吧。”他一边挥手指着桌子，一边说。然后跟妇女们做了个手势，让她们招待一下，于是妇女们便端来了白酒和另外的小吃。

将军和神甫互相望了望，然后又朝户主瞟了一眼。

“这种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老头儿说，“您坐吧，坐吧。”

留下来的他们二人都很发窘，一直站在那儿，后来才坐下，这样就显得不那么刺眼了。

这会儿，屋子里多少有了点秩序，人们重新在桌旁坐下来。那个费劲儿给将军翻译祝词的人，来到将军身旁坐下了。

他对将军解释说，妮澈老太太是一个精神有毛病的老人，孤孤单单地自己过日子，因为战时Z上校的侦缉营把她的丈夫给绞死了。然后又告诉他，上校还把她的姑娘带到了他的帐篷里，姑娘当时才十四岁。大清早，当她离开上校的帐篷往家走，尚未走到家的时候，投井自杀了。就在第二天晚上，上校失踪了。有人说，晚上他又去了妮澈家里，因为他不知道姑娘已经死了。卫兵在外边等着他。后来，他拖延了很久，超出了所需要的时间，可是卫兵受命要等到天明。早晨，妮澈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谁也不知道Z上校到哪儿去了。有的说，他被紧急地叫到地拉那去了，有的还讲了一些别的事情，可是营里的军官却保持沉默。这个营第二天就开到别处去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他说得支离破碎，语无伦次，断断续续，话说得如同锤子落在头上一样。

这时音乐又开始奏起来，不过，一开始谁也没站起来跳舞。后来，妇女们站起来跳了。每人都觉得，除了妮澈本人以外，大家都把她这个老太婆给忘记了。将军如同一个麻木的人坐在桌旁边，没有可能去考虑任何事情，他的目光又和神甫的目光碰到一起了。

“那个老太婆说了些什么?”将军问道。

神甫瞪着他那双灰灰的眼睛，打量他好长一段时间。将军觉得自己很不舒服。

“除了别的话以外，她还说您是Z上校的朋友，不能睁眼看你。”

“我是Z上校的朋友?”

“对，她说的正是这个。”

“她为什么要这样想?”

“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昨晚我们寻找上校的缘故吧。”将军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像他是在对自己说话。

“也许是这样吧。”神甫干巴巴地回答。

将军变得更加忧悒了。他再也不去看周围的任何人、任何事情，而且连任何声音也不听。

“我要站起来。”将军突然说道，“我要站起来，告诉这里所有的人，我不是Z上校的朋友，而且作为一个军人，我鄙视他的往事。”

“您为什么要干这件事?为了叫这些农民开心?”

“不。”将军说，“我干这件事是为了我们军队的名声和荣誉。”

“怎么，因为一个阿尔巴尼亚老太婆骂了他，就玷污了我们军队的名字?”

“我想解释清楚，不是我们所有的军官都呆在帐篷里同十四岁的姑娘胡来，对军事行动置若罔闻，让自己落到遭女人杀戮的境地。”

神甫皱了一下眉头。

“我们不是到这儿裁判什么的。”神甫慢条斯理地说，“上边的人才干裁判的事儿。”

“他们以为我真的是Z上校的朋友哩。”将军继续说，“您没觉察到他们是怎么看我们吗?您往四周看看吧，看看他们的眼神。”

“您害怕了?”神甫说。

将军匆匆地瞟了他一眼，他想重重地说上几句严厉的话，可是上面又响起了鼓声，到嘴边上的话卡在嗓子眼里了。

说真的，感到害怕的是将军。今天晚上，他脑子里装着那些奇特的想法滑得太远了，现在应当小心地后撤才是。应该采取点什么办法，让这群野性人变得温顺些。他自己应当与Z上校立刻分手，各奔

东西。他应当把上校甩掉，就像甩掉一把要粘在靴子上的烂泥一样。

真的，看来情况正在趋向正常，不过，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感觉到，在这个无形的内脏里，有点东西正在喧腾着。这从人们的目光里，从嘁嘁喳喳的话语中，可以看得出来、听得出来。除此之外，在走廊里，在墙壁的钉子上靠着毡斗篷和大衣还挂着一排排客人的枪。神甫早就说过，在阿尔巴尼亚人的婚礼上，杀人流血的事儿是司空见惯的。将军的脑子里，不时地盘算着这些念头。

趁时间还不晚，现在，他们应当干点事情。他们二人如果大明大摆地离开婚礼，某个醉汉从背后开上一枪，那不会是什么奇闻怪事。一个人跑步离开一个地方，那是要引起别人追踪的，所以说，应当撤离得很小心才成。

将军那混浊不清的目光，朝四周扫了一遍，又看到了那一大群人。他们在活动、跳舞、说说笑笑。后来，他的目光落到了那排老太太身上。这些老太太还像开始时那样坐在那里，面容呆板，稍微弯着腰，好像一排圣像。他倦怠地低下头，再也不讲什么了。

鼓声又震耳欲聋地响起来，黑管的声音嘶哑、哀伤，在整个婚礼上，自始至终地响个不停。男人们坐在桌旁唱歌，将军再次感受到夕阳在群山万壑缓缓西下的情景，想起妇女们低着头唱的那些动人心魄的歌曲。男人的歌声使他心里有一种压抑感，叫他呼吸紧张，就像一个女人拥抱一个男人时呼吸急促紧张一样。

“我觉得是该走的时候了。”将军对神甫说。

神甫同意地点点头。

“正是时候。”

“我们站起来要留点神。”

“是的。”

“全部事情在于我们不要走得太显眼。”

“您第一个先站起来，我随后跟着您。”

“全部事情就在于我们不要走得太显眼。”

时辰已经到了半夜，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当妮澈老太太又来到这里时，可能大家全都把她给忘了，根本没去注意这件事。她正是在将军和神甫两个人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来到的。也许屋子里所有的人当中，将军第一个察觉了这件事。他像一个能在丛林中嗅出老虎的老猎人似的察觉了老太太的到来。当大家朝向门口活动、小声说话，然后又活动起来的时候，他用整个身心喊出“她来了”，他自己明白脸色都黄了。然而，这一次妮澈老太太并没有哭，谁也没听到她的声音，尽管大家都察觉到她就在门旁边。门旁聚集了许多人，任何人也弄不明白妮澈老太太是怎么进到屋里来的。也许是她那副模样使得别人半路上放了她，也许是她自己请求别人放她回来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她是回来进到屋里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叫了起来。她全身湿成了落汤鸡，粘上了许多烂泥，脸色苍白苍白的，如同死人一样。肩膀上还扛着一条袋子。

将军自动地站起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她正在寻找他。他自己主动走到前面来，正像那种野兽，一听到远处敌人的喊叫声，就屈服于他的声音一样。本应走开，可这会儿却跑着来到她的面前。

人们围了一大圈儿，不知道该怎么办。谁也想不出什么主意。妮澈老太太站在原地，向将军投去困惑的一瞥，仿佛不是看他，而是看他的影子。她在咳嗽的当儿讲了一点什么。

“给我翻译出来！”将军喊道，他似乎在求援。可是，任何人也没给他翻译。将军的眼睛向四周环视，碰上了神甫的目光。神甫走到跟前，说道：

“她说从前她杀死了我们的一个大军官，她还问您是否就是那个搜寻军人尸骨的将军。”

“是的，太太。”将军吐字吃力地说。他使出全身的力气，要把头抬得高高的，以了不起的架势出现在这个使他感到惊恐不安的老太太面前。

于是妮澈老太太又说了一点别的什么，可是神甫没跟得上把这

个翻译出来，因为她最后讲的那些话，被一种听来挺凶的嘟嘟囔囔的声音给干扰了。尚未被人拦住之前，在妇女们的喊叫声中，她把后背上背的那个袋子扔到地板上，扔到将军的脚跟前。根本不需要神甫给他翻译出来，完全不需要翻译，因为一切事情全清楚了。将军的目光从妮澈老太太身上移开，死盯盯地落在袋子上了。没有什么事情，能比那条肮脏的粘着一块块又黑又湿的烂泥巴的袋子摔落到地板上，发出震耳的响声这件事更为可怕了。妇女们惶恐不安地闪到一边，用手捂住脸；老太太们用手划着十字，忐忑不安地小声喳喳道：

“她把那个大官埋在门槛前边了。”有人大声说道。

“可怜的妮澈啊！”

妮澈老太太回去了，像来时那样，全身湿成了落汤鸡，并且粘满了烂泥巴，任何人也不想再去拦阻她，因为原来要做的事情终于成功了。

将军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板，喧闹声、喊叫声和恐惧感使他耳鸣起来。连他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四周变得那么肃静。也许根本就没有出现肃静的情况，只是他的一种感觉而已。那个破了不少窟窿眼的旧袋子，在将军和所有婚礼参加者的脚上，泛着黑光，默默不响。奇怪得很，他专门注意到了袋子上的那些窟窿眼。他那敏捷的脑子在想，应该有人来管这件事才成。于是，在一片静默无声的气氛中，他慢慢地弯下腰来，伸出颤抖的手，抓住袋子嘴儿，把这个粘上许多烂泥巴的脏袋子立了起来。然后披上大衣，慢慢地把袋子扛在肩上，跨出门槛，猫着腰，麻木地走到雨地里，仿佛把全世界的耻辱和负荷全都背在肩上了。神甫跟在后头。在他们的背后，有人大声地哭了起来。

第二十一章

将军踏着一个个积满了雨水的水坑，走在前面，神甫跟在他后头。走过窄窄的小路，来到村里的一个场地上。在一座古老的教堂周围兜起圈子，黑暗中他们突然迷路了。他们一声不响地又走回去，将军走在前面，神甫跟在后头。又经过村井、俱乐部，来到教堂前，但住的房子还是没找到。两次走到同一个地点，凭他们头顶上那个黑糊糊的教堂大钟为标记，他们晓得是怎么回事。风刮得大极了，以至于风雨交加，都要把大钟摇动起来，叫它冷不防地发出响声了。

拎着袋子的手已经麻木了。

蓓蒂，你有多么苗条轻盈啊，一天晚上在公园里他对我连连这么说。我们结婚之前，在一起搂抱着散步，快活了两个晚上。那是一个温和的神秘的秋夜。午后下了雨，公园里的小路上，有许多积满了水的小土坑，他像搂小孩子似的搂着我的肩膀，不时地重复说：蓓蒂，你真的是那么苗条轻盈，还是幸福给了我这样一种感觉？他那军靴沉重而不在意地踩在水坑里，把落在水中的月亮的影子踩碎成千万个小块块、小点点。蓓蒂，我愿意就这样搂着你的肩膀搂上一辈子。瞧，就这样。他朝前走着，吻着我的头发，一个劲儿地重复说：你是多么苗条轻盈啊。

现在，您自己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轻，将军心里想。你只有三四公斤，不可能更重，然而，却把我的脊梁骨累得好疼。

他们又回去了，又像两个醉汉似的到村子里兜弯，转悠了好多次，竭力想离开教堂更远些。这个教堂老是不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尽量想往远一点的地方走，以至于差点和小轿车的散热器撞在一起；那小轿车在夜色里很难看得清。

这会儿，他们想起来了，小轿车原来是停在他们住的那栋房子的前面。

他们二人找到了房子。将军推开大门，第一个走进院子里。他走进去之后，大门的两扇门板随手撞得咣当咣当直响。他又推开屋门，把袋子放到地上。袋子落地发出轻微的响声，他用已经发木的手打着了打火机。

在打火机微弱的光线下，咚咚咚地登上台阶，爬完楼梯，走进房间，脱掉淋透的雨衣，扔到地板上。然后，衣服也没脱，就倒在床上了。他听到了开门关门的响声，有人躺到另一张床上了。

这是神甫。将军心里想。

他拼命想睡过去，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又竭力把各种想法从头到尾、前前后后地捋一下，然而，即使对这个也无能为力。

我要睡觉，他在想。要睡过去，睡过去。我要像外边的卡车那样一声不响。睡觉。

他紧紧地闭上眼睛，可这一着也没帮上他的忙。他把眼皮闭得越紧，黑暗则越加无济于事。因为时而从另外一片天空射过来一束束光线，投过来一块块污垢；时而又从远处广阔的蔚蓝的浴场射过来斑驳的光。

我喜欢黑暗，将军思虑着。我喜欢全部的黑暗，洁净的黑暗，以便好睡过去。

可是，与红的、黄的污块混杂在一起的蓝色的、白色的、青色的

光带，并没有离开。它们就在那里，在他前面，在离他几厘米远的地方，在他只要头一动就能看见的每一个方位上，在黑暗中间。

他站起来，吃了安眠药，然后又倒下了。可是，就在他打盹儿，要睡过去的时候，竟被惊醒了。在远处，在空场地那一边，鼓声又开始咚咚咚地敲起来了。

这个该死的婚礼，还要继续下去吗？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用毯子把头蒙起来，以便不让鼓声传到耳朵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觉得有一个小人，就像童话里那样非常小的小人，盘踞在他的脑子里，敲着一个小鼓，一个就像用铅做成的小兵敲的那种小鼓。不管他把脑袋钻到哪里，甚至把耳朵堵起来，这个小人也依然要出现在那里，在那儿盘腿打坐，有节奏地不停地敲着鼓。咚咚咚，咚咚咚，嘣嘣嘣，嘣，嘣，嘣。

他觉得军人们正在咚咚咚的鼓声中前进。

我的伟大的军队在前进，将军心里琢磨着。后来，他骤然地抬起头，对自己喊：够了！

他又一头栽到枕头上，可是，过了一分钟，又抬起头来。

"神甫，喂，神甫，上校，起来！"将军喊道。

神甫十分惊慌地爬了起来。

"出什么事了？"

"我们要尽早离开这儿，快起来！"

"我们要走？往哪儿走？"

"去地拉那。"

"现在还是夜里。"

"没关系，我们走。"

"必须这样做吗？"神甫说。

将军的靴子在地板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

"您没有听到？没听见鼓响？在那儿，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一切

都还在继续进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您害怕吗?”神甫问道。

“是的。”将军说，“我越来越觉得，好像他们要成群结伙地到我们住的这个房子里来，一边敲鼓一边撵我们走，就像某些国家的人民驱赶生灵、清除法律一样。”

将军打着了打火机，捣腾手提箱。

“您有什么想法?”将军问神甫。

“我们走。”神甫说。

将军继续清理手提箱。

“只不过是要跳一个舞”。他小声地叨唠，“我想跟他们跳个舞，差点倒了大霉。这个国家怎么这个样子，我的妈呀!”

“我们原来不该去。”

“只是跳个舞，可这个舞险些变成死亡之舞。”

神甫小声地唠叨一点什么，然后两个人相继走出房间。将军的靴子踩得木板楼梯咯噔响，传出一阵杂乱的响声。他第一个走到院子里，直向大门奔去。神甫稍微迟缓了一点。将军转回头，看见神甫肩上背了点什么东西。

他背的是袋子。将军心里想。

他们来到街上。雨已经停了，夜色并不十分浓。

“几点了?”神甫问道。

将军打着打火机。

“四点半。”

“稍过一会儿天就亮了。”

公鸡在一个地方开始啼鸣，从山上刮来冰凉冰凉的风。卡车黑糊糊地停在稍远一点的地方。

他们站在小轿车旁边，向东方望了望，好像有个人不停地跌跌撞撞地朝东走去；他手里拿着一把涂了白油的刷子，立刻把黑黑的夜色吸收了，给夜晚留下了灰暗、潮湿、寒冷的足迹。

"他们睡在这所房子里。"神甫指着正对面的房子说道。

"把司机喊醒，告诉他，我觉得自己不舒服，要尽早地出发到地拉那去。"

当神甫推开另一个院门时，把一个小铃碰响了，于是在邻居那个院子里，一只狗汪汪汪地叫唤起来。然后，又有另外一只狗也跟着叫起来。片刻过后，全村所有的狗都叫起来了。

但是，在狗的叫声中，将军还是能辨别出鼓声和远处的喧闹声。

院门又响了几声，神甫从那边走出来，肩上背着袋子。

在袋子上又加了什么工？将军在想。

"他正在穿衣服。"神甫说，"他就来了。"

"这些狗。"将军说。

"就是啊，村里的狗就是这个样子，只要一条狗叫，所有的狗就都得叫。"

让它们叫好了，将军在思考。这不算什么。它们如果晓得卡车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非拼命嚎叫起来不可。

"这万恶的风。"神甫说。

狗叫声一个接一个地停了下来。

像做梦似的，在一个地方，一条母牛发出哞哞的叫声。

院门响了，他们看到司机在半明半暗中出来了。他们互相问了好，司机打开轿车门，被夜里的冷空气呛得直咳嗽。将军上车了。

"请打开前门。"神甫说。

司机将前门打开了。

"这是什么？"他问道。

"一个袋子。"神甫说，"对我们有用。"

司机用脚规整了一下袋子，神甫坐到后边的座位上。

他们出发了。

汽车的灯光扫过道路两旁黑黝黝的篱笆，然后照到公路上。小轿车一开动，将军就披着大衣偎依在座位的一角，闭上了眼睛。现在，

除了发动机不太刺人的声音之外，任何别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他特别想睡上一觉。可是，突然他又开始回忆起婚礼上发生的那件事的细枝末节。

我想睡觉，将军在想。我不想回忆任何事情。我再也不想到那里去了。

但是，他的思想还是又回到婚礼上去了。脱掉淋湿的雨衣，在桌旁找好了位置。

他睁开眼睛望了望，但是，除了半明半暗的原野之外，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观赏的。影影绰绰的原野好像是为了小轿车通过而开辟出一条路，等轿车一开过去，立刻又把路给封上了。

神甫将头垂在胸口，打着盹儿。

公路挺直，通向前方，然后稍微出了一点弯儿，接着又是一段直路，末了兜了个大弯儿。

突然，公路被车灯唤醒了，夜晚的喧闹声使它睡眼惺忪地、苍白地镇静了片刻。然后，又沉浸在夜色中。道路两旁，不时地展现出一条纯粹的白岩石带。石带很长，足足有好几公里。这种白颜色真糟糕，刺激人的肌肉直打颤。将军觉得，这些岩石如同纪念碑一样。

司机来了个急刹车，神甫的头碰在前排座上了。

“怎么回事?”他晕晕乎乎地说。

将军好像一个木头人似的向外张望。小轿车在一座桥的前面停下了，桥下传来哗哗的流水声。

“您为什么停车?”神甫问道。

司机嘟嘟囔囔地说发动机出了点毛病。他下了车，把车门关得挺响。

车灯垂直地射在桥梁的栏杆上。司机掀开车盖子，全身趴在发动机上。然后又钻进车里，找一点东西。他一边找，一边把碍事的袋子挪到旁边去。最后，把袋子拎到车外，拿起了车座。

将军打开车门下了车。他大步流星地绕着汽车转悠起来。神甫坐

在那里没动。司机吐词不清地骂了几句，然后又到车里去找东西。将军第二次被袋子绊了脚。

这个袋子差点要了我们的脑袋。将军的脑子里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截止到目前，每件事都进展得很好，可是却偏偏出来了这个倒霉的袋子，闹得一切事情都开始反常起来。

“这个袋子可真棘手。”将军大声说。

“您说什么?”神甫问道。

“我说这个袋子很棘手。”将军重复说。这时候，他用皮鞋尖把袋子踢了一下，于是袋子便叽里咕噜地滚到桥下边去了，发出刺耳的响声。

“您干了什么事?”神甫喊道，急急忙忙下了车。

“这个袋子是个很坏的标志。”将军气喘吁吁地说道。

“万幸的是我们找到了他。我们找他已经找了两年了。”

“为了这个袋子我们险些丢了脑袋。”将军疲倦地说。

“您干了什么事?”神甫喊道，打亮了手电筒。

“我不想扔它，活见鬼！我只是踢了它一下。”

他们走到道边上，朝下边望了望，河水正哗哗地流着。手电好不容易在陡峭的路堤上照出个亮来。

“什么也不会泄露。”将军说。

司机也走到跟前来了，三个人一起朝下边望了一会儿。

“水会把它冲走的。”将军说道，声音里有一种疲惫、后悔的意味。

神甫以一种很凶狠的眼光望了望他，第一个向汽车走去。

“好冷。”将军对司机说，“这风刮人的脸皮。”

他跟在神甫后头上了车。

汽车开动了。

现在。他在黑黑的水流中打滚呢，正好像在做一个噩梦，将军思量着。他闭上眼睛，为的是不看那一大片几公里长的岩石。他使劲儿想睡上一觉，然而，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第二十二章

两天过去了。这是他们在阿尔巴尼亚逗留的最后一天。将军很晚才起来，他打开百叶窗，清晨的天气阴沉沉的。

快十点了，将军盘算着。应该到航空公司订机票了。十一点一刻要做弥撒，四点半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宴会。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在床头柜上，堆着一大堆来自祖国的信件、电报、报纸和杂志。

信很多，几百封信来自他的国家的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历史，战斗故事，没完没了的随便一座山丘、一座房屋的草图，或者出自某一个老战士之手的一座村庄的整个计划，都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信封里。

将军把信封和信纸扔进纸篓里，走出房间。下楼梯走得很慢。然后走在前厅里软绵绵的地毯上，向服务台工作人员询问，哪里可以找到领班服务员。

人们把领班服务员给喊来了。

“有人通知您今天下午在这儿有一个小型宴会没有?”

“对，有的，”领班服务员回答道，“下午四点半，在第三厅一切都将准备就绪。”

“谢谢您了。”将军说。

“不客气。”

将军问看见神甫没有，回答说神甫出去了。

在前厅里，服务台前边非常热闹。两部电话机不停地打。在电梯口的一大批手提箱旁边，一大帮人等着上楼。几个黑人坐在前厅的大沙发上，一批中国人在两个姑娘陪同下，其中一部分走进一个餐厅；另一部分人到服务台前边去了。两位看来是奥地利人模样的金发女郎，正等着与维也纳通电话。

将军走进右边的大厅，他经常到这里喝咖啡，可这会儿却看到连一个空位置都没有了。在他于“达依迪”旅馆停留的全部时间里，第一次看见有这么多外国人在此逗留。

他回过头走出大厅，在前厅里又碰上另外一些手提箱子走进旅馆的非洲人。

在旅馆外边，靠着高高的松树旁侧，停着好多辆小轿车。

这种欢闹的有生气的气氛，是怎么个意思？将军自言自语地走下旅馆门外的台阶，拐向右边，走在通向部长会议的大街上。

在斯坎德培广场，他看见了很多旗帜。那些旗帜树立在小花园的四周，在风的吹拂下，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在高高的杆子上，在部长会议的正面墙壁上，在文化宫的大柱子上，到处都悬挂起标语和彩灯。

噢，后天就是他们的国庆节了，我差点给忘了，将军对自己说。

人行道上人山人海。人们习以为常地聚集在电影院的广告前面，在大钟的对过儿。他从广告前面走过去，可是心思却没在那儿，刚走过去两步，就把上演的电影给忘了。

他看了一下表，时间是十一点。

弥撒一结束我就去取票，他心里想。他从左边走回去。在银行前面，在“大学生”咖啡店后边，人们成群结伙、急急忙忙地活动在各路公共汽车的站台上。这里是通往纺织厂、电影制片厂、拉普拉克以及城郊的各种汽车的终点站，所以总是聚集着许多人。不过，那一天比任何时候都乱，不碰人、不撞人是无法行走的。将要举行戴·普洛

冯迪斯仪式的教堂，是一个汽车站，下边一段路他也决定徒步到底。他走在路当中，又为上校遗骨的事儿动起脑筋来。

现在，他记不清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了。只记得当时自己的心理状态很痛苦、很阴暗，迷迷糊糊打不起精神。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的心里曾有一种压抑感。而现在，那个沉重的夜晚已经过去了，他觉得他的行动已经毫无意义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多少总还可以顺通一下。今晚他就要跟神甫谈一谈。上校的身长是一米八二，可一米八二的军人多着呢。牙齿的事儿倒是很容易挑出错，不过，有谁能想到上校的遗骨是冒名顶替的呢？任何人也想不到。

他想把那些身长与Z上校相同的军人都回忆起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每一次，当阿尔巴尼亚专家大声喊“身长一米八二”的时候，他总是自言自语地重复这样的话：“与Z上校一般高。”可是，这会儿一个军人他也回忆不起来。

现在，他只回忆起在一条窄窄的乡间小路上人们偶然挖到的那个英国飞行员。那个飞行员，后来又被重新埋起来，扔在原来所在的地方了。

然后，他想起了那个记日记的军人。那个人身长是一米八二。将军在琢磨，用记日记的那个军人的骨头替换Z上校的骨头，会出什么事。他想象得出，上校家里及其所有的亲属，会怎么样迎接那个普通一兵的遗骨，将如何举行一个大规模的追悼会和隆重的葬礼；他想象得出，身着一套黑装的蓓蒂，将会怎样地扶着上校母亲的胳膊哭哭啼啼，上校的母亲又将如何对全体参加追悼会和葬礼的人大讲特讲关于她儿子的事情。然后还要把那个开小差的军人的遗骨，放进屠杀他的那个人的宽大的坟墓里，还要敲钟，某位将军还要发表演讲。一切都将违背真实的情况，强奸民意，践踏教义，太带有讽刺意味了。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鬼怪与魔影，当天夜里，那个军人就会从坟里一跃而起。

不，将军在自语。最好还是另找一个吧，肯定还会有的。他加快了脚步，再过两分钟，弥撒就要开始了。教堂从老远就看见了，很漂亮，建得具有现代风格，而且直接建在一条大街上。在教堂台阶前面，人行道旁边，停着一大溜儿各种类型的华丽轿车。

外国使领馆的外交官都来了，将军对自己说。他迅速地登上了大理石台阶。走进教堂时，弥撒刚刚开始。他从右边捧了圣水，划了十字，然后站到一边去了。他眼睛盯着正在讲话的神甫，可是，几乎什么也没听清楚。只是看到了四处挂起的黑纱，在这种追悼会上，通常都是要这样做的。他还看到了放在教堂中心，也披起了黑纱的空空的棺材。黑纱和人们的黑装，吸收着蜡烛微弱的光。因为窗户很高，光线很难通过涂了油彩的玻璃射进来，所以教堂显得阴暗惨淡，比实际情况要冷得多。

神甫为军人的魂灵祈祷。因为睡眠不足，他的脸色显得很苍白，眼睛苦涩发灰，充满倦意和悲哀。外交官们脸色呆板而严肃，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教堂里，在蜡烛散发的气味当中，还飘散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有一个女人悄悄地哭泣起来。

这是我们使馆的人，将军在想。

神甫的声音铮铮地、庄严地响彻在教堂的各个角落：

“永远安息吧！”

将军身旁的那个女人更加悲痛了，还掏出了手绢。

“永恒的光芒照耀着他们。”神甫接着讲下去，眼睛向高处看，那儿空悬着耶稣背着十字架的身体。然后，神甫的声音变得更加响亮、深沉而庄重：

“平平安安地休息吧！”他以此结束了讲话，声音回响在教堂的各个角落。

“阿门。”助祭说。

有几秒钟的时间，将军觉得好像听到了蜡烛火苗发出的微弱的

噗噗声。

平平安安地休息吧。将军对自己重复说，突然他觉得激动的心给堵死了。

当所有的人都跪在耶稣前面，神甫高高地举起圣饼，然后举起葡萄酒杯，为死去的魂灵开始吃面包、喝葡萄酒的时候，将军突然想起，成千上万的军人，原来也是这个样子，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小铝缸子，站在煮着芸豆粒汤的大锅前面，等着领那份晚饭。这时，恰好是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给铝缸子和钢盔的铁皮涂上了一层红红的永恒的亮光。

永恒之光照耀着他们，将军心里重复着这句话。他一边跪下来，一边目光凄楚、有气无力地望着冷冰冰的大理石块。

铃声响了，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弥撒到此结束。”神甫的声音如同大钟轰鸣一般。

“为了上帝的爱。”助祭说。

人们开始往外走，外边响起汽车马达轻微发动的声音。将军走到外边时，外交使节的车辆已经一个接一个地动了起来。他到教堂前面的公共汽车站上等车。上车后站在车后漂亮的大玻璃旁边。

“公民们，请买票。”售票员喊道。

他听懂了“票”这个词，想起该买票了。伸手摸兜，掏出一百列克。

“您没有零钱吗?”售票员对他说。

他琢磨了一下售票员的发问，摇头表示没有。

“三个列克。”售票员说道，伸出三个手指解释，“您没有三个列克零钱?”

将军又摇了摇头。

“我说同志，他是个外国人。”一个身材高高的小伙子以和缓的音调说道。

“我想就是嘛。”售票员说。她把零钱往一起凑，准备给他找钱。

“会是一个从美国来的阿尔巴尼亚人吧。”坐在售票员身旁的一个老头儿说，“那些去了美国的阿尔巴尼亚人当中，有的竟把阿尔巴尼亚话全忘了。”

“不，我说大叔，他是一个外国人。”那个讲话慢条斯理的小伙子说。

“你听我的好喽。”老头儿说，“这种事我清楚，他就是那些去了美国忘了国语的人当中的一分子，准没错。”

将军明白他们说的就是他，以为他们把自己当成美国人了。

让他们随便把我当成什么人吧，将军心里说。

汽车在银行一站停下来的时候，人们开始下车，他又和老头儿的目光相撞在一起了。

“就这样吧。”老头儿大声说道，满面喜色地微笑着，下了车。

将军从正在等坐去卡姆查和尤兹百里斯的汽车的农民中间穿过去，又重新来到大街上。在航空公司，人家没让他耽误时间。他将票揣到兜里，又来到大街上。

在迪布拉街的人行道上，特别是在几家大水果店前面，早餐店边上和大百货公司门口，有许多人。经过大百货公司前边时，他想起来了，应该买点纪念品才是。

在橱窗前站了片刻，然后走了进去。纪念品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他不慌不忙、逐一地全看了一遍，对纪念品他一向都是很感兴趣的。

当年，那些军人离开阿尔巴尼亚时，买过什么东西作纪念呢？

猛然间，那个小人又在他的脑子里敲起鼓来。开始鼓点挺慢，后来敲得快了，而且是越敲越快，越敲越快。只不过现在他已经不是手抱双膝地蜷伏在他的脑子里，而是站着。这个小人黑白分明，光彩夺目，披着红马甲，扎着黑长的带子，头上还戴个毡帽。橱窗里的这个小人，全身都是瓷的，光彩夺目，站在那儿敲鼓。将军看得十分专心，眼睛一动也不动。

他用手指了一下这个小人。

“要这个敲鼓的山民吗?”售货员问道。

将军虽然不懂售货员讲的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点头示意，要的就是这个。

售货员姑娘将小人从橱窗里取出来，包装好，递给了他。

“十八个列克二十个金达尔卡[①]，请拿好。”

他付了款，走出百货公司，向街垒路走去了。

① 金达尔卡是阿尔巴尼亚的硬币，一百个金达尔卡为一列克。

第二十三章

嘣—吧拉—嘣；嘣—吧拉—嘣；嘣，嘣，嘣。

“阿洛。”①

将军晕头转向地回到了旅馆。

“阿洛。”有人回话。

中将站在旅馆前面的人行道上。像通常那样，他把军大衣的左袖子塞进大兜里，那仅有的一只手握着烟斗。

“您自我感觉如何?”

“很糟。”将军说，“您感觉怎么样?”

“我自我感觉也不好。”

中将吸了一口烟斗。烟斗一离嘴，便开始望着烟雾想心事。

“第一点，虽然过了很长时间，但我仍然还要请您对去年发生的那桩事故予以谅解。”他避开对方的眼睛说，“他们把您的申诉交给了我，但我要真诚地告诉您，那不是我的过错。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遗憾。”

将军以凝重深邃的目光望了望他。

“有过错的人是谁?”将军问道。

---

① 欧洲人打电话时的呼语，相当于中国人打电话时的呼语“喂!”

“是我的陪同者，他把一切全搞乱了，而且不只是这件事情。走，我们找个地方坐一坐，我要详详细细地告诉您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请原谅，现在我没有时间到任何地方去坐着，我们站着谈好了。”

“那么最好还是晚上再谈吧。现在您就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跟您说了，很糟。”将军说，“道路难走极了。”

“是的，是这样。”

“不仅如此，我们还死了一个工人。”

“死人了？为什么？您那儿出了什么事故?”

“没出事故，那位工人是感染中毒而丧生的。”

“是什么东西感染中毒的?”

“搞不清楚。大概是某块骨头引起的；也许是某块金属造成的。”

中将作出一种大为惊讶的表情。

“那您一定要给死者的家属付抚恤金喽。”

将军肯定地点点头。

“我从来也没看见过这么多的山。”稍过一会儿说道。

“要看的山还多着呢!”

“不，我们结束了。”将军说，“这是最后一轮。”

“你们结束了？多好啊。那么说，是我还要看更多的山喽。”

“到处都是山。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在开垦梯田，您看见了吗?”

“怎么能看不见，他们挖呀，刨呀，没完没了地干。”

“他们是在开垦新农田。”

“在一个地方，我看见他们在铁路路基的两旁还种上了东西。”

“他们什么不种！看样子，他们耕地不足。”

“肯定是这样，他们对我们挖走军人遗骨这件事很高兴。”

“是的。在撂下的坟坑上，他们立刻就种东西。他们说，土地埋了我们的人，蜕化变了质，种上庄稼还可以复原。”

将军听了这番话为之一笑。

“你们的工作进展怎样？”将军问道。

“不好。”中将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从高山到平地，从平地到高山，已经转悠一年半了，到现在为止找到的很少。”

“您跟我说过，你们有些困难。”

“是的，我们是有困难。”中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假如这些困难还不够的话，我们还有一件捣乱的事儿。”

“什么捣乱的事儿？”

“这件捣乱的事儿大得很。您没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吗？您等着，听我跟您说。我想问问您，您的同事在哪儿？就是那个神甫在哪儿？”

“我相信他在旅馆上面自己的房间里。”将军说道。

中将笑了。

“我的脑子想的挺糟糕。”中将说，“因为我觉得我那位市长倒霉了。”

“出什么事了？”

“他被紧急叫走了。”中将说，“因为他的缘故，挖掘工程停止好几个星期了。”

“您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叫他？”

“不是百分之百，也知道百分之九十九。这一丑闻若是散布在报刊上，全部工作就活见鬼了。”

“他贪污了费用基金？”

“比这个还要坏。”中将说，“发生了一点最糟糕的事情。”

“您真叫我感到奇怪。”

“您是知道的，我们没有精确的名单。”中将继续说下去，“所以，从一些迹象来看，很多人家、特别是军官家庭，都对将承担寻找军人遗骨的人许了愿，保证给他们报酬。当然喽，对我是不会的。”他笑容可掬地说，“谁也不敢许愿给我报酬。可是，我的下属肯定接受了给报酬的许诺。”

“这是完全可信的。”将军说。

“从一些迹象看，这是真的。不过，事情的糟糕之处不在这里。因为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权力对另外一个人予以报答，这种事儿任何人也不能阻挠。您说对吧？”

“那是。”

“事情坏在别处。如果我们不把找到的军人遗骨一次接着一次、一批批地按着不同数量发走，而是像你们那样做，把它们很好地集中起来，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一丑事。”

“我们搜集到了整个军队。”将军说。

“如果我们不是把一批一批的军人遗骨逐次寄走，这件事就不会一开始就败露，因为谁也不会注意，某一遗骨重新摆起来以后，骨架长度会与阵亡的军人身长不吻合。”

“这事是谁发现的？”将军问道。

“一些情况表明，这一事实是一户人家第一个发现的。可您知道，只要开始出现一桩这样的事情，也就够了。然后一切事情自己就会接连而来，产生那样一些永无休止的怀疑。”

“现在我明白了。”将军说，“那就是说，您的下级把军人和错误等量齐观了。”

“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他们是以那些被人家提出要求的军人的名义，对陌生的军人的遗骨作了洗礼。简单地说，如果这种事是真的，那么，这里就是整个地进行了一场投机买卖。遗骨全搞乱了，送到各家的全是他人的遗骨。”

“这种事干得很理智、很冷静吗？”

“情况表明是这样。既然从我的市长那里我得不到任何消息，那就说明是那么回事。”

“你知道人家为什么叫他去吗？”

“不知道。他接到了一份电报，电报里通知他的妻子又病了。另外，我还从我的一位在部里工作的朋友那里收到了一封信。见鬼

的事儿。”

“肮脏的事儿。”将军说。

“除此以外，人家还说缺少颅骨，许多金牙也没了。而这些东西，是那些人家非要不可的。”中将说。

“在挖掘坟墓过程中，你们没作记录?”

“没有。”中将讲道，“就连牙齿和偶尔能找到的贵重戒指也没有记录。”

“真的，这事可是真见鬼了。”将军说。

“我寂寞得很。”中将说，“我太孤独了。您明天就动身回国，我多嫉妒您啊。”

将军点着一支烟。

“特别是当傍晚来临的时候，全然不知该干什么。这要比在山上跑跑颠颠，睡在帐篷里糟得多。”、

“那有什么办法。”

“我们像地质队员一样，从一座山跑到另一座山，从一条河谷转到另一条河谷，整整转悠一年半了。现在，这件麻烦事儿，总算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像地质队员，您说得对。”

“您还要想一想看，我们在寻找什么矿藏。”中将说，“是在寻找一种死亡制造的矿藏。”

将军微微地露出笑容。

“现在，您要谅解我。”他一边看表一边说，“今天这一天，对我来讲，是烦事累累的一天。”

“总的来讲，今天是生气勃勃的一天。”

“是的，如同每个节日的前夕一样。”

“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节日。”

“是这样，正像他们所说的，是解放节。”

“去吧，将军，我不想再留您在这儿耽误时间，相信傍晚时我们

还会见面。”

“我会在这儿的。”将军说，“我把我的事情一办完就回来。”

“那么再见吧。”

“再见。”

将军把烟扔进一个盒子里，准备上电梯。可是，就在最后的一刹那，又回过身来问道：

“也许为了那十一名军人，会办成功一件事情。”

中将耸了一下肩膀。

“难，甚至很难。”

“为什么？你们给一些人家寄去了遗骨，应该有那些人家的地址。”

中将苦涩涩地微微一笑。

“伙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稍微具体地想想看，对那些要求把遗骨再重新送回去的人家来说，将会出现怎样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场面。”

“不管怎么说吧，那是很难堪的。”将军说。

“不说这个，在其他的法律难题面前，这不算一回事。”中将说道，“但是，不管怎么说，晚上我们还是要深入而细致地谈一谈。”

“同意。”将军说完上了电梯。

第二十四章

五点一刻，宴会结束了。将军一直等到应邀出席宴会的人走完。当只剩下他和神甫的时候，接连喝了两杯白兰地。然后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出了宴会厅。

这套形式也结束了。将军一边轻松地思考着，一边来到街上。有点冷，但不管怎么说，事情是结束了。

他以他的人民和千万母亲的名义，对挖掘寻找遗骨期间所提供的一切方便，对阿尔巴尼亚权威人士致以谢意。一开始在飞机场迎接他们的那位阿尔巴尼亚代表讲话说，他们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完成了一项人道主义任务，他们希望同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平生活。然后开始举杯祝酒，在轻轻的清晰的碰杯声中，能觉察到远处的鸣炮声。这种令人窒息的炮声，是谁也不能掩盖得住的，将军心里想。所有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任何人也不能说出来。

路上人山人海，他在人群中向前走着，四处都能听到外国人的说话声和城市的喧闹声。

在斯坎德培广场举行音乐会，舞台搭在文化宫前面。洁白的大理石柱子上，装置了五颜六色的灯泡，不停地闪烁出光芒，时而明亮，时而熄灭，到处都是一片灯的海洋。

他在人群中穿行，稍微踮起脚尖，以便能更好地观光。在后边，

在人民议会执委会的凉台上，两盏探照灯把白花花的光束倾洒在人们的脊背上。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部机子哒哒直响，看样子是在拍电影。

将军观看舞蹈演员在台上跳舞，可他的心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他在心里重复说，炮声在那儿响，在洁白而晶莹的玻璃器皿下面轰鸣；不仅有炮声，而且还有机枪的哒哒声，刺刀的咔嚓声，天黑以前分发每份食品时军人的铝缸子发出的当啷当啷的响声。一切都在那儿发出响声，大家都知道，而且也察觉到了，因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

顷刻间，探照灯那强烈的白光，把他的眼睛晃疼了。现在，千万人的脑袋逆着灯光投射出奇怪的影子。将军的心里不寒而栗，开始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挤着前行。探照灯不停地扫来扫去，将一大条刺眼的光带时而射向高空，时而滑向低处，不断地照在人们的头上；这些人不安地走回家去，把影子分射在各个地方。

将军离开人群，走在通向旅馆的花园边上。

将军想起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的代表面对面地坐在桌旁，在他们中间，只有几瓶饮料和几盘水果。

我们中间就只有这些？当人们首次举杯的时候，将军在心里嘀咕。我们中间就只有这些贴着漂亮商标的瓶子和从海滨的果园、葡萄园里采摘来的如此好看、如此新鲜的水果吗？他想起了披着黄昏的金辉的果园和葡萄园；这些果园和葡萄园，就分布在白光光的公路两侧。公路的上空，一轮皎洁的明月洒下了银色的光辉；远处传来了孤零零的狗叫声。在更远一点的地方，燃烧着牧人的篝火。

“您有一封电报。”旅馆服务台的一名工作人员一边把房间的钥匙递给他，一边对他说道。

“谢谢。”

在黄色的电报纸上，贴有一个小小的红色记号，意思是“加急电报”。

他冷淡地打开电报，念道：“我们听说您已完成了崇高的使命，请您通报一下有关上校的情况。Z之家。”

他感觉血液冲上了头顶，太阳穴也激烈地跳动起来。但是，他还是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慢悠悠地走到电梯前，进了电梯。

你何苦要参与这档子事！他一边端详自己照在镜子里的面孔，一边对自己说。他的面容疲惫而苍白，表情憔悴，额头上有三条深深的永存的皱纹，中间那条略长些，另两条比较短，就像打字员在一份报告的结尾处打上去的那些横线一样。

好累哟，他对自己说，累散架子了。

他走进自己住的房间，把灯拉着，第一件映入眼帘的东西，就是床头柜上面那个击鼓的小瓷人；这个小小的山民，立在一大堆信件和电报中间。

他躺下去，竭力想睡一觉。

外边，响起了放焰火的声音，五色斑斓的光焰透过百叶窗，劈成一条一条光束，射进屋里，在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上打圈圈。他又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兵营的那间大屋子。那时候，他与别人一起坐在军医委员会长长的桌子旁边。委员会成员的手里，传递着新兵入伍体检拍的片子。他们把新兵拉回到灯光下面，让暗色的肋骨活动起来，就这样，在他们的头顶上转，然后以一种疲倦腻烦的音调传出一句话：“是个合格的兵。”即使在那种时候，即发现在肋骨中间有一小块斑点，他们也习以为常地说：“是个合格的兵。”只有当斑点实在太大，没有办法注意不到的时候，他们才小声地磨叨那么一句：“不合格。”这种工作要连续干上一整天。在全部的日子里，他们把理了头发的新兵不断地送进兵营，并且进一步送到刚刚开战的战场上。

被百叶窗切成一条一条的光线，不停地在他的头顶上打转转。他闭上眼睛，再也不想看了。可是，当他闭上眼睛时，对军营那间光秃秃的大屋子的回忆，反而变得更加清晰、分明；他也更加清楚地回忆起了那些神色紧张、不知所措的新兵。当时，他们站在全然光秃、宛

如白白的蜡烛似的长桌子前面。

将军起了床，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他到走廊里询问神甫去了哪里。人家告诉他神甫出去了，于是又回到房间里，拿起电话，向服务台询问中将在什么地方。

他一人走出房间，在走廊里碰上了中将。

“我正要找您，服务台工作人员告诉我您在房间里。”

“来呀，请进吧。”将军一边回到房间里一边说。

“我觉得您是要准备出去。”

“是的，不过没关系。”

“也许到楼下大厅里更好些?”

“随您的便好了。”将军说。

他们慢慢地不做声地走下大理石楼梯。下边，在前厅里，依然洋溢着清晨的欢乐气氛，服务台的两部电话机一直丁零丁零地响个不停。

“显然，代表团还在继续来。”中将说。

在大厅里，好不容易在角落里找到一个空位置，于是他们二人坐了下来。从窗户可以看见大街、散步的人们和焰火强烈的亮光。这一亮光落在人们的头上和公园里黑黝黝的树木上，如同厚厚的多彩的雪花一样。然后焰火停了，一切都显得更加黑暗。

将军要了一份弗尔奈特酒，中将要了一杯白兰地。

从楼下面的饮酒间传来了音乐声。上上下下川流不息的人们，踩得通往饮酒间的木制楼梯不停地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

他们慢慢地斟满酒杯，喝了起来。然后一句话也不讲，默默地停了好长时间。将军又重新斟满酒杯，觉得喝酒这事儿要比开口交谈什么事情容易得多。

焰火在旅馆外面隆隆作响，焰火的彩光不时地触到窗户上。

“他们在庆祝胜利。”将军说。

“是的。”

他们向窗外望去，看见天空被照得一片通明，仿佛从高空滑落下来一顶巨大的烧红的钢盔；这个钢盔闪闪地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光亮。可是后来，在黑夜当中，这一光亮突然变暗、变凉，最后熄灭了。

“唔，这交给我们的工作……”将军说。

“这项工作比战争还可怕。”中将说，“我打过仗，可是这要比打仗可怕多了。”

将军瞟了一眼那只塞进衣兜里的空袖子。

你不必说你参加过战争，打过仗，将军心里想。

“这本身就是战争。”中将说，“这些遗骨是它的本质所在。最后剩下的这点东西，如同器皿下面积淀下来的盐垢一样；器皿下面进行一种化学反应。”

将军苦溜溜地微微一笑，又把杯子斟满，听得见楼底下的饮酒间里有音乐声。

“您听说过潜入水底寻找珍珠的人是怎么样呛肺的吗？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工作也呛我们的心。”

“这是真话，是呛我们的心。”

“我们很辛苦。”将军说。

另一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战争的阴影把我们击碎了。假如战争本身发生了呢?”

“战争本身？也许那会更好一些。”

“我也是这么想。”

“尽管在山区作战很艰苦，”将军接着讲下去，“特别是在这样的山区作战更为艰难，但我还是宁肯参战也不干这个差使。我曾开始研究过这个问题。可是后来半途而废没研究下去。出现过许多很困难的问题，甚至我想这里的这场战争要比今日美国人在越南丛林中进行的战争还要艰苦。”

中将点点头。

“假如战争本身发生了?”将军继续说，“那样的话，也许二十年

以后我们最年轻的同事会来挖掘、寻找我们的遗骨，你缺的就将不只是一只胳膊了。”

“您是这样想？”

“他们也许恰好就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喝着酒，谈论我们的事儿。”

“也许会这样吧。”中将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可能还会发生与已经发生的事情截然相反的事情。”

“您知道这个？”将军说，“有一天我曾对陪同我的神甫说过，我同他的谈话，与今日的某些话剧的对白很相似。现在我还注意到了，我们俩之间的谈话，也很像那些对白。我们干吗要费劲儿地讲这些不自然的、尖锐的、目的性太强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肝火盛、脾气大的人。”中将以一种斩钉截铁的语调说道。

将军注视着他。

“您的想法不错。”将军说。

“这种事儿跟那些喜欢吃菜带很多作料和胡椒面的人的事情一样。”另一位接着说，“您说是不是？”

将军笑了笑。

楼下面响着音乐，快速咖啡锅不时地发出蒸汽的轻微的哧哧声，仿佛有一个小火车头在呜呜地叫唤。

“您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相识时我对您讲过的那座体育场吗？”中将说道，“就是那座当时我们还在继续挖掘的体育场，记得吗？”

“是那座足球锦标赛结束之前，他们不允许你们挖掘的体育场？”

“对，正是那个体育场。”

“我记得。”将军说，“我记起了一点事情，记得你们是如何地开始在体育场边上挖坑，雨水是怎样打在水泥看台上，然后那雨水又是如何汇在一起往外流。”

“真就是那样。”中将说道，“情况正是如此。一个个坟坑挖在足球场地和篮球场地的四周，黑糊糊的一大片。在长长的一层层看台上

流着水。后来我们开始到球场里边去挖，在守门员守卫的地方，在中锋的位置上，在中锋奔跑的跑道上，一句话，在所有的地方挖。整个场地上土坑一个连着一个，好好的场地变成了一个大筛子。不过我说话的意思不是指的这个。”

“那您说话的意思指的什么？”

“有那么一个姑娘，每天下午体育运动员练球时，她都到那里等候她的未婚夫。我对您说过这个姑娘没有？”

“您跟我说起过一点儿。”将军说，“不过，我记不太清楚了。”

“她每天下午都去，下雨的时候，就把雨衣的帽子竖起来，戴在头上，站在一个旮旯里，呆在一个看台柱子前面，眼睛跟踪着球场上的未婚夫。”

“这会儿我想起来了。”将军说，“我想起来了，您跟我说过，她穿了一件蓝雨衣。”

“对，对。”中将说，“她有一件很漂亮的蓝雨衣，眼睛则更为明亮秀丽，虽然多少有点冷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在彩色电影里，我也没看见过最漂亮的眼睛。就这样，每天她都到那儿去，而我们当时却一直不停地在那儿挖坑寻骨，土坑从四周把球场给围上了。”

“后来怎么了？”将军冷淡地问道。

“没怎么，啥事也没出。”中将说，“任何特别的事情也没发生。黄昏降临的时候，小伙子们就停止锻炼，于是他们当中有一个小伙子就伸出一只胳膊搭在她的肩上，二人搂抱着向外走去。您相信我吧？这时候，我心里感到一种空虚和无聊，我觉得人世间是那么可怜，那么没有意义，就跟那座阴沉沉、空荡荡的体育场一样。在我这个年岁，就是这样，相信我吗？”

什么样的丑事噢！将军心里在揣摩。

“生活中有时会发生这种事的。”中将继续讲，“恰好就是在那个等不着她的地方，产生了一个既疯狂又无意义的梦想，恰似降生于一道深渊边缘上的那朵花一样。我有什么好掺和的？一个外籍将军，更

主要的是到了这把年纪，又是个残疾人，我掺和什么？我到这儿是为了搜寻我们民族的军人遗骨，跟那个年纪轻轻的异国姑娘有何相干？”

“您和她当然毫不相干喽。”将军说，“不过，为了想念还是可以动动脑筋的。人常常幻想一些实现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在女人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最后一个夏天在浴场上……”

“有时我觉得我是在思念她。”另一位打断他的话，“可是有时连我自己都搞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痛苦。不是姑娘本身弄得我神魂颠倒，而是另外一点什么，一点无法确定的抽象的曲曲弯弯的东西，叫我心神不定，您懂我的意思吗？”

“懂一点儿。”将军说，“看起来，是青年人、生活的表象把您给弄晕糊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像野兽一样四处周旋，在埋葬死人的地方嗅着死亡的气息，千方百计地呼唤着死者出来，几乎把所有美好的事情全给忘了。”

“也许您是对的。人总是需要抓住点什么，就像淹进水里的人拼命要抓住一点东西一样。我就是抓住了这个姑娘的形象不放。”中将竭力想露出笑容，可是，看得出来，他很难做到这一点。

噢，这是一个怎样的情种哟！将军在思考。

“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婚礼，想起来跳个舞。”将军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而中将却没让他继续说下去。他抢过话说道：

“我嘛，”他用手指着自己说，“我的头发白了，一只手也断了，可您晓得，一个月以后，当我们又回到那座城市的时候，白发苍苍、断了手的我干了什么吗？那天下午，恰好就是以前那些小伙子锻炼踢球那个时间，我独自一人到了体育场。可是，体育场关了门，那天没有锻炼。不过，我仍然要求进去。守卫的门岗给我打开了大铁门，我进去了。体育场冷冷清清，阴沉沉的，现出一副可怜相。它从来也没有像这一天这么难堪。这时坑穴全填平了，只不过地面上还残留着痕迹，就像皮肤上封了口的伤疤一样。我到看台的柱子周围徘徊，当初那个姑娘，就在那儿等候她的未婚夫。我心里感到特别空虚。顷刻

间，我觉得那长长的、湿淋淋的、躬身的看台，要压迫我一辈子，永远都要叫我服服帖帖；那灰色的，空空荡荡的用钢筋水泥筑成的看台，绕着圈儿打转转，看样子永远也转不完。您听我说话没有？”

“我在听您说。”将军说，“听着哪。”

他们举杯喝起酒来。

现在，旅馆外边，已经有好一会儿没放焰火了。没有焰火闪光，对面的大公园，在夜色里很难看清，那样子仿佛像一堵墙。

当来了第二封电报的时候，他们正静默无声地坐在那里。

“这是一封什么电报？”中将问道。

“电报。”

将军斟满了酒杯。

“他们拍了好多电报来，以为通过电报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中将倦怠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准备打听一下。可是，过了一会儿，却点着了一支烟。

“您知道，在一个婚礼上，一个阿尔巴尼亚老太太对我说了什么吗？”将军说，“您到这儿来是要看看我们如何给我们的儿子结婚，过后好来杀死我们。”

“这话太可怕了。”

“这话太可怕？您说这话太可怕吗？您若是知道了发生的那件事，还要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另一位说。

“最好您还是不要知道。”

“喝呀，伙伴。”中将说，“为了您的健康！祝您健康地、美好地回到祖国！我多么嫉妒您啊。”

“谢谢您，伙伴！”

将军觉得自己醉了。

现在，大厅里的人逐渐少起来，通往楼底下饮酒间的楼梯发出的响声，也不是那么密集了。然而，音乐声还是一直能听得见。

“您的神甫哪儿去了?”中将突然问道。

“不晓得,”将军说,“不晓得他转到这儿的什么地方去了,肯定他在继续负责处理电报的事情。”

另一位的惊奇的眼睛,又死死地不动了。他想询问下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您知道在一个村里我出了什么事吗?”中将说,“土质很硬,满是沙石,而且盐碱很多,挖起来太费劲儿了。我们把坟挖开的时候,找到了一些尚未腐烂的尸体。那种场面太吓人了。我们要了大棺材,好家伙,就像为真的死者准备安葬似的。”

“有意思。”将军说,“我还没碰上过这样的事情。”

“不过,还不仅仅是这个。”另一位说,“看样子,整个那一带地方,都听说了这件事。过了些日子,一个农民编了一首歌儿。”

“一首歌儿?”

“是的,是编了一首歌儿。我抄下了歌词,这歌词就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歌儿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向我们进攻的敌人的尸体完整无损,连泥土也没把它们化掉,或者说不想把它们化掉,或者说是近似这个意思吧。看来阿尔巴尼亚人对此还真相信了,因为他们不了解化学。”

“不过,战争他们可是了解的。”将军说。

“这是真的。服务员!”

“有一回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儿。开始我们竟把它当做一次挑衅行为。”将军说,“可是,那是一首古老的歌儿,甚至可以说是一首情歌儿。”

“是这样?”另一位冷淡地问道。

“歌中唱的多多少少是这么个意思:你呀,我说菡克,你是多么讨人喜爱,动人心魄,你可不要到墓地里去散步,因为凭着你的美貌你能叫死者复活。”

“瞧瞧,瞧瞧!”中将说。

“我们打了一个完整的报告。”

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谈了很多。在他们的谈话中，总是要加进去战争和坟墓的话题。我们的每个想法，都写在一块如同用那些铁片做的牌子上，将军琢磨着。每块牌子上都有一些褪了色、生了锈的文字，费大力气才能认出写的是什么意思。牌子被风吹得直摇晃；那风是经常刮的，就像在那条河谷里那样。在那里所有的十字架和牌子都弯向西方。他们问过，为什么所有坟墓的标记，都向同一个方向弯弯地低下了头。农民们说，这事儿是经常朝那个方向吹刮的风干的。

当来了另一封电报的时候，大厅里几乎空无一人了。将军从服务台工作人员手里接过电报，也没看看来自何处就打开了。

没看到底他就把电报窝成一个纸团儿，扔进烟灰缸里了。

“伙伴，今晚您竟收到一些非常秘密的电报。”

将军没有回答他的话。

中将叹了一口气。

“夜间电报真叫我害怕。”

音乐声还听得到，但是，在木制楼梯上，上上下下的人越来越少了。

“几点钟了？”将军问道。

“快到半夜了。”

我不应该喝醉才是，将军心里想。时间已经不早了，可是，我还能喝两杯。

他们为一点别的事举杯祝愿。这点别的事，将军没能很好地理解。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心里想。我们为什么喝酒？让那一位考虑这一问题好喽。

“我想问问您。”将军贴近中将的耳朵问，“您是否什么时候同某个神甫一起喝过？”

“神甫？据我回忆，没喝过。我相信是我没碰上机会。不过，我也不能太自信。”

将军再次打量了一下那只塞进上衣深兜里的空袖子。

将军心里想：你只有一只手，这只手让你用得有点过分了。

“没喝过，据我所回忆，没喝过。”中将又重复一遍自己说的话。

将军摇了一会儿头。

“瞧。这就是人的生活。”他若有所思地说，“今天冒着大雨奔走，明天同一位神甫喝酒。您说是不是?”

“那自然是了。”

“不，请您告诉我，您有什么不同意的看法吗?”

“伙伴，这怎么能怀疑呢?”

“噢，请原谅，我有一点急躁。”

“没关系，没关系!”

“嗯。”

将军只望着烟灰缸，对自己作了一个惊讶的手势。

第二十五章

“已经过了半夜。”将军说，“我觉得他们是要关大厅的门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

“到我的房间里坐一会怎么样?”将军说，“我们再稍微坐一会儿，把各种事情都聊聊。我能与您交往，感到非常荣幸，尊敬的伙伴。”

“伙伴，我也同样。”

“您忘拿酒瓶了。”

“请您原谅，伙伴。”

“如果您能允许我的话，我想还应当再喝点。”

“当然允许了，我也不持异议。”

“我们在执行我们的任务，谁也不能干预我们的事情。”将军说。

“非常正确!”另一位说，“对这些事我有一个尖锐的想法。”

“请您克制一下，一分钟!”

“请您原谅。”

“不客气。”

他们两个每人手里拎着个酒瓶，双腿颤巍巍地登上旅馆楼梯的台阶。

“不应该在楼里喧闹。”将军说，“阿尔巴尼亚人睡觉睡得早。”

“把钥匙给我，我觉得您的手在发抖。”

“主要的是我们不要喧闹。”

“我可是喜欢喧闹声。”中将说，“宁静使我恐惧。这是一种无声的战争，如同无声电影一样。最好还是听听大炮的轰鸣。我说话像演话剧吗?”

“嘘！有人咳嗽。”

“给我钥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无声战争，简直是死亡的战争。”

“请进!”将军说，“坐吧，我太高兴了。”

“我太荣幸了。”

他们面对面地坐在桌子两边，互相凝望对方激动的眼睛。将军将酒杯斟得饱饱的。

“我们两只流浪他方的鸟，喝着弗尔奈特酒和白兰地。”中将大动感情地说道。

将军摇摇头，然后又静静地呆了好长一段时间。

“为了袋子的事情，我们吵架了。”将军说道，皱起眉头。

然后，两眼直直地盯向伙伴，显然他是极力要回忆起一点儿什么事情。

“我把那个扔到山崖下边的深谷里了。”他以躲躲闪闪的腔调说道。

“我跟您说过了，神甫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我扔下去的不是神甫，而是袋子。”将军说。

“噢，我明白了。非常正确。”

“他不愿意我把袋子扔到深谷里。”将军继续讲道，“可我不愿意把袋子带在身边，因为它太晦气，太不吉利了。”

“太对了。说到底，一个袋子有什么了不起?”中将一边吸烟一边说。

“可神甫他太犟，没法说服他。”

“所以您把他本人也给扔下去了。”

“不，不是他，是袋子。”

“唔，请您原谅！”

“从前有一次，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卡车，在雨天里向前驰进。”将军大声说道。

他们又默默不作声了。从前有一次，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卡车，在雨天里向前驰进。将军在思考着。

“这是怎么个意思？”另一位问道，“怎么，您从事交通事业吗？”

“不，这是孙女的第二个童话。”

“是这样？您是一个童话搜集者？”

“自然是了。”

“我猜就是嘛。对童话问题我一向都很感兴趣。”

“这可是个伟大的问题。”

“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您太内行了。”

“那还用说！”突然，中将以果断的语气说道。

将军惊奇地瞪起眼睛，转都不转一下，可是，很快又不在乎了。

“我有四个死去了的神甫。”将军说。

“我一个神甫也没有。”另一位伤心地说。

“你连娼妇也没有。”

“连娼妇也没有。”

“别犯愁，也许以后你就会找到。”

“也许吧。”中将唉声叹气地说，“人在地下什么找不到！洗澡间在哪儿？”

“帘子后面就是。”

将军独自一人靠桌边坐了很长时间。最后，另一位终于洗完澡回来了。

“在一条河谷里，同军人的遗骨一起，我们还找到了骡子骨头，二者掺和到一块儿了。”中将说。

将军不寒而栗。

“我已向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抗议。这是挑衅。”

“后来呢?”

“不是挑衅。是我们自己人匆匆忙忙地把他们埋葬的；是我们的一个侦缉营干的。”

中将把话很吃力地吐出口，因为喝酒，脸色变得黄黄的。

“我把你们的失败、糟糕的将军搜集到一起了。”将军说。

“不要中伤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是遇上困难了。”

“我们更困难。”

“可能吧。”

他们不做声地呆了片刻。

“你若是知道他是怎么样地瞧我们就好了。”将军说。

“他是谁?”

“阿尔巴尼亚汽车司机。”

“他为什么瞧你们? 我大胆地问问您，行吗?”

“你问的是司机?”

“不问他还问谁?”

“他神秘地注视着我们，当时我们正在吵架。”

“骡子骨头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人都会辨认出来。”

“那自然是了。这个容易。我觉得人的骨头是五百零七块。”

“伙伴，不是真的。”脸色阴沉沉的中将说，“不是真的。我的骨头就比这个数少。”

“这不可能。”

“可能。”另一位固执己见，说话的声调急赤白脸的，“我缺少几块骨头，我是个残疾人。”

“没什么。”将军安慰他，让他平静下来，“伙伴，没什么。”

“我是个残疾人，残废。”中将重复说，“您不相信我，可我现在就给您看看。”

中将吃力地用一只手脱掉上衣。可是，将军摁住了他的肩膀。

“伙伴，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我完全相信你。我请您原谅我，多多地原谅我。我太有过错了。说真的我什么都不是。”

“我应该给您看，给所有那些不相信的人看，现在马上就给您看。”

“嘘！”将军说，“我觉得有人敲门。”

他们立刻哑言，门再次被敲响。

“都这时候了，谁还敲门？”

“我们害怕夜间敲门。”中将说，“我紧急动身来这个国家那天晚上，有人就是这样敲。当！当！当！后来我回到家里时，费好大劲儿才把门打开，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一只手开门。”他继续压低嗓门悄悄地说。

将军踉踉跄跄地去开门。

是服务台工作人员。

“请原谅，这么晚了来打搅你们。”服务台工作人员说，“您又有一份电报，请原谅！”

“噢，没关系，谢谢您！”

“晚安！”服务台工作人员说。

“晚安！”将军回答。

他一边转回身来，一边将电报撕碎。

“伙伴，今天晚上您显得太神秘了。”中将说，“所有这些夜间电报都不是好兆头。”

“他们发电报，”将军说，“今晚他们过于担心了。”

现在，那儿正响着吉祥的电话，将军心里在描绘着人们打电话的情景。这会儿，他们在互相呼喊：“阿洛！”“阿洛！”“阿洛！”然后便跑出去，如同发疯似的互相撞来撞去，奔走相告。

将军竭力影影绰绰地描摹着种种情景：人们如何地聚集到上校家里，他们俱乐部里别的朋友如何奔走相告，上校年迈的母亲如何划着十字走到楼梯上，蓓蒂如何惊慌地跳下床，所有的人又如何灰心丧

气地说：这个下流鬼，还没有给找到，真是坏透了！

蓓蒂，我不是下流鬼。他在想。

“今天晚上，他们不睡觉。”将军大声地说。

“他们要什么？”中将问道。

“要袋子。”将军说。

“我劝您把袋子给他们，就让这桩乱了套的事情完结算了。准备——给！”

“等一下。”将军心里想。

将军把电报窝成一个纸团儿，扔到地板上了。

“您晓得吗？”将军说，“我怀疑我的神甫是个特务。”

“有可能。可我不是很有把握。”

他们一声不响地待了好长一会儿。百叶窗后面露出一点白白的看不太清楚的东西。

“天亮了。”中将说。

“不，那是大街上的霓虹灯。”

凉台外边传来了下雨的窸窣声。

“这些电报真叫我害怕。”中将有气无力地说，“电报里总是要有点不好的事儿，秘密的事儿，有一点不可言状的事儿。我想起当初在前线，指挥部的一名军官曾收到他的一个朋友的电报，可这个朋友早已经死去了。”

“伙伴，您说的事儿好可怕。”

“嘘，”中将说，“您听！”

“什么？”

“竖起耳朵听听，您没听见有点什么？”

将军悄悄地听了一下。

“是下雨的声音。”

“不，不是下雨。”

从远方、很远的地方传来一种有节奏的闷声闷气的响声，然后又

传来了几声尖锐、短促的话音，紧接着又是窸窸窣窣的雨声。

“这是怎么回事?”

“到凉台上看看。”将军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当他们打开凉台门的时候，夜间湿润的空气直扑到脸上，远方有节奏的声音听得更清楚了。

他们俩走到凉台上，绵绵细雨还在下。在霓虹灯寒峭的光线下边，大街显得惨白失色，旅馆对面的公园黑糊糊的一片，显得又大又可怕。

“瞧瞧这边。”中将小声说。

将军转身朝另一位挥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在稍远的地方，在地拉那大学那边，他们看到在大街上有一列列黑糊糊的方队正在向这边移动。

现在，沉重的脚步声听得更清楚了。指挥官那尖锐、短促的喊声，严厉地响彻在黑黝黝的夜色里。

两位将军依着凉台栏杆，面向喊声那面望着。当大队接近桥跟前时，他们看清了湿淋淋的钢盔和刺刀的寒光，军人宽宽的队形，军官们的出鞘的利剑，还有连与连、营与营之间的距离。重重的靴子似乎要震撼大地，指挥官们短促的喊声，如同刺刀的铿锵声响彻在夜空。

一队队的大兵，不停地靠近了，大街上到处是黑压压的一片。道路两边，霓虹灯的光芒，照射在军人的钢盔上，折射出的反光要比霓虹灯的光芒本身强过无数倍。

“一个大军。”中将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大军。”将军回答说，“看样子他们是在进行阅兵演习。”

“为节日?”

“是的。”

远处响起发动机闷声闷气的声音。

“坦克。”将军说。

远处桥那边坦克兵出现了，坦克车又大又黑，炮口在夜色里闪出

亮光。

现在，整个大街到处都集聚着大兵，到处都是钢铁，到处都喧响着有节奏的脚步声，发动机的隆隆声，指挥官尖锐的喊声。在细细的亮光光的雨下，一切都在向斯坎德培广场移动。

当大兵的队尾消失在部长会议大楼的后边，大街在霓虹灯下重新变得空空荡荡，悄然无声，似乎因为睡眠不足而显得苍白的时候，他们回到了房间里。

“整个大军出动了。”中将说。

“是的，是整个武装到牙齿的大军。”

“我冷。”

“我们被雨水打湿了，变成落汤鸡了。”

“喝吧，将军，不然我们都得着凉。”

这时候，他们两个被雨水淋得清醒多了。

将军抬起头来。

“您看见他们是怎样阅兵了吧?”

“看见了。”

“我想起了我的军队，琢磨着我的那些蒙着蓝袋子、扎着黑带子的军人会怎样地接受检阅。”

“我的状况更糟。”中将说，“我那一群人全然乱了营，混杂不清。在我的军队里，第一个人说服不了第二个人。”

“可是，当您的军队还活在人间的时候，是最规矩、最守纪律的。”

“咳，当它还活在人间时，是怎样一支军队啊!”中将眯缝着眼睛说。

“只是过于残忍了。”

“任何军队都是残忍的。”

“您的军队过于残忍。”将军重复说，“您的军人枪杀我们的军人，尽管我们还是盟军。”

“可是，是你们背叛了我们。”中将火气挺足地说。

"我们并没有背叛你们，是我们投降了。"

"这是一样的，是你们不讲信义，把我们置于困境。"

"至于是谁把同伴置于困境，这有什么重要意义?"

"也许我们并不会失败。"

"您为此感到遗憾吗?"

"是感到遗憾。"中将说，"而你们却就要那么干。"

"怎么说?"

"肯定是那么回事。"中将喊道，"你们就是要那么干，所以把我们置于困境。"

"我们投降并不是我们的罪过。"

"那是谁的罪过?"中将喊道，"我很尊敬地问问您，是谁的罪过?"

"鬼才弄得明白。"将军说。

"那么我要跟您说说，"中将喊道，"你们那支军队真是些可怜虫，脑子里想的只有女人和面条。"

"您们的军队也不理想。"将军冷冰冰地说。

中将挖苦了一会儿，另一位注意地听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如果您对我们的军队持有这样一种评价，那我们可以比试比试。"

"我不明白，怎样比试?"

"我们是两名将军，我们俩各自都有一支军队。来，我们玩一玩，这样好消磨时间。"

"我明白了。"中将说，"那就是说，我们要像打仗那样干一场。我同意，伙伴。"

将军用颤抖的手打开一个手提箱，取出一大卷儿阿尔巴尼亚全国的地理形势图。地图上画满了十字，写着很多说明，而且还勾出了不少横线。

"不。"中将说，"我不想在这么具体的环境里苦斗，请您收拾起这些地图吧!"

“我就收拾起来。”

“给我白纸，我们自己来制定一个计划，不是制定一个地方的具体确切计划，而是制定一个地方的总体计划。”

将军又翻腾了一次手提箱，然而，显然没有找到没写过字的白纸。

“我们可以在这张图纸的背面画。”说着递过来一张挺大的照片。这是一座位于湖畔的坟墓照片。照片上的情景是这样的：夕阳西下，湖畔上影影绰绰，很难分辨出那几条小船和几个人的轮廓。

“太好了。”另一位讲，“让我来画一画。”

他们二人伏在照片的背面，互相感觉到了对方的呼吸，闻得到弗尔奈特酒和白兰地酒的味道。

“这里是战场。”

“右边画一座山。”

“不画山。”

“画一片树林。”

“再画出一条河来。”将军说。

“非常正确。河流应当能清理战场才是。每个战场中间都应当有一条河。”

“作为首都。”将军说。

“在河这岸我将安置我们的力量。”

“我把自己的力量安置在对面。”

他们二人握着红铅笔，再次哈下腰来，在这幅大照片的背面，画上了许多乱糟糟的司空见惯的记号。

“现在还是夜间。”将军说。

“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还都在睡觉。”

“而我们倒是挺精神，彻夜未眠。”

“今晚我们要交战。”

“我们的军队也在睡觉，睡在黑夜中分散的帐篷里。”

"是的，他们正香甜地睡着。"

"可是，现在我们来把他们叫醒。"

"我们要吹军号，发出警报。"

"激战之前，我们应当再喝上一点儿。"将军说。

他们又举起酒杯。

"您知道《一队鹅飞走了》那首歌吗？"将军说，"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仿佛有一片白色的坟地排着V队形在天上飞翔。"

"一个愉快逍遥的梦。"

"只不过是我们不要喧闹。"

"任何声音也不会有，这是死者的战斗。"

"魔影的战斗。"

"我开始了。"将军说，"我让步兵冲上去，在这里，还在这里。"

两个将军突然眼睛起火了，流露出恶狠狠的表情。他们再次伏在桌子上，又互相感受到了热乎乎的呼吸，闻到了酒味。他们开始快速讲话，而且讲的竟是军事术语；互相打断谈话，对在硬纸上画出的每个箭头，都要争吵一番。

"你不能往这儿钻。"将军喊道，"我要用平地上的炮兵干掉你。你把我的飞机也忘掉了。"

"我要消灭掉您的飞机，我拥有实力很强的防空兵，而这个你是没有的。"另一位喊道。

"你没在图上画出山，因为你不愿意让我用上登山力量。"将军喊道。

"我不画出山，那有另外的原因。从原则上来说，凡是山我都怕。"

"您以为我爱山？"

"那还用说！"

"我开出坦克进攻。"将军喊道。

另一位心神不定地低下头。他们继续争吵着，伏在图纸上喊叫了

好长时间。两个人汗水淋淋，说起话来结结巴巴。酒杯全打碎了。

“我包围你。”中将喊道，“我要死死地握紧钳子。”

“您不可能。我要把陌生的兵送往战场，我要打败您，把您打个落花流水。”

“我也有陌生的兵，甚至比你们还多。现在，大屠杀即将开始。”另一位大喊大叫，“我冲上去了。”

他们那汗水淋淋、头发蓬乱的脑袋，挨着硬纸板，握在手里的铅笔抖动着，呼吸都困难了。

陌生的兵以一种可怕的威力投入战斗。他们既无名字，也无脑袋，因此显得非常恐怖可怕。

“这儿的这个标记是什么?”中将冷不防地叫了一声。

“是我的侦察兵，卖淫者。”

“我抓她当了俘虏，你没看见吗?”

将军的脸色刷地一下变黄了，问中将：“现在，你要对她做什么?”

“我要枪毙她。您很清楚，战争中是如何处理特务的。”

“不要枪毙她。”将军喊道，“我们交换好了。”

“我没有卖淫者。”

“我送给您十名俘虏。”

“不干。”

“再多送给您一些，把坦克手全给您。”

“不干。”

“不要枪毙她。”将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求求你了，不要毙!”

将军说着站起来，两腿一并，扑通一声跪在了中将面前。

中将瞪大了眼睛凝视着他。

“天亮了。”将军说道，吃力地站了起来。

又是一阵寂静。

“我觉得我听到了响声。”

“走廊里有人往这边来。”

他们侧耳静听了一会儿，脚步声听不见了。

“您晓得我为什么跟神甫吵架吗?”

“不晓得。”

“为了一副骨头架子我和他吵了一通。”将军说，“我们缺一副骨头架子，身长一米八二。”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另一位讲道。然后猛地抬起头，两眼闪烁出炯炯的光。

“身长一米八二？您愿意我卖给您一个这样高的吗?”

“不愿意。”将军说。

“为什么不愿意？我有的是，我作为朋友卖给您，一百美元就行。”

“不。”

“您不是说您需要一个一米八二高的骨架吗？这种身长的骨架我多得很。如果您想要的话，我还有一个身高一米九二的。两米长的也有。甚至还有二米五十的。我们的军人身长比你们的高。想要吗?”

“不，我不想要。”将军说。

中将耸了一下肩膀。

“这就是您的事了，我可是尽到心意了。”

将军站起来，艰难地走到手提箱跟前。他把箱子打开，将里边的东西全倒在地板上了。军人的花名单、地图、记录本与毛巾和衬衫混杂在一起。他抓住一把名单，趔趔趄趄地走出房间，来到走廊里。

“这个人到哪儿去?”中将说。

将军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朝前迈了几步，在一个门口停了下来。

神甫在这间屋子里睡觉，将军心里想。

“神甫!”他一边小声地念叨神甫，一边从门锁的钥匙眼儿往里看了看。“神甫，听见我叫您了吗？是我。我是来和您讲和的。我们为上校争吵真没意思。怎么能为一条袋子就把我们的友情破坏了呢？这

事儿我们能理顺的，神甫，神圣的父亲。我们再来造一个上校。同意吗？同意吧，神甫！这对两个人都有好处。你将要说，蓓蒂，你有多么轻盈苗条啊！很好。说去吧！这是你的事儿。你缺一副骨架，瞧瞧，你又有了。我把名单带来了，神甫，你听见我了吗？看看这名单在哪里，就在我手里握着呢！身高一米八二的军人有的是，起来选一个就是了！有一个是机枪二连的，还有一个是坦克兵。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起来，我们来查一查名单吧，一个一个查！瞧，又有一个，这个缺两颗门牙。不过，这个没关系，我们可以到牙科医生那儿去做。我又找到另外一个，又找到两个。您听到我在讲话吗？所有这些军人的身高都是一米八二。我不骗您，神甫。一米八二。一米八二。我觉得我自己的身高也是一米八二。"

将军低着头，瞧着门锁的钥匙眼儿，磨磨叨叨地说了好长时间。后来，突然间，当的一声，门急促地拉开了，一个长得很胖、身穿睡衣的女人，气冲冲地蔑视地盯着将军，说道：

"您真不知害臊！我都到了这把年纪……"

将军眨巴眨巴眼睛，门在他鼻子前面嘣地响了一声，关上了。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身子，费力地把他说话那个时间不小心掉在地上的名单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朝他自己的房间走去了。

最后一章之前一章

拂晓时分，当服务台工作人员送来最后一封电报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喝酒。将军打开电报，然而，上面的字一个也看不清。他把电报拿在手里站了片刻，时而眨巴眨巴眼睛，时而皱皱额头。不过，他还是弄不懂是怎么回事情。他觉得，电报纸上的带子，如同雾中的一条带子，一条从洁白的陌生的天空剪下来的带子。他把电报窝成一个纸团儿，翘翘趄趄走到窗户前边，打开一扇窗，将纸团儿扔到外面去了。

在冷飕飕的半明半暗的空中，电报开始摇摇晃晃地落下去。

最后一章

雨夹雪洒落在异国的土地上，湿漉漉的重重的大片大片的雪花，一接触到飞机场建筑物前面场地的混凝土地面，立刻就融化了。在光秃秃的泥地上，雪花停留的时间还长一点。不过，也照样积不了一层薄薄的白雪，因为雨和雪一着地皮，雨就把它的同盟者给毁灭了。

将军身着威风凛凛的军装，凝视着雪花如何落到潮湿的混凝土地面上，如何因为潮湿立刻就开始消融；然后，又如何变形、消失掉。可是，在他们旁边，又继续从辽阔无垠的天空降下来一片片新的鲜亮的雪花。

“天气冷呵。”前来送行的阿尔巴尼亚代表说。

“是的，天气冷。”神甫说，“我们碰上了困难的季节。”

将军望着正朝跟前开来的大型飞机。广播员通知迟到的乘客快抓紧时间办理手续。机场工作人员将舷梯推到飞机将停下来的地方。

风，还在不停地刮着。

·终·

地拉那 1962—1966 年

根据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纳依姆·弗拉舍里”出版社 1967 年阿尔巴尼亚文版《GJENERALI IUSHTRISË SË VDEKUR》一书译出。